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七月臺初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輯

精裝十
定價新台幣

主編者：沈雲龍

發行人：李振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二六五九號

印刷者：美明美術印刷廠

臺北市康定路二〇二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〇八〇〇號



序

本集爲抗戰以來所撰有關政治性論文之第一結集，起自二十七年國慶日，訖於三十三年國慶日，凡得文三十二篇，大率皆曾發表於成都新中國日報。其屬於學術思想性者不錄，無關宏旨者不錄。余生平文字不自愛惜，手頭所能獲得者止此，三十三年國慶以後之論文，留待另集，所節去蓋已多矣。所論雖非一端，要皆於舉國躁擾中一服清涼劑，故名之曰清寧集云。

三十六年兒童節 作者自記

目錄

序	四七
立誠	五一
此時還有徘徊瞻顧的餘地嗎？	五三
正人心，息流言，拒邪說，惟有請政府立即正式宣布既定國策不變	五六
抗戰與民主	五九
建國與法治	六二
苦幹與樂幹	六六
無為政治論	七〇
他山之言與吾人之反省	八五
戰後國策研究的重要	八八
戰後國際局勢	九四
過去的錯誤	一〇二
建設戰後世界的幾個原則	一〇九
民主運動者應有的風度	一一五
把握物價問題的中心點	一二三
中英文化之異同	一二六

人物與風氣	一三〇
國策比國都更重要	一三五
衍人荒	一四〇
救文莫如質	一四三
憲法及其背後內力量	一四八
論學者當知所以自處之道	一五一
論熱中	一五五
現實主義與國際政治	一五八
遙贈威爾基先生	一六一
國防與外交	一六五
政治與軍事	一六九
變化裏的統一	一七二
超過和戰的戰爭	一七四
培養事業精神	一七七
貝當將何以見法人	一八〇
戰後處置日本問題	一八三
回憶過去，創造將來	一九一

清寧集

立誠

處危疑震撼之際，當大任者無他術，要在「誠」而已。

誠則有切切實實爲國爲民之心，不矜才，不使氣，不譁衆取寵，不立門戶之見，不爭枝節，不但圖苟且敷衍，能如此，庶幾可以任非常之事。

能誠則能仁，必有與生民共憂樂的誠意，然後始能切切實實感到生民的痛苦，而後有不忍人之心。仁是從同情心上發出來的，若是對人對事都無誠意，那裏有同情心可言？

能誠則能知，中庸說：「誠則明」，又說「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人能以一誠遇人遇事，則自無我見，無意氣，無偏私。天下事利害本不難知，只是褊心私見作梗耳。一誠則萬蔽皆去，然後可以談真知灼見。

能誠則又能勇。凡人之所以無勇者。只是把個人的小利害攪在大事裏去，以致遇事

顧忌耳。誠則無不公，公則無個人利害之見，於是才有真勇。

今天國事至此，皆維新以來四十年中一切擔當國事的政治家，一切談論國事的政論家，對國計民生缺少誠意所致。現在一切術取計詐的手法都已成了塵羹土飯，人人見慣，無所用之，有擔當國事的責任者或準備擔當國事的人，都應該先從「立誠」入手才好。

——二七、一〇、一〇、國論週刊（重慶版）第五期——

此時還有徘徊瞻顧的餘地嗎？

隨着廣州武漢的相繼失陷，一部分素來悲觀動搖的分子又皇皇然起來了。

對於持這種論調的人，我們只指出一個最基本的事實給他們去反省。日本的大陸政策是四十年來一貫的既定政策，滅亡整個中國乃是大陸政策的第一個階段，今天的戰爭，不是一個誰勝誰敗的問題，乃是中國願意變為朝鮮琉球第二與否的問題，妄想拿犧牲一部分權利來換取西南西北各省安全的人，似乎忘記了這個最基本的事實。

假如妥協能夠換得一部分未淪陷區域的苟安，也許還有討論之餘地，然而這個安是苟不下去的。他們忘記了塘沽協定的教訓，塘沽協定後繼之以冀察政委會，總算對敵人盡恭順之能事了，然而不久仍有蘆溝橋事變發生，今日而言妥協，不過再來一套放大的塘沽協定，放大的冀察政委會，試問昔日敵人對於華北局部尚不容冀察政委會式的政權存在，今日能容許一個放大的冀察政委會永久存在西南各省嗎？

稍微研究過歷史的人，都曉得北宋之末，南宋之初，金人即屢次以議和誘宋，結果片時的和平接着就來一次更大的侵犯，若不是黃天蕩和順昌兩次大捷，就是秦檜式的政

權也不會被容許存在的。必須能戰而後能和，在今日的狀況之下，只有投降與否的問題，根本沒有和戰的問題。

也許動搖的人要問在今日情勢之下，如何繼續戰法？對於這種問題我們不必替他們舉出長期抗戰的種種戰略上的勝算，因為這些話他們都認為是幻想，我們只要反問他們，不戰又有什麼辦法？假如敵人在片時的和平之下，懈怠了我們的士氣，肅清了後方的全民武裝勢力之後，誰能担保他不再向西南西北進攻？那時候又該怎樣？

我們應該明白，今天日本不是僅僅反對某一個人，某一個黨的政權，今天日本是要整個吞併全中國，況且這種企圖，也不始於今日，在北洋系袁世凱政權之下，日本已經有二十一條第五號的要求提出了。今天就是讓王克敏和梁鴻志來統治中國，日本依然不能滿意，我們還應該注意，秩父宮殿下已經在華南戰事中登場了，日本對於未來統治中國作何整個的打算，也就可想而知了。

今天若抗戰到底，無論勝負大家還是一條心，一旦國策改變，對外未必能安，對內先分裂為兩條陣線，一切革命的，勇敢的分子站在一面，而苟安的，妥協的分子又站在一面，這正是敵人所求之不得的。

我們必須有與敵人同歸於盡的勇氣，然後才能希望敵人知難而退。對於敵人力量估

計過小，固然是誇大狂，對於敵人力量估計過大，也容易陷入錯誤的打算。

我相信今日中國，一切妥協的主張不會成爲有力的運動；如果有，我誠懇地希望他們覺悟：苟安不是長久的辦法，投降不足以救了中國，一切誠意爲國分子，應該一致努力安定人心，團結意志，打銷動搖的理論，繼續發動全民抗戰，將暴敵拖下深坑裏去。

——二七、二二、二八、成都新中國日報——

正人心，息流言，拒邪說，惟有請政府立即正

式宣佈既定國策不變

今天沒有和與戰的問題，只有投降與不投降的問題；沒有犧牲某一部分領土以保全其他領土的問題，只有整個中國存亡的問題；沒有打倒某人某一黨而扶起他人他黨的問題，只有整個中國民族是否願作日本奴隸的問題。安坐在後方的人，也許沒有嘗過倭寇的利害，以為倭寇的貪慾終有止境，如果許他們一點利益，也許可以換得剩餘區域的片時的苟安，不知道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倭寇的野心在田中奏章內早已表現得明明白白，她不止要拿整個的中國，連印度，安南，暹羅，馬來半島和西伯利亞，中亞細亞都在她的大陸帝國計劃之內，今天還妄想靠妥協來保持四川，雲南，貴州等省安全的人，非愚則妄！

我們應該記得日本不但不要「蔣政權」，也不要「袁政權」，不但不要抗日各黨派所聯合支持下的國民政府，也不要參有漢奸分子的冀察政委會式的政府；不但不能許中國有一個統一的中心勢力存在，也不能許中國有真正的地方割據勢力存在；不但不能許忠誠愛

國的分，過問國事，也不許親日聯日的分子真正掌握政權。滿洲偽國的忠臣鄭孝胥總算是對日本極端親善的了，然而尚不容於倭寇，被擯下台，含憤以死，今天主張對日讓步的人，自問對日的誠意誰能超過於鄭孝胥？鄭孝胥尚不能容其執政，何況不如鄭孝胥者。

今天中國多抗戰一天，日本就得多一天用她準備以開發佔領區域的財力，用他準備以肅清佔領區域的兵力，來繼續維持對我作戰，換言之，就是不能完成她的真正佔領，統治，和利用，反之，如果我們此刻對日妥協，就是給予日本以肅清後方的機會，後方肅清之後，再來編練中國壯丁，利用中國資源，以中國來打中國，那時我後方省分所謂安全依然是夢想，而我軍民上下的士氣，經過一番妥協讓步之後，必然銷沈頹廢，再無法鼓起抗戰的勇氣，勝負存亡之數，不問可知。九一八事變以後，就因為我國不即刻作戰，以致日寇得從容肅清東北的義勇軍，安定後方，到今日才能運用一部分東北同胞來對自己國人作戰，這個教訓，豈可忘記？

今日正是國家生死存亡的大關頭，政府和國民的意志如何，決定了有五千年歷史的中華民族今後的命運，我們應該知道，今日中國若亡，很難再有翻身之日，因為日寇不是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滿洲之流，單就運用嗎啡白丸一項政策的毒辣手腕而言，

也可以使四萬萬民族斷子絕孫，永歸消滅。而妥協讓步，就是亡國滅種的一個重要步驟。

今天只要繼續抗戰下去，我們在敵人後方還有百萬以上的游擊勢力，永遠不會消滅，一旦和平妥協之後，這些人至少有一半要因灰心喪氣而退出了游擊的工作，這是自殺的政策。

事實上不但中國的民意決不許主和的空氣抬頭，就是日本今日在坂垣等極端派勢力掌握之下，又在佔領了廣州武漢之後，正夢想着舉而完成滅亡整個中國的大野心，也決無對我妥協讓步之可能。我們賢明的最高領袖及政府，也已有非正式的繼續抗戰的表示，不過流言還是不免。因此爲正人心，息流言，拒邪說以一國是起見，我以爲應該迅速發動全國輿論，請政府立即正式宣佈既定國策不變，非到日軍完全退出佔領區域，恢復九一八以前的狀態，決不言和。

——二七、一二、三一、新中國日報——

按此文發表於武漢廣州失守以後，汪精衛出走之前，當時周佛海尙任國民黨中宣部長，正在製造求和之輿論，見此文後，大爲驚訝，曾自重慶以長途電話向報館詢問作者姓名，經報紙負責人嚴拒始已。

三六、三、五、作者追記於上海

抗戰與民主

這一次參政會中最重要最有意義的提案，莫過於周參政員覽等五十一人所提的「請確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國基礎」一案，原文已經中央社發表，閱者想都已看過，無待複述。

有些人以為抗戰時期，談不到民主，因為抗戰時期即是軍政時期，軍政時期應該是「軍事第一，國防第一，」軍事以服從為主，以號令貫徹，整齊劃一為主，因此根本與民主政治是不相容的，在抗戰期間來談民主，未免為時過早。

這種話實似是而非，這樣的說法，不但不懂民主，而且也不懂軍事，更不懂民族革命戰爭性質下的軍事。

我們知道軍事決不是單講服從，單講整齊劃一，一味服從被動的軍事是舊時封建專制時代殘餘下的舊制度，這種制度把兵士當作機械，當作一味被動毫無自主志願的奴隸，只要趕上戰場就算完事，結果戰爭並非出於士兵的自願，當然更與全國人民無干，這樣的軍隊，一與有民主精神的軍隊相遇，就非失敗不可，這種整齊劃一性的舊式的軍

隊組織，至普魯士腓特烈克大王而登峯造極，腓特烈克當時所遇的敵人是比他更專制，更守舊的軍隊，因此能夠屢戰屢勝，但到他死後不過二十年，他的軍隊就大敗於法國革命後民主化的軍隊之手，直到後來普魯士在沙恩好斯特指導之下，改組了舊式的制度，採取國民兵役制度，將軍事和政治一齊民主化，才又有一八一三年利比瑟的勝利。

從此以後，歐洲大陸上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軍事組織，一種是普魯士化的服從性的軍隊，另一種是法國大革命化的民主性軍隊，前者一味講究服從紀律，講究外表，後者則注重民主自由，注重內心自動的志願，事實上每一次戰爭證明了服裝整齊，機械規律的專制軍隊戰不過凌亂鬆雜，自由自動的民主軍隊，一七九二年普奧聯軍之敗於法國革命軍，一八一三年拿破崙的大軍隊之敗於普魯士民兵，一九一八年德軍之敗於英法美等民主軍隊，乃至荷蘭獨立軍之戰勝西班牙，美國獨立軍之戰勝英軍，都是歷史上有力的證明。

我國這次的抗戰，根據蔣委員長長的解釋，無疑地是一種民族革命解放的戰爭，講器械，講服裝，講專門的訓練，我軍都不如敵人，我們所靠以爭取勝利的就是全國軍民自動憤發的作戰精神，而這種精神就是最後一利的淵源，只有在廣大的民衆都自動起來爭取勝利的條件之下，才有最後決勝的可能，爲着這個，我們必須拋棄一切普魯士化的舊

軍事觀念，採取更進步，更改革的觀點，允許全國民衆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信仰上的充分民主權利，使人民和由人民產生的軍隊都知道國家是全民的國家，作戰是爲保護全民福利而作戰，不是爲保護某一部分少數特殊人物的地位利益而作戰，這樣才能貫徹了民族革命解放戰爭的目的，達到了最高領袖所指示的方針。

前幾天報上曾披露菲利濱先鋒報對於中日戰爭的批評，有兩句話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這兩句就是說：『在近代戰爭之中，軍事國家，封建國家自不如自由開明的國家能支持長期戰爭』日本是一個「軍事封建」的國家，是無疑的了，我們果然已經完全做到了「自由開明」的地步了嗎？如果還待努力，就應該趕快向這個目標去努力，這不但不妨礙及抗戰，並且是爭取抗戰勝利的唯一要素。

——二八年（月日未詳）新中國日報——

建國與法治

建國之道，經緯多端，而其要在於建設法治的國家以代替人治的國家。

近數年來，國家在最高領袖指導之下，統一已漸著規模，建設也突飛猛進，這誠然是可樂觀的現象，但是這種樂觀是有限度的。因為這些成績完全是靠著最高領袖的苦幹精神，和其左右一部分專門人才的努力所造成的。人爲的成分勝過了制度的成分，因此如果一旦主持的人稍有疏忽，或人事稍有變易，則一切辛苦的建設均將有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之虞。

近代國家所以和舊式國家不同之點，就在以法治代替了人治，一切政治的基礎都建設在制度上，無論主持者是什麼人，都得就法治的範圍，不但不許他越法作惡，也不許他越法作善，這樣才是長治久安之道。

譬如就懲治貪污說，與其設許多監察牒探的人員，今天舉發一個案子，明天懲辦一個官吏，不如實行會計獨立制度，使經手官吏無從染指，貪污不禁自。

又如就杜絕倖進說，與其三令五申，告誡大官援引故舊，不如實行考試及銓敘制

度，使官吏進身必須出自考試，按格升轉，則夤緣奔競之風，自然可以杜絕。

從前韓復榘在山東，自己要親自訪察官吏的賢不肖，要訪問民間的疾苦，要審判民間的案件，用心未始不善，但是弄得詐偽百出，政治仍然不能清明，這就是所謂勞而不知爲政。

中國各項事業中以郵政辦理最爲完善，並不是郵務人員特別要比其他公務員清慎勤敏，祇是由於當初郵政在外人指導之下，建立了法治的規模，所以雖然人事屢經變更，依然不會腐化，這個原故大可以供人深長思一下。

大凡在上位的人，總不願意受法律制度的束縛，總希望多有點自由活動的餘地，這種動機是可以原諒的，但是結果靠一個人的力量去訪察弊政，懲治貪污，不過使作偽之風更精密了一些，於事仍然無補，從前有個大官，獎勵儉德，見了奢侈的屬員就要罵，結果大家當他的面做出寒酸的樣子，背後依舊大嫖大吃大喝，這種人治政策不過獎勵人民作偽罷了。

商子說得好：

「世之爲治者，多釋法而任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先王懸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爲其不必

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議，皆不類者也。不以法論智能賢不肖者，惟堯，而世不盡爲堯，是故先王知自議譽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之。毀公者誅之。」——（修權篇）

尹文子也說：

「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大道下）

韓非子也說：

「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耳必不固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姦劫弑篇）

「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難三篇）

慎子也說：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雖當，望輕無已，君舍法以心裁輕重，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之用策，分田之用鈎，非以策鈎爲過於人智，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

治法與國建

躬，則事勦於法。法之所以加，各以分，蒙賞罰，而無望於君。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內篇）

昔諸葛亮治蜀，「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齒，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三國志本傳）——，諸葛武侯的這種法治精神是很值得後人做做的。

——二八年、第二一一號新中國日報（月日未詳）——

苦幹與樂幹

抗戰時期應該埋頭苦幹，這話不成問題。

不過所謂「埋頭苦幹」這一句話裏面，應該注重的是一個「幹」字，而不是一個「苦」字。應該解釋為雖苦猶幹，而不應解釋為凡幹必苦，假使苦儘苦，但是苦而不幹，這苦便不免是白吃苦頭，如果幹也幹了，但是幹而不苦，那豈不更容易提起人的幹勁。

大凡厭苦趨樂乃是人之常情，凡做一件事情，要求效率的增進，與其用鞭策來趕他，不如用糖果來誘他，人能對於所做的事業感覺興趣，感覺其樂陶陶，則不必鞭策自能蹈厲奮發，其效率遠倍於一味苦幹者。現代的新教育家如蒙台梭利之流，對於兒童都主張用誘導的方法，來代替禁止的方法，現代的新企業家如福特之流，對於工人也都主張用減少工作時間，增加娛樂設備的方法，來代替舊式視工人如牛馬的鞭策方法，結果其成效遠過於一味苦幹的方法之上。教育如此，企業如此，政治也是如此。因為一切事業都不能遠於人情，遠於人情的作法結果只有騙人作偽。孔子也曾說過：「知之者不如

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研究工作心理學的人，都知道人類的心理有緊張的時候，也必須有弛放的時候，假使一味張而不弛，結果必使心理逐漸趨於麻痺，工作效率反而減低。一個人日常的生活不能沒有休息和睡眠時間，休息與睡眠並不是浪費精力，乃是恢復精力的主要辦法，一張一弛，是天道，也是人道。所以孔子說：「藏焉，休焉，息焉，遊焉」，老子也說：「當其無，有車之用」。

人類的心理機構至為微妙，有時候看起來似乎是天天緊張，其實暗中已埋伏下弛廢的根源，有時候看起來似乎是弛散，其實暗中已儲蓄下工作的精力。一個人如果前半生生活過於刻苦，過於嚴肅，到了暮年控制能力一弛緩，必然反動到荒唐的境地，所以道學家反動起來特別淫蕩，吝嗇者反動起來特別浪費，因為人類的感情是不能一味壓抑的，壓抑過度，不趨反動，即趨頹廢。善於養生的人，應該使他常常有藏休息遊的機會，則感情有相當的調節，始不至於極決。治心之道如此，治國之道亦不外如此。

中國維新四十年來的政治，有一個一貫的錯誤，就是不懂得一張一弛的道理，一味『揠苗助長』，結果反使『苗則槁矣』。對於國民教育一味鼓吹悲觀喪氣的國恥教育，而不知提倡發揚蹈厲的國慶教育，甚至連國慶日都停止慶賀，結果悲觀失敗的空氣充滿

國中，使民族自認爲低能落伍者，因而養成中國必亡的信念。對於民衆娛樂也一味取壓抑的政策，甚至連廟宇都要搗毀，戲劇都要禁止，結果人人無樂生之心，也就連帶地無積極奮發之氣。這都是過去一般維新志士的短視自殺政策所致。

今天要抗戰必須使全國軍民勇於赴義，有樂鬪之心，無苟安之念。必須使人人視戰場如樂土，視國家如天堂，欲求其如此，就必須改變一向的禁止娛樂的政策，轉而積極獎勵。種娛樂，獎勵人人對於生活的享樂態度，使全國充滿生氣，然後國家始有生機。

誠然，在前方將士浴血苦戰之際，在一般民衆求生不得之際，後方少數公務人員一味花天酒地，驕奢淫佚；實在是應該加以糾正，但是這種風氣決不是用消極的禁止政策所能改變的，並且有些無關大體的娛樂，實在也用不着去禁止。與其禁止公務員跳舞，不如提倡集團跳舞來代替個人的跳舞，與其禁止婦女燙髮，不如徵收高額的燙髮捐以補助戰費，與其限定筵席的費用使閹人趨於作僞，以小賬的名義來代替正費。不如寓禁於征，使社會經濟得以流通，擁有厚資者也可以交際而兼救國，至於如果說前方太苦，後方太樂，人民太苦，官僚太樂，那就應該從提高前方將士和下層民衆的生活福利着手。譬如可以徵發廢集後方的娼妓編爲慰勞隊去到前方調節士兵的性問題，可以徵收上層社會的奢侈稅娛樂稅以作普及民衆娛樂設備的基金，徵收一切私人的園林邸舍來作民衆的

游覽場，提倡集團運動的游藝，以發揚民衆的情感。如最近本市建軍宣傳第一日的提燈火炬遊行之類，這都是比較賢明的辦法。

太史公說得好：「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能懂得這個道理，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如果不懂這個道理，那便是韓非子所說的，「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了。

——第二一二號新中國日報（月日未詳）——

無爲政治論

『無爲政治』爲我國二千年來民族政治哲學思想之結晶，垂諸經典，見諸實際，二千年來，聖哲相承，翕無異議，自吾生之後，受外力之刺激，而後民族思想，翻然一變，向之奉爲經訓者，至是羣焉詬病之，目爲亡國弱種之學說，四十年來，朝野談政治者，罔不以建設改革爲急務，建設也，改革也。胥「有爲政治」之作法也，在此潮流之下，無爲政治之爲人所詬病固其宜矣，猶憶六七年前，胡適之先生鑒於當時所謂建設事業業者之病民，於獨立評論上力主無爲之說，并闡明漢初陸賈新語之說以爲論助，愚當時深贊其說，曾爲文以應之。無如潮流所趨，非一二人所能挽回，適之先生至以此爲人目爲落伍，反動。今者國難日深，世變日亟，謀國是者方以積極建設，迎頭趕上爲立國之大經大法，凡百興革，齊頭并進，惟日不足，於斯時也，而忽揭無爲政治之說，無亦過於違反時代之心理乎？雖然，愚將有說以處此。

夫無爲政治之所以爲人詬病者，曰此黃老之說也，閉關自守時代之思想也，非所以語於大戰國之時代，不知黃老之徒固唱無爲政治，而無爲政治非黃老一家所能專有，實

古代中國各家思想共同之趨向，儒家主制禮作樂者也，然孔子之論政治，則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成焉」。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凡此所言，未嘗有一毫作爲之意。其欲奮然有所設施者，獨周禮一書，則漢代迂儒之偽製也，王莽用之，以殘其民。以覆其國，以殺其身。法家者流，世以爲「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不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者也，然韓非之論政也，則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以待之，彼自以之」，曰「夫爲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慮則下飾辭，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教，審罰賞」，曰「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曰「用一之道，以名爲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倚，故聖人執一而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世皆以商君廢井田，開阡陌，爲千古變法革命之始，不知井田至商君之世，久已廢爲阡陌，商君特因之而已，秦皇李斯之廢封建立郡縣，亦不遘因時之變而爲之制其宜而已，法家曷嘗不重無爲哉。由此觀之，先秦之世，諸子百家，雖齊流并進，而論政之要，則一歸於無爲，而考其制論之世，則正值戰國紛爭之時代，非一統承平以後之議論也，秦漢而

後，善觀歷史消息而斐然制作成一家之言者，莫過於太史公，其論政也，則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太史公豈苟簡之徒哉，彼亦深識夫中國文化之精神與夫爲政之當要而始發爲此言而已，故曰無爲政治爲中國民族政治哲學之結晶者，非過情之譽也。

夫無爲政治之所以爲今世耳食之徒所詬病者，其故蓋由於誤解「無爲」之意義，彼蓋以委心任運，偷惰苟安爲無爲也。不知先秦諸家之所謂無爲者，乃指政府不當妄想包辦一切，惟應因勢利導，使人人自動發揮其力量耳，非盡天下而束縛斲喪之也。故曰「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以待之，彼自以之」曰「四方來效」曰「彼自以之」，是政府自居於無爲而導天下以有爲也，無論任何國家之政府，比諸民衆，究居少數，以少數政府官吏之精神才力，欲包辦盡一切事務，其用力雖甚勤，而收效必甚寡，即使所有官吏奉公守法，鞠躬盡瘁，天下待辦之事正多，亦豈能一一皆舉其事，而況官吏未必盡爲循良，政令未必盡能美善，徒恃人主一人之聰明才力，察察爲明，今日設一官，明日布一令，後日殺一人，號稱奮發有爲，實則死灰槁木遍天下，而惟人主一人勤勞至死，終無濟於事而已，古之人有行之者，王莽是也，明懷宗是也。若此之所謂有爲者，少數人之有爲而束縛天下使盡成無爲而已，堯雖賢豈能代天下人耕，舜雖賢豈能代天下女織，此

其所以用力甚勤而收效甚寡也，無爲政治者則不然，爲人上者，以虛靜自處，以因勢利用，鼓天下之智而不自見其智，動天下之力而不自用其力，因天下之利而利之，則人人樂於有爲，人人樂於有爲則不必鞭笞撻伐而國自治。故曰「無爲而無不爲」。司馬談之論六家要指也，曰「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此卽老子「常其無有車之用」之意。豈惟道 知此哉，中國民族政治哲學之傳統精神蓋胥不外此也。

而或者謂凡此所言，皆平世之論，不可施於據亂之世。大抵承平一統之朝，欲民之安靜不擾，故無爲之說尙焉，方今列國並立，武競是務，有國者方且日日申做其國人而惟恐不及，一日之懈，遺禍百年，方斯時也。何敢言無爲，又何忍言無爲？況今日抗戰建國，百務並舉，前方之整軍經武，後方之建設統制，在在皆需以大有爲之人，領導大有爲之業，以世界形勢言如彼，以國家需要言如此，是以二十世紀以後，一切國家皆已放棄自由放任之政策，而羣趨於干涉統制，政府之干涉統制最力者，其國勢亦最強，反之則雖以英法席豐履厚之國，不免於戰敗，此豈言無爲政治之時乎？此其言似矣，然而

猶未暇深考也，爲斯論者，但見他人建設計劃之孟晉，與乎干涉統制之奏功，遂以爲任何國家，皆可循斯途軌，一蹴而及，而不知凡興一利，舉一事，其間必有一定不可越之步驟，良工不能爲無筭之築，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人但見現代強國之突飛猛進，而不知其奠基實在於數世以前，使無十八世紀以來普魯士之軍事組織與夫官僚政治之訓練，則希特勒雖英雄不能以八年而舉席捲全歐之大業，使無大彼得以後現代化之基礎，則布爾什維克黨人雖日日言五年建設，亦豈能於咄嗟間造成國防之完整壁壘乎？夫言建設則人才經濟皆須有先期之培植，言統制則調查統計皆須有預立之規模，苟並此而無之，則所謂計劃云云者，僅成其爲紙上樓台而已，至於國民精神之培養與夫道德心之鍛鍊則又一切建設統制政策推行之先務矣。吾先民知其如此，故其立言曰：「禮樂百年而後興」。又曰「雖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知建設之不易，而言之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曩年愚在醒獅週報嘗爲文討論建國計劃，主張建國事業應分三期，第一期爲休養生息之時期，在此時期政府所應作者祇爲吏治之整飭，治安之保障，其餘一切應儘量讓民間自由發展，使民力由寬裕而充實，人心穩定，國基自固，然後始能進入於第二期之培植時期，在第二期中，政府應集中全力於交通之開發，教育之建設，使人才與環境兩者均有準備，然後始得再進而言第三期之大規模建設開始，此其意見，至今仍堅持如故，此文發表在十

餘年前，當時正在軍閥內戰時期，民生之凋敝，國勢之淩夷，俱非輕言建設之時，而必以休養生息爲主。今雖時異世遷，然而國土淪陷，戰亂相尋，民生之苦痛或更有過於曩日者，然則今日而言國家之建設，吾言或尙不無一顧之價值乎！

建國之要既如此矣，以云抗戰，兵員之補充，財政之徵發，軍備之充實，交通之開拓，在在皆須民力忍受重大之犧牲，此爲國民應有之負擔，無人敢加以反對，然在執行政策之時，亦須同時兼顧國防之需要與民力所能擔負之最大限度，何則？目前中國之抗戰爲國際最大戰爭之一，其性質爲長期的，其最後勝負非僅決於戰鬥之進退而實決於整個國力之充實鞏固的程度，國力何由以表現？表現於民力，更表現於民心。故戰勝之要，在固結民心，安定社會，使一切潛伏的病菌無由發作，能支持至最後五分鐘者，卽爲最後勝利者。而其所以致此，則必在行簡易之政，布寬大之法，使民與環境相安。有樂生之心，無畏死之念，然後始能親上死長，與政府共患難而效死勿去。昔漢高入關，與民約法三章，除秦煩暴，而三秦自定，道偵塗察之術，偶語棄市之禁，一概勿用。馬文淵之遨遊於二帝間也，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反盛陳陸戟以延故交，此井底蛙耳，惟世祖能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是戰爭之際，文法貴於簡易而不貴於繁苛也，孰謂無爲政治無裨於抗戰哉。

夫無爲政治非委心任運飽食終日無所事事之謂也。特觀爲人上者善執天下之樞機以因勢利導，而不與田夫野老爭一手一足之烈耳。政治一技術問題也，不知爲政之要者，終日驅其政府人員辛苦不休，人人而訓練之，事事而干涉之，似若有爲，而所遺甚多，流弊甚大，此正如手工業技術下之生產事業，所恃僅匹夫匹婦之人力耳。善爲政者則不然，彼以國家爲一大工廠，全民爲一大機器，組之以法度，運之以神智，因其勢而利導之，所費僅彈指之力，而凡百庶事樞紐一動，自若跳丸轉轂而不能自休，此無他，恃機械而不恃人力之效也。無爲政治精意如是而已。

是故善言無爲政治者必謹法度。法度之於國家，猶齒輪引擎之於機器，所以執簡御繁，運萬彙於指掌者也。人治之效有限，而法治之效無窮。法治有時而不效者，非法治之無效，乃有法而不能執守之過耳。善爲國者，不貴用人，而貴用法，法不貴繁而貴簡，不貴高深而貴平易，立法之始必度人情之可行者而制之，法一定則不可易，朝令夕改，使人耳目不知所從，雖有聖智無能爲教，法之行必自上，必自近，無有例外。不於法外賞人，不於法外罪人，賞罰之權不操之於一心而一斷之以法，雖布衣走卒皆能據法以爲斷，如是則國是定而人無徼倖之心，人無徼倖之心則自能各奮於所業，而爲人上者可以無爲而治，市恩於私門，門巧於暗室，使有法而不能行，雖日日鞭策其國人，將何

爲哉。故善言無爲者，必自謹法度姑。

法度定矣，而所以運用之者則在於審勢，法之形有定，而勢之變無窮。故守法易而審勢難。中人皆可以守法，而上智有時昧於審勢。審勢之要在於不持成見，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言雖爲修身，可以與言爲政。世之爲政者，每好以一己之見強人以必從，爲其下者又復從而阿諛煽揚之，孔子所謂「一意，必，固，我」之蔽，一一皆犯之，雖其善者不過用一人之智而已，將何以應無窮之變哉？此其蔽皆在乎有我。夫專己自私，匹夫小人之事也，而非所語於執政，執政以身任國家之重，則不能不棄小我而就大我，彼其身已臻爲國家之代表，則其所以自處者，非獨個人小己之能而已。故人人可以有爲，而權勢愈高，責任愈重者則愈當以無爲自律，惟其無爲，故能匯天下之智而爲己智，集天下之力而爲己力。其所舍愈多，其所就愈大。易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此豈沾沾於有爲者之所能躋哉。

儒道法皆言無爲，而又皆言因循，因循者無爲政治之核心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鐵基，不如時」，因循者。因勢利導之謂也。古之善爲因循之政者莫如管仲，桓公實怒蔡姬，管仲因之以伐楚，今之民古之君也，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圖始，卒然語以非常之業，加以難行之法：莫有不掩耳而疾走者，善爲政者，因其勢而

善導之，不善爲政者逆其勢而與之爭。夫民猶水也，導水使就下則易，逆水使趨上實難，拂民之欲，而欲以成大功，難乎其爲政矣，夫惟能無爲者，始能審當前之勢因而利導之，及其成功，有過於拂民之欲者萬萬，奈之何其弗思也。

夫爲政者之所以因民之欲而鼓導之者，所恃者何哉？一曰義，二曰利，此兩者人心之所同也。人心莫不有好義之念，因其勢而利導之，則鄙夫可以與效死。抗戰以來，舉國影從，辛苦五年而不稍泮渙者，豈非愛國大義有以範圍乎人心者哉。然徒義又不能以久行也，則又必繼之以利。爲天下者與天下共其利，爲一國者與一國共其利，利散於人則衆集，利集於一己則衆散，故爲國者不患言利而患利之不溥及也。夫人心莫不嗜利，利之所在，不策而自勉，爲國者苟知此義，則行政之推行不必待鞭策之時時隨其後也，無爲政治者無他，與天下共其義，亦與天下共其利而已矣。

中國古聖王相傳之心法曰「允執厥中」，執中者又無爲政治之精意也。世之蔽於衆儒理欲之辨者，每以爲人欲之外別有超然之理，而所謂中者，卽懸於此超然之理界內，於是專制之主，偏執之臣，各以其所謂中者責人於廟堂之上，而中之理愈晦。清世宗之著「大義覺迷錄」也，明代諸臣之議大禮爭三案也，皆以其偏私之見而強指爲事理之中，其所爭愈烈，其去中愈遠，而馮道之徒，持模稜兩可之見者，又誤以關停折半爲中，

此兩者各有所蔽。夫古之人言中者必言庸，又必言和，故中之理非懸於象外，實寓於此圓顯方趾之寰中，質言之，中庸者常識之見耳，多數之意思耳，人欲之諧和調整者耳，善爲政者，卽在能於雜然抵觸之諸多意見中，求得一人情事理之當然軌徑，所謂「允執厥中」者在此。而必爲政者自處於無爲無欲，始能於人情事理之間尋得常識上之中點，否則將執一己之見而悍然指爲絕對之中矣，尙何能物來而順應哉！

夫無爲之政，其立名似淺，其寓義實深，雖累千萬言不能盡說，然尋其要點，則不外「天下爲公」四字，惟公則無私，無私則無我見，無我見則可以守法度，審勢宜，因民之欲而善導之，不至有四海困窮之失，世之善用無爲政治者，不必其心果公，然必以無我之見應事之變。方其初著無所利於天下，及其有成，天下不足以盡其利也。何必斷斷爭一時之喜怒得失而後始爲利哉。

無爲政治之思想大成於西漢，而政治上之收效亦以西漢爲最著。高帝創業之始，卽懲秦苛暴，力反所爲，以寬大爲教。高帝之爲人，智不如良平，勇不如絳灌，其人蓋百無所能者，惟其無能，故能盡用人所能，收天下英傑於彀中，以視項羽之喑鳴叱咤，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者，度量之相去不啻天淵，彼其一生，所用者概爲無爲之術，而又輔以子房之陰教。黃石公圯下之事，所以教子房者，在於能忍，在於不與暴秦爭血氣之勇而

陰持其隙以 天下之變，蘇長公論之詳矣。黃石以是教子房，子房以是教高祖。方項羽之自立西楚霸王而封高帝於漢中，雖帝之豁達大度有所不能忍也，子房則勸帝因燒棧道以示無東還意。及羽殺義帝而東擊田齊，子房則勸帝因而爲義帝發喪以收天下之心。韓信兵下三齊，謀自立爲假王，子房則勸帝因而真予之，諸將聚議於沙中，謀爲不軌，子房則勸帝因封雍齒以安反側，及夫鴻溝定約，羽以糧盡而東歸，子房則勸帝因而擊之。此五者，劉項成敗之大關鍵也，而皆得力於因勢利導，勢不可爭則避之，勢可爭則崛起急爭而勿失，凡此皆無爲之術之一端也。漢之君臣承高帝子房之遺教。以無爲爲訓，對內對外概用此術。曹參爲相，知天下初定，不可以更煩擾之使復亂，故自居於無能而以追隨蕭何成規爲務，客有來見者，飲以醇酒，使毋妄言興革。冒頓之遺書謾辱呂后也，季布請斬樊噲以杜大言壯語者之口，彼蓋審知當時內外之形勢，而知其非如此不可也。文帝繼之，其一生蓋純粹乘無爲之教者，趙佗稱帝於南越，高帝所不能屈，而帝以一紙書屈之。吳楚諸王，割據江南，尾大不掉，買誼所以痛哭流涕，而帝賜几杖以安之。漢初羣臣，張良，蕭何，陳平，周勃，陸賈，婁敬之流，概知無爲之要義，其奮然欲有所設施以改絃更張者，獨一少年氣盛之賈誼耳，誼亦幸而不用而已，使其得志，欲其不爲王安石之變法失敗不可得也。吾嘗深考西漢初當時之情勢，國基初定，人心未安，匈奴

坐大於北方，西斷河湟，東盡遼海，成三面包圍之勢，高帝以百戰精兵三十萬衆，而困於平城，當斯時也，漢之爲漢，幾幾乎有晉宋晚明之危，使其君若臣不察形勢，漫然爲自欺欺人之壯語所中，樊噲之徒將其軍，賈誼之流持其政，內則法令紛更，外則戰鬪輕啓，漢之爲漢，未可知也。獨幸當時中國民族尙在務實而不務虛之神智健全時代，南宋晚明理學家所造成之囂張氣習尙未深中於士大夫之腦府。漢初之士大夫皆自農民出身，故思想平易而近情，始終持無爲之教以立國，文帝之末，家給人足，太倉之粟至朽腐而不可食，匈奴雖強，顧無釁以啓之。至於武帝，遂能席累世之資，乘匈奴之衰，而開大有爲之盛業。武帝之大有爲，自高祖以至文景累世無爲之所賜也。此其成敗之林，蓋有大可以供吾人深考者也。

並世世界各民族中，善用無爲政治者莫過於英國。其對內對外亦概採無爲之術。民權運動在他國爲釀成革命之媒，在英人則爲改良政治之階梯。政府對於民衆，不但不採禁錮壓抑之手段，且常迎其勢而利導之。一八三二年改革憲法之爭，貴族恃其上院之多數屢駁下院之議，而其君若相反助民黨以抑貴族，勅任同情民黨人士爲上院議員以改變議場之形勢，憲法改革案終於通過而革命得以不作。世界任何政府莫不嫌忌反對黨，而英之反對黨領袖乃與國務大臣同領國庫之薪給，同成爲憲法之一部，故曰「陛下之反對

黨」。英之貴族至今仍爲國家之中堅階級，其所以然者由國王每年勅任民間出身之社會領袖若干人加以封爵，以增加貴族階級之新分子，故英之貴族得以不至完全朽腐。凡此皆因勢利導之一術也。其馭殖民地也亦然。因其舊俗而不革，寬其羈勒而不禁，爲之役屬者久而忘其爲屬國，故西葡諸國之屬地皆不數世紀而失，英國獨得保存至今。其滅印度也，一公司之力耳，克萊武因印人種族宗教之仇怨，用印人以制印人，坐得一大國，至今治印度者仍持其術，利用土王以反對進步開明分子之獨立運，其於印人之優秀者，則誘之以官爵，分之以權位，使其效忠而非叛，凡英人之所以宰制印度者，皆無爲之術也。當十六世紀以還，歐陸各國日尋干戈以爭進退於大陸咫尺之地，英人獨持人棄我取之術，拓地於海外，坐得全世界之半而人不知，其術亦誠狡矣，問其根柢，則不過無爲之術之一端而已。

其次，蘇俄近年來之政術，亦有深令人注意者。俄之內政，純以劫持專霸爲務，帝俄然，今之蘇俄亦然，其去無爲政治甚遠，其道太毅不可以久，故不具論，獨其近十餘年來之外交方略，則亦可謂深得無爲政治之竅要，其得力在於審勢。九一八之後，日寇囊括東北，駸駸有北進窺俄之意，俄人知勢不可敵，則隱忍退讓，寧以廉價出讓中東路而不與較。及七七中日開戰之前，日人砲擊黑龍江俄艦，以試探俄人之態度，俄則又隱

忍示弱而不與較。於是日人趾高氣揚，遂陷入「中國事變」之泥淖，俄人得乘機以藉務其東境國防，中日之戰俄之所深利也。最近之蘇日中立協定又爲曠使日本陷入南進泥淖之一大手法，鬥日美於南洋而坐持其變，此又俄之所深利也。其於歐洲事變亦如之。德蘇協定之結果爲驅德國與英法戰於西歐，德人犧牲生命武力，僅得征服十四國，俄人按兵不動，亦攘得波羅的海三小國及波芬羅馬尼亞三國之土地。今日德國武力正在如日中天，俄人則迎其勢而與之合，未嘗以德之染指近東而忿忿與爭也。吾人試回想數年前，國家環境之惡劣，四圍仇敵之多，孰有過於蘇俄者，乃數年之間，向之仇敵皆已化爲友國，東境西境晏然無事，國防因以整頓，國際地位因以日高，此何術之恃哉，蓋亦彼之領袖深察夫「物來順應」之術，而能因勢利導而已，此眼前之例，爲吾人所熟知者也。

嗚乎！世變日亟，來日方長，吾以弱國而孤處於虎狼之間，抗戰將及五年，勝利猶待努力，軍事也，政治也，外交也，經濟也，一一皆須以非常之眼光手段魄力應付之，此其不易，曷待煩言。願吾聞最高領袖之詔示矣，曰「以不變應萬變」。夫萬變者，外界之勢態也，不變者運用之一心也。事變無窮，非我所能主，而能主者在我一心，我之心誠虛明焉，寧靜焉，不動一毫成見，不動一絲感情，「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一不爲物先，不爲物後」，相其機而利導之，則內外之事態雖千變萬化，吾何懼哉。吾之先民予我以深厚之文化遺產，吾恃此五千年民族智慧經驗之結晶以應付一切新進之民族，吾綽綽有餘裕矣。吾故曰亦有「無爲」而已矣。

——三〇、五、二〇——二三、新中國日報——

他山之言與吾人之反省

第三次全國財政會議於本月二十日開第三次大會，平準金管理委員會美方委員福克斯君曾出席發表演說：全文已見昨日報載。吾人讀福氏演辭之後，深覺其言皆中肯綮，以甫履此土不過數日之客卿，所發言論竟能如此中肯，吾人除欽佩其觀察力之銳敏，不愧專家之名外，又深覺自慚。何則，福氏之所言，皆吾人平日所欲言，而不能言，不敢言者也。國人不能自言，而使外人言之，稍有良心者，當知自愧並求所以反省之道矣，故特疏舉福氏言中之要點而複述之，以供吾人之反省。

按福氏之辭，言簡而意賅，總其要點，不外以下數端：

其一，福氏述其來華後之第一印象，爲中國人民抗戰意志之堅決，而抗戰勝利之道，在於全國之精誠團結，故其言曰：「無團結則國家不能生存，國內團結一致，乃中國基本力量之所在，可以粉碎一切敵人征服中國之企圖，深望中國人民不惜任何代價保持其國內之團結，各黨各派應本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之立場，捐除成見。」其言之懇摯如此，中國過去偶因一二黨派之不知大體，互相摩擦，致來外人之懷疑，而始有今日之

忠告，反躬自問，寧無愧怍。抑國人聆福氏言論之後，今後果能澈底捐棄成見，不惜任何代價以保持其團結到底乎？此吾人所應反省者一也。

其次，福氏以爲「中國之所以能精誠團結，乃由於政府與人民間具有一種真正之民主關係」，而又幸有偉大之領袖領導之。「美國所以願意對中國繼續增加其財政上與軍需上之援助」者，乃「希望中國民主政治生活之能推進也」。中國今日既站在民主國家立場，希望取得美國之援助，則今後政治自必向民主主義方面推進，且非此不可，可無待言，然吾人反躬自問，今日一切政象果已澈底舉民主之實，而不至仍迷戀於法西斯納粹之反動思想及制度乎？三民主義所標舉人民應有之選舉，創制，罷免，複決等民權，果已真正實行乎？民主國家人民最低限度之應享權利，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果已慷慨賦予乎？真正代表民意之憲法果已制定乎？此吾人所應反省者二也。

又其次，福氏以爲「欲使此次財政會議真能成功，吾人必須使全國各地自中央以至地方財務人員絕對能滿足下列各項條件，如增進設備，改善手續，健全機構，與慎選人員是也」。「今值戰時，新式的及更近代的方法，必須引用，公務員必更需有堅強之信念，并加強其屬員與民衆之信念，今日各種措施對國庫有極大之影響，財政與金融政策必須調整，使能適合此新時代之需要」。「財務行政人員若能不偏不袒，不屈不撓，認真

收新稅，則對已往民主政治之信念乃可繼續維持於不墜。租稅制度必須集中，然後租稅行政方能適當訓練及使用租稅人員，無此項人員則一切財政制度均無法成功也。美國之文官任用法現正推進適用於全國所有公務人員之任用，此值得注意者」。吾人反躬自問，今日中國之財務行政，其設備果已增進，手續果已改善，機構果已健全乎？現有之財務行政人員，其登用果盡依文官任用法之規定，而無徇私請託之弊乎？果均受過嚴格之訓練乎？所有人員果皆能不偏不袒，不屈不撓，獲得民衆之信仰乎？此吾人所應反省者三也。

又其次，福氏演說又謂：「健全行政機構之建立，使能在組織健全與制度統一之預算監督下，靈活運用，必須保有近代之會計制度，與完整之會計報告，將政府之財政情形充分表露之，爲民主國家重要之特質」。吾人反躬自問，中國今日之財政制度果已統一乎，預算果已確立乎？近代之會計制度與完整之會計報告果已保有乎？政府之財政情形果已充分向人民表露而具備此民主國家重要特質之一乎？此吾人所應反省者四也。

凡此四端，福氏言之深切著明如此，爲外獲友邦之同情，內博民意之擁護起見，吾人深望政府在此次財政會議之後即一一依言次第實行：庶幾大信可昭於天下，則所謂田賦徵收實物也，收歸國有也，土地與糧食政策之推行也，全國人民孰不樂於擁護而觀厥成哉。

戰後國策研究的重要

——戰後國策研究序論之一——

此時便來談戰後問題，似乎爲時過早，但是戰爭無論打到一百年，也總有結束的一天，在戰爭結束，和會召集的時候，在戰後的若干年以內，任何國家總須有一個確定的國策，才能免於臨時應付，手忙腳亂之苦，我們經過這一番的苦戰，總算得知國際情勢的險惡，難道這些險惡的因素一到戰後便會一齊雲消霧散，永遠不會重生嗎？拿上一次歐戰的例子來看，拿無數的人類的歷史來看，我們不敢相信這種奇跡。蔣委員長在本年元旦告軍民書中曾經指出：「自助人助是不易的真言，世界種種事都首先要靠自己……而從立國久遠的基礎上來講，更要十分警惕。須道知如果我們的社會，政治，經濟，教育沒有真正自立的基礎，即使我們的軍事勝利了，把敵寇消滅了，我最後仍有失敗的危險，凡是不能真正自強自立的民族，徒然依賴外間的形勢而疏忽大意，甚至驕矜懈怠的，最後必然失敗。試看古今歷史，常有打了空前勝仗的國家，却在十年二十年之後，遭受更大的失敗，甚而至於淪亡的，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就在最近歐洲戰爭中，也有

若干國家足爲我們的鑒戒。今後的世界，更沒有一味僥倖而能生存的民族，一切都靠着自身真正立國的實力……。」我個人完全同意蔣先生的這一點看法。近三百年來的中國人，在異族專制的朝代下，養成了一種苟且敷衍的性格，凡事只講眼前零碎應付，不敢稍涉遠大之想。卽偶有一二遠見有識之士，發爲議論，不是目爲空想，則被斥爲怪論，這種現象實在是民族文化衰老的表現，不但過去的中國人有這樣毛病，就是現在正吃苦頭的英美民族，又何嘗不如此？英國人是最講實際應付的民族，但也就因爲太過重現實而忽視遠見，才弄成今天手忙腳亂的局面，試想，二十年來的英國執政者，如馬丹諾，鮑爾溫，張伯倫之流，如果能稍稍有點遠見，世界何至鬧成今天的樣子？民族和個人一樣，有偏於理想者，有偏於現實者，二者都是過猶不及。德日等國因爲過偏於誇大的思想而不顧實力之有限，以致今天樹敵過多，終不免於失敗；英美等國則又過偏於現實而缺乏遠大的見解，也不免要吃點眼前苦頭。我們中國人的性格近似英美，在今天，要救正這種缺點，雖不必一定過爲非常可喜之論，但是稍稍把眼光放得遠點，總是應該的。

中國的抗戰到了今天，才算到了展開正面戰爭的時代，我們既已與二十五個同盟國家聯爲一條戰線，非完全擊潰敵人力量，決不中途妥協，在前途苦惡的奮鬥裏，我們無

論任何犧牲，總要爭取最後勝利，並且我們也相信最後勝利一定會到來。但是勝利之後又怎麼樣？我們的抗戰不是單要爭取軍事的勝利，我們所希望的是在勝利之後能夠永遠保持我們獨立自由的國家地位，不至於再受這樣一次或數次的慘痛教訓，因此，勝利固然要緊，而如何在戰後確保勝利，確能收到勝利的戰果，則尤非易事。正如最高領袖所指示的，「如果我們的社會，政治，經濟，教育沒有真正自立的基礎，即使我們的軍事勝利了，也敵寇消滅了，我最後仍有失敗的危險」。況且戰事一旦結束，和會的問題就立刻要到來，我們預備在和會中主張些什麼？要求些什麼？反對些什麼？預防些什麼？這都不是咄嗟之間少數當局者所能解決得了的，必須在此時起，就動員全國的腦力，學力，根據國族的理想，歷史文化的背景，國際的形勢，和自身的力量地位：切切實實仔細細，作一番通盤的打算。最近大公報曾主張在最高國防委員會下設立一個「戰後國際安全設計處」（見去年十一月三十一日該報副刊戰國報第五期公孫震先生論，「此後天下，此後中國」及本年一月五日，該社社評）我個人非常同意這種建議，但在政府未經設立此項機關之前，我們也不妨以私人資格先行擬議一下。運籌於帷幄之內，折衝於壇坫之間，不是我們的責任，但我們也不妨以草野蕪蕪之見，對於帷幄和壇坫貢獻一點參考的材料。

自然，我們不知道戰爭可能於何時結束？我們也不知道在戰爭中有將如何的新變化？我們更不知道將來敵人的失敗會敗到什麼程度？我們的勝利會勝到什麼程度？同盟國的勝利是否就是我們的勝利？我們的勝利是否也就是同盟國的全盤勝利？因此有許多問題不好預擬。但有幾點我們不妨預為假定。第一，我們（包含同盟國在內）在此次戰爭中必須勝利，因為不勝利就要滅亡，那麼一切問題就無從提起了，因此我們討論到戰後國策，必須假定我們在戰事中要打敗敵人這一點上。第二，勝利必預是完全勝利，最低限度也要做到解除侵略國家的侵略武裝，否則便不必談起，關於這一點，羅邱宣言和此次華府二十六國盟約俱已堅決聲明，中途妥協的事可以不必憂慮，此次戰爭無論在民主國家或軸心國家方面，都是賭國運於一擲的孤注戰爭，雙方領袖知之甚明，所以決無中途妥協之之可能，中途妥協就是滅亡，民主國家再不會上這種當了。第三，民主國家既聯為一條戰線，利害存亡彼此共之，所以也決不會有一二國家中途拆台的事發生，因為中途拆台的結果不但友邦不利，自身也必無好果，事實上二十六個同盟國之中，已經有許多是流亡政府，早已無台可拆，其餘的國家至多戰爭一時不利，也不過再援例流亡一次，有何中途退出陣線之必？所以這一點也不必憂慮。

根據這三點認識，所以我可以把我們的論點建築在以下三個假定的基礎上，第一，

盟國家必獲最後勝利，第二，勝利必要全部的勝利，即消滅敵人的主力，就我們中國言，還須加上敵人全部退出國境。第三，勝利必然是大家的勝利，即不能是友邦勝利而獨令我向隅，有了這三點假定，才好預擬我們的戰後國策。這三點雖是假定，但卻是必要的假定，因為這三個假定若不能實現，其反面即是我們的滅亡，一切問題就都不必談了。

只有兩個問題不好假定，第一，這戰事要延長到多少年才會解決？這一點關係不大，姑且不問。第二，我們中國在這次戰爭中將有如何的貢獻？將遭遇如何幸運的或不幸的變化？這却是決定戰後國策的必須注意之點。這問題一半靠自己的努力，一半也靠天運。天運不必提，人事却必須盡到。我們所以要提起這個戰後國策的問題，也就是促我們盡到人事的一種辦法；我們必須確定了我們在戰後和平會議中所想要得到的結果，我們才能按照步驟在此時就預先打下了基礎努力做去。譬如說：我們在戰後希望收回東北失地。則在此次戰爭中必須準備把國軍開到東北，辦到驅逐敵人出境，若是單等別人替我們打敗敵人，收回失地，則到了和會裏，是否真能慨然雙手奉還，以國際上的成例來看，似乎還沒有這麼容易的事。

此外，戰後的國際形勢，也是必須考慮到的一點。我們自然可以說民主國家必獲完

全勝利，但勝利之後是否仍能常保彼此的和協？各國的內政在此次戰爭中有無變化？國家的獨立自由和國際間的團結合作兩者的關係如何？戰後資源的分配，利害的調節，文化思想的演變，社會組織的演變，各將如何？對於我們的國策都是息息相關，以後我們將首先討論到這幾個問題。

現在，我們假定戰事可能於明年（一九四三年）杪結束，和會於一九四四年召集，和會地點也許是華盛頓，戰事的結果是軸心全敗，至少日本的主力被消滅？（依我的看法，希特勒的崩潰或許還要先一步）。根據這些假定，擬定我們在戰後和會中應爭取的條件，此後三十年內國家對內對外應採取的方針。

——三一、一、十二、新中國日報——

戰後國際局勢

——戰後國策研究序論之二——

我們要研究出一個戰後整個國策的方案，首先必須對於戰後的國際局勢有一個通盤澈底的了解，預言是一件很危險的事，也是一件最不可靠的事，世界上沒有任何人能對於未來的世界局勢完全預測得一點不錯，但這却不是說世事完全不可預測。具體事實上的預測自然是容易錯誤，因為其中含有許多隱秘的及偶然的因素為我們所無從知道者，但原則上的預測却大體可以不差。

我們現在要討論戰後的國際局勢，自然不能不以去年八月十四日發表的羅邱聯合宣言為討論的根據，自本年元旦二十六個同盟國家簽訂華府公約以後，羅邱宣言中所舉的八原則已由美英兩國的主張，變為全體同盟國家的主張，包含蘇聯，中國，印度，及部分美洲國家在內。最近汎美會議的結果，南美諸國的態度也必更為鮮明，頗有參加公約的可能。如果民主國方面完全戰勝，軸心國家潰敗，則戰後世界的建設自必以此八原則為根據，不會有什麼大的出入，因此我們的討論即可由此出發。

按羅邱八原則中的主張，分析起來，約可分別爲五項：甲、關於各國領土主權的尊重及恢復問題（第一二三條）；乙、關於戰後經濟合作的問題（四五條）；丙、關於戰後世界和平安樂的保障問題（第六條）；丁、關於海洋自由的問題（第七條）；戊、關於解除侵略國家武裝及裁減軍備的問題（第八條）。我們試就以上五項分別討論其能完全實現與否。

甲、關於領土主權的尊重及恢復問題，自爲此次二十六同盟國之反侵略戰的主要目標，亦即中國抗戰四年有半的主要目標。戰後如同盟國家完全勝利，此項主張自必實現。但如欲完全依照此原則而實現，則必發現種種困難，第一，同盟國家彼此之間在戰前關於領土疆界問題本存在有許多爭執，如蘇聯與波蘭。第二，此次尚未參加同盟之國家，將來一旦參盟，是否亦將允其援例恢復領土主權，是否不與其他盟國利益衝突？如波羅的海三小國之於蘇聯，如羅馬尼亞之於比薩拉比亞，如愛爾蘭自由邦之於北愛爾蘭。第三，參加軸心的國家，戰敗之後，是否仍許其保全領土之完整，如芬蘭，匈牙利等。第四，奧國是否仍認爲德國之一部份，抑贊助其獨立，如承認奧國人民之民族自決，則倘奧人因種族關係仍願與德合併，則是否德國勢力仍嫌龐大？如強爲分割，是否違背民族之自由意志而更伏將來的危機？第四，如徹底尊民族自決，則印度，緬甸，

越南，馬來，荷印，香港，澳門，及非洲等地是否亦可尊重當地多數居民之自由意志，聽其自決？凡此種種，在實行上均有困難，而在戰後共同敵人一經消滅以後，此種矛盾必更顯著。

乙、關於經濟之平等享受及合作問題，自爲安定戰後世界的主要問題，但其中亦有種種困難，同盟國家彼此間不但在經濟制度上有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顯著的差異，即國民經濟生活程度亦彼此不同，對於經濟落後的國家是否仍准許其採關稅及其他經濟自衛的政策？如准許，則與宣言原則不符，如不許，則經濟落後的國家勢必不能抵制經濟先進國家的經濟勢力，將永遠淪於殖民地之地位，無法自振。此外，人口多勞力賤之國家，如能自由取得原料及貿易權，則人口少勞力貴之國家亦有受窘之可能。又如世界有許多重要資源，皆出產於尚未取得自由獨立的殖民地中，此等殖民地之地位如不能明白確定，則將來關於資源問題必仍多糾紛。又世界經濟及對外貿易在戰前已有趨向於國家計劃統制之趨勢，戰後是否更加劇烈？如一國之對外貿易全由國家政府所統制，則貿易政策自必與外交政策一致，結果名爲平等待遇，仍不免有畸輕畸重之傾向。此外，戰敗國家如與其他國家享受平等之貿易及原料購取權，則如德日兩國人民之勤勞且有高等工業化之技術，是否在短期間即能恢復繁榮，更進而爲擾害世界和平之動力？這些問題

也都是不容易解決

丙、關於戰後重建和平安樂的問題，宣言第六條所載僅係空洞之原則，並無具體方案，前述政治經濟上兩項矛盾無法消除，則雖有其餘七條的規定，亦無用處；故在戰後必須提出一種「廣泛永久之普遍安全制度」的方案，此項方案，自必早在各國政治家之意計之中，并有許多專家早已從事研究，我國關於此項討論似尙付缺如，本文即係爲此而作。

丁、關於海洋自由的問題，爲英美兩國多年爭執之點，此次已因英國之讓步而解決，但戰後和會中應如何使之實現，不至再蹈威爾遜十四條之覆轍，亦不可不加以顧慮。我國目前未發展海上勢力，但僑民徧布於六洲，將來終有建設海洋勢力之一日，對此問題亦不可不加以致慮。

戊、關於解除侵略國家軍備及普遍裁軍的問題，自爲吾人所歡迎。但國際間的種種矛盾如未能解除，則所有云云仍不免空話。上次歐戰後德國軍備已被解除，但到希特勒上臺後，重整軍備的計劃並未受到阻礙；蓋因國際形勢千變萬化，舊時之敵轉瞬間即可變爲朋友，舊時朋友亦不難一變而爲敵人。在此國際勾心鬥角的情勢下，如誤信列國能共同制裁侵略國家到底，事實上決無此理。即使勉強造一國際聯盟式的制裁機關，而

因列國利害不能永久一致之關係，結果亦一樣無效。凡爾塞條約對於戰敗國家的處分不爲不酷，但曾幾何時，希特勒之報復即起，戰勝國家所受的慘禍更甚於往日；由此可見報復政策即使能堅持下去，亦未必是長治久安之道，況國際的形勢並不容許真能堅持報復到底嗎？

由此看來，我們雖認羅邱宣言中的八項原則，已較威爾遜之十四條進步，不妨即作爲討論戰後世界問題的根據，但也不可過分相信此項「世界憲章」的價值，尤其不可過分倚賴，以爲今後世界有此八條，即可永息干戈，進入大同樂土，若有此念，勢必重踏第一次歐戰後，各弱小國家相信威爾遜十四條的覆轍，受更大的慘禍。中國國民必須以自主的立場，正視未來國際的種種現實，獨立地有一番打算。

我以爲戰後國際局勢的演變將依以下的路向進行：

- 一、小國的時代已經告終，今後開始的是大國時代，人口至少在一萬萬以上為民族，才有獨立於世界的資格。
- 二、各小國將依利害情感，和文化理想的分野，分別依附於少數大國，構成一個聯合的單位，或共同的生活體。
- 三、今後世界上沒有孤立自足的國家存在的餘地，但也不會是全人類構成一個世界

聯邦，今後國際政治的單位不是以前的民族國家，也不是尚在理想中的世界聯邦，而是上面所講的那樣一個聯合的單位，我們可以叫他做聯合的國家，或集團國家。

四、由封建國家進化到民族國家，由民族國家進化到那樣由若干國家聯合而成的集團國家，是人類歷史上時代的必然路線。是國家主義的發展，膨脹，而非消滅。

五、這樣的集團國家，在現今的「英聯」和「蘇聯」兩種政治組織內已早露端倪，今後可以預測者，如北美中美諸國將以美國為中心而構成「美聯」，希特勒所夢想的歐洲合眾國雖因純以武力推行政策，而不顧及民族的情感，終必失敗，但中歐的條頓民族，將來未始不可依和平合理的方式構成「中歐聯邦」。此外如南歐的拉丁諸國，如東南歐的斯拉夫諸國，如西亞的回教諸國，如印度洋上的印緬諸國，如南美洲的拉丁諸國，亦未始不可各自構成一聯合的單位。

六、聯合構成的基礎，第一是血緣的相近，第二是歷史文化的共同，第三，是地理和經濟利益的連繫。此外政治人為的力量當然也佔重要成分。但純用武力侵略方式不能造成。

七、中國在過去二千年中，已將東南亞洲各民族團結成一文化的集團，今後如一旦復興，則東南亞洲的黃色民族，由文化的溝通進而為政治的連繫，自屬順理成章之事。

日本以少數文化後進的民族，強欲以武力推行征服的政策，其必失敗自屬無疑。

八、過去以少數遠來民族支配多數土著的殖民地政策，在此次戰後無論勝負誰屬，自必有一個改變。強迫佔領的殖民制度終必崩潰，代之而起的是志願聯合的集團國家。

九、全世界集團國家共同生活體構成之後，各集團之間，可以維持相當長久期間的和平，在此期間人類的文化當更進步，但這並非說戰爭將絕跡於未來的世界。相反地，集團國家與集團國家間一旦發生衝突，其戰爭規模之大將更遠過於今日。

十、世界上落伍孤立不肯或不能構成集團國家的舊式國家，是將來世界爭鬥的根源，任何民族國家欲求不作犧牲品，必須努力向大國家的建設邁進。

十一、在戰後的最近若干年中，合理的集團國家尚未建設成功，舊有的若干矛盾尚在殘留，如戰勝國家與戰敗國家間之矛盾，如資本主義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如白色民族與有色民族間的矛盾，如新興國家與舊有國家間的矛盾，如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間的矛盾，皆可造成世界種種的不安。故世界各民族應在戰後努力研究一合理的建設方案，以消除此種種矛盾，而維持世界的和平。

十二、全世界的集團國家建設成功以後，彼時人類文化如更進步，則亦未始不可以合理的方式，聯合各大集團而成功一世界聯邦。

以上種種，自然不過是一種推測，其理由將於以後分別說明；但即使事實上戰後的世界局勢未必照此演進，也不妨當作一理想的計劃，而以人爲的力量促其實現，因爲這樣的政治區劃，才是既合理又合事實的。

——三一、一、一九——三〇、新中國日報——

過去的錯誤

——戰後國策研究序論之三——

重建戰後的世界和平，這句話說來容易，做來實難。國際間既然存在有種種矛盾，即在戰後也不能澈底消除，則永久的和平安定實在是一種夢想，翻開一部人類歷史看，決無此事。要求世界的永久和平安定，只有實行孟子的一句話，「天下惡乎定，定於一」，讓一個國家用強力征服了全世界，或者讓全世界人用和平協商的辦法建設一個世界聯邦。這樣做去，內戰雖仍難避免，但國際的矛盾可以根本解除。但這種希望在最近期間能實現嗎？不用說，是完全不可能。威爾遜總統的「國際聯盟」方案，便是一個失敗的最近而又最觸目驚心的例子。天下事無絕對的好壞，適時者即為佳。世界大同理想雖好，但不是眼前這個世界能夠就實現的。現在世界上的人類譬如轍中之涸鮒，所渴望的是升斗之水，而不是汪洋無涘涯的西江東海。重建世界和平的工作中所應致慮的，不是那樣大而無當的大同之夢，而是怎樣酌取升斗之水以救活全世界奄奄待斃的涸鮒。雖然「天下水流通大海」，升斗之水也就是將來流入西江東海的淵源。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世界大戰並不是今天才有，人類自有歷史以來便是這樣的一個戰爭的世界，二十五年前，人類就曾經過一次大戰。在當時那次大戰快結束的時候，人類何嘗不想望此後可以永久和平。但是事實如何？「失敗是成功之母」，讓我們把過去失敗的經過重新檢討一下，或者可以幫助今後重建世界和平的工作，使有一個更正確的認識。

我們若說上次歐戰後主持世界政治的各國政治家中，沒有誠心誠意希望永久和平的人，這話是冤枉的。威爾遜總統的信徒，就可首先起來舉出反證，不過，若說他們重建和平的方式不對，以致釀成此次更大的慘禍，則雖威爾遜總統本人復活也不能不俯首承認。上次歐戰後的重建和平方案，表現於國際聯盟，及凡爾賽條約中的，有幾個重要的錯誤，這幾個錯誤便是釀成此次慘禍的根源。

第一個錯誤，是太輕信國際平等的空想，而忽視各國國力的比較根本有大小之分，不知大國間的協調，才是安定世界的主要因素。美國是世界上重要的大國，但根本沒有參加國聯。蘇聯是世界上重要的大國，但國聯將她排斥。德國雖然戰敗，但仍然是大國，在戰後受盡了壓迫。義大利名義上是參戰勝利的國家，但也不能滿足願望。以致戰後的國聯祇賸下英法兩個國家來唱雙簧。國聯的無信望，無能力，便是戰後世界不能安

定，局面重翻的主要原因。

第二個錯誤，是太重視民族自決的空想，替世界添出許多不必要的小國，更增加了世界糾紛的禍源。歐洲的局面，演進到了十九世紀下半期，除了巴爾幹一隅之外，本已統一成幾個大國，這幾個大國，對內則主權完整，無隙可乘，對外則勢均力敵，莫敢先發，因此從一八七一以後，到一九一四以前，歐洲才有四十年長期的和平繁榮局面，試想在德國和義大利未統一以前，這兩塊土地是否也是製造戰爭的亂源？上次歐戰後，世界的政治家如果有眼光，就應該順着這個統一趨勢，使紛亂的巴爾幹也統一成一個聯邦國家，減少歐洲大陸上的國家數目，則歐洲的亂源可以掃除，不料不但不能如此，反逆着這個趨勢，將已經成功的德奧蘇聯三個大國，分割成出許多新興的小國，從前一條通行無阻的河水，現在變成了兩國的境界，非有護照不能通過。結果替世界上添出許多貪慾的主權者，增加了許多軍備和經濟負擔，建築了許多關稅的壁壘，本來可以同屬一國，和平相處的人民，現在變成了兩三個以上相互敵對讎視的民族，在人類文化生活上這是極端不經濟的現象，而這種現象的造成，一半誤於國際聯盟製造者的空想，一半也誤於法兩國政治家的自私政策，此外，一部分莫明其妙的理論家，也要負一些責任。

第三個錯誤，是對於戰敗的國家處分過酷，以致種下了雙方永遠讎恨的禍根，釀成

此次反動報復的大變局，希特勒之取得德國政權，純基於德國人民在戰後的苦痛讎恨心理，反對凡爾賽條約，固然是國社黨的一個口號，但也是大多數德國人民的心理要求。有人說，上次歐戰後對德國處分仍嫌太寬，以致養成反動的勢力，所以此次羅邱宣言乃主張在戰後痛懲禍首，這實在是似是而非之談，試想以德意志這樣一個民族，若非有方法將其種族滅絕，豈能永遠禁其復興，無論條件怎樣苛刻，祇不過延長其復興的時間，從前所受的待遇越苛，報復起來也就越激烈，這是自然乘除之理，苛刻到了凡爾賽條約，也就至矣盡矣，也不過維持了十七年。今後縱使把德國打敗，難道還有什麼比凡爾賽更苛刻的手段。一八一五年歐洲列強打敗了拿破崙，但是維也納會議裏並沒有特別歧視法國，因此法國沒有懷抱讎恨的心理。一八六六年普魯士打敗了奧國，但是並沒有要求什麼，因此德奧不久便化敵為友，一八七一年普魯士打敗了法國，訂了一個割地賠款的屈辱條約，因此德法尋讎往復不已。歷史家好罵梅特涅，但是一九一九年的歐洲如果有梅特涅那樣有眼光的政治家，對於戰後民主的德國能夠待以平等，加以扶助，則民主勢力何至推翻？威瑪憲法何至撕毀？保守的興登堡何至登台？反動的希特勒何至站出。今後如果戰勝的民主國家仍然不能採取梅特涅的寬大政策，則打倒一個希特勒，誰能擔保過了幾年之後不再產生一個更兇暴的希特勒。那時節冤冤相報，人類浩劫更將無已時

了。

第四個錯誤是沒有造成一個能夠維持世界現狀的中心力量。上次歐戰後各國政治家和人民覺悟了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危險，但沒有尋出一個解決的好辦法。國際聯盟是一個好理想，但却不是一個好辦法。人類如果希望靠加強國際聯盟或其他國際組織的力量，如創設國際軍隊或國際警察之類來維持世界的治安，這將永遠是一個空想，在國家組織和意識未消滅以前，國聯不過是一個協商的機關，本身並無力量，力量還在各個國家手裏。因此維持世界和平治安的責任，不當望之於國際這樣有名無實的機關，而應當向各個國家本身求之。小國也負不起這個責任，因此責任就落在幾個大國身上。但是在幾個大國勢均力敵的局面下，也不會產生真正的和平，因此更應當有一個中心勢力的國家，以自身的力量負起這個責任來擁護國際的決議，制裁世界的強暴，維持人類的和平，這就是我國古代的霸主制度。國聯好比周天子，有其名無其實，必須有一二大國出而提倡尊王攘夷的大義，先放棄自己檢小利，避小害的心理，以公平恕讓領導各國，共同維持一個公認的軌道，如有不服者，不問對自己有無關係，必率衆以制裁之，這樣的勢力才是安定世界的要素。上次歐戰後英國是夠這樣資格的一個國家，但是不幸未能善用其機會。今後的世界，如果在各大國之間仍然不能產生一個霸主，則世界和平仍然是可望而

不可即的一個空想。

第五個錯誤是對於幾個後進貧乏的大國，沒有給以正當的出路，以致激而橫決，這次戰爭軸心國家的口號是「以無對有」，平心而論，這個口號並不是絕對強詞奪理的口號。試想上次歐戰以後，世界上幾個工業發達，文明進步的大國，除了美國和蘇聯本身地大物博，無待外求以外，其餘都必須靠外面掠取資源以營養本身。然而世界廣大的殖民地，英法兩國就佔去了一半以上，四千萬人口的法國，擁有比其本身大二十倍面積的土地，而六千五百萬人口的德國，七千萬以上的日耳曼民族，反寸土皆無，尚不如幾個歐洲的小國，這樣的局面如何能維持下去？我們不要以為國家戰敗了，便應該剝奪了他殖民的權利，實際上國家雖敗而民族潛力猶存的國家，如果不給他一個正當的出路，那危險是不可言喻的。即以俾斯麥執政下的德法關係而論，在歐洲，俾斯麥之對於法國，可謂待之極苛，備之極周，防之極嚴，然而他却曉得德法兩國去作海外殖民的冒險，使法國人民失之東隅者收之桑榆，「鬼有所歸，始不為厲」。上次歐戰後協約國的政治家連這點常識都沒有，只知道一味箝制，一味把持，有己無人，貪利忘害，其遭受今次的教訓乃是當然。這一次英美的政治家，總算懂得了這個道理，羅邱宣言特別提明「力使世界各國，不論大小，無論勝利或潰敗，對於貿易及原料之取得，俱享受平等待遇」這

一點，才是今後世界和平的一線光明。

上次歐戰後的錯誤措施，也許不止於以上五點，但這五點却是最重要的。我們先認識了過去的錯誤，才能討論到以後的和平建設。

——三一、二、九、新中國日報——

建設戰後世界的幾個原則

——戰後國策研究序論之四——

因為有過去的錯誤，才有今天人類空前的慘禍，這一次的世界大戰，不但是上次歐戰的翻案，並且簡直好像是上帝特別降臨執行末日審判的全權。所有過去數世紀來，一切民族所做的罪惡，所犯的錯誤，都要在這一次大戰中無情地顯露出來。這一次大戰，是整個人類的試金石，是所有民族的煉獄。同盟國家在過去也曾同樣犯過許多罪惡和錯誤，不將這些過去的罪痕徹底洗掉，最後勝利的前途恐尚遼遠。中國在近百年來，特別是近三十年來，所犯的罪惡和錯誤並不亞於其他各國，因此我們在忍受五年來的慘苦教訓以後，更應當積極發生猛醒。

我們希望人類在這一次慘禍以後，應當長進一些，因此對於戰後和平世界的建設便不能不多費一番心血。如果戰後還是不知悔改，人類的慘禍仍無已時。

戰後和平的建設方案，千頭萬緒，一時說不完，現在先說幾個應守的原則。

第一是公平。公平的意思不是平等。上次歐戰後巴黎和會的錯誤，便是誤認平等為

公平，結果又不能真正貫徹平等的主張，以致名實自相抵觸，弄成一個非驢非馬的世界。今後的國際和平，祇能依照公平的原則，却不能依照平等的原則。因為民族與民族間正和個人與個人間一樣，本有智慧強弱大小文野之別，強使大屨與小屨同價，是最不公道的事，也就是最不等的事，結果必更釀成禍亂無疑。因此我們處理國際問題祇能講公平，不應講易惹誤會的平等。公平的解釋是各如其分，譬如大國應該有大國的分際，小國應該有小國的分際。人口衆多，增殖力強者，應該予以容納的機會，人口少而增殖力減者，也不應坐擁廣大資源，獨擅其利。民族自覺心已強的民族，應該予以獨立自主的機會，不應使之常處於殖民地的地位。民智愚下，精神萎靡的民族，也不必強為提高地位，勉強製造一個似是而非的新國。歷史文化上，地理形勢上，血統和情感上，彼此融洽的民族，應該准許他們合為一國，不可用人工割裂；自然和文化環境都不同的民族，也不應該勉強合為一國，使彼此都不相安。戰後的世界政治主持者，如果能體聖人「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心，為整個世界設想，不專為自己民族作一時短見的私利打算，世界和平必可多持保一些時候。

第二是消導。依照公平的原則，可以使世界各民族暫時相安一時，但歷史是變動的，今天之所謂公平，過了幾年幾十年之後，也許就變為不公平了，到了那時候再來補

救，就來不及，就未免要再釀一番禍亂。因此擬定計劃時必須要放大眼光，看得遠些，要為後來預留些餘地。譬如說，人口膨漲和資源的攘奪是戰亂之媒，戰後世界的締造便應當對於這個問題特別加以注意。對於人口過剩的國家，必須給他們一個消納的尾閘，不能使貧無以為生，激而成變。反之，以少數人口獨佔廣大土地的不平現象，也應該稍稍加以改變，今天的世界上，尚有許多未開發的土地，待人去開發，因此過剩人口的容納，並非沒有辦法，但是必須一些國家，把種族之見，地理之見，以及一切猜疑防杜的政策修改一下。此外如戰前屬於國聯委託代管的土地，在戰後也應一律收歸國際共管，闢為國際共同殖民地，由殖民地的居民自行組織管理，名義上受一個新國際組織的統治，不可仍委託於任何國家，致被攘為私有。

第三是化解。此次戰事，同盟國家如勝，則世界霸權將分屬於中美英蘇四大國，此四大國均係地大物博的國家，本身可以自給自足，無待外求，又兼所信奉的政治原則傾向和平，故短期內當無向外擴張之念，世界和平的保障即賴於此。惟戰敗國家如德日等國，其民族性素來強韌，人口增殖力強而土地物產不足以副其慾望，雖經戰敗而讎恨益深，仍必伺機整軍經武以圖報復，時異勢遷，難保不更演出慘劇。加以同盟國家之中，如英國與屬地的關係，也難常保和洽。此等亂源不除，世界仍無真正和平之可言，但欲

除亂源，不能一味用壓制利削的手段，因其徒滋讎恨，更生糾紛，必須在實際上和心理上化除戰勝國與戰敗國，宗主國與殖民地間的讎恨，始可保其長治久安。化除讎恨之道，如對於已有自主能力的殖民地，須提早使其解放，成爲獨立國家。試觀此次戰爭中，菲列賓人之奮勇抗敵，和馬來荷印緬甸印度土著人民之徘徊觀望，即可知美國的政策比較賢明些，自身亦受其益，今後經此次大教訓，歐洲的帝國主義國家，當必覺悟殖民地政策之無益有損，在戰後自動放棄舊式政策，實屬順理成章之事。至於戰敗國家的處分問題，比此更爲嚴重，更不可以意氣出之。若欲在戰後候持長治久安，必須對幾個戰敗的大國保持不割地，不賠款，不懲罰的開明政策，除戰敗國過去用武力攘奪的土地照理應交還原主，及其所侵滅的國家應使恢復獨立外，不可再割尺地寸土，以暴易暴。像凡爾賽條約的鉅大賠款，也決不可再施之於戰敗國家。軸心國家在戰敗之後，內部必然發生革命，民主勢力（大致是社會主義的）必再抬頭。戰勝國家對這些民主勢力必須待以平等，加以扶持，方可使極端勢力不至死灰復燃。否則若一味見利忘害，逼迫得他們走頭無路，則讎恨之心愈積愈深，後患更不堪設想。

第四是統制。單靠消導和化解還不能保永除禍患，因爲有些民族黷武性成，不甘失敗，雖待以平等也難免仍隱懷讎恨，故必恩威并用，加強統制力量，使不能妄肆荼毒。

統制的難題在執行統制的主體是屬於何人。過去國際聯盟一類大而無當的組織已證明其失敗。因為人類大同的時期去今尚遠，任何國際組織不過徒為大國的工具，若賦予這些國際組織以武力制裁的實力，如國際軍隊之類，結果徒供野心國家的利用。況戰後無論結果如何，世界上總是幾個大國并峙的局面，尚難演出一個唯一的中心勢力。國際組織如為某一大國所操縱，則其他大國勢難甘心，仍難免引起不合作或報復的行動。不如順已成之勢，將全世界劃分為幾個集團，每一集團以一勢能控制其周圍的大國為中心，聯合四圍小國，組成一區域聯盟，如現在汎美會議的組織，再加強些，便可以執行這個任務。同一聯盟中的國家與國家間發生爭執，即由本聯盟加以調處，如有不服者，由聯盟中的中心國家聯合餘國加以制裁。此一聯盟與彼一聯盟之間，再組織一普汎的國際仲裁機關，逐漸推進人類合作的事業。如此組織較切實際，比已往的國際聯盟或有效力。

第五是培植。世界永久和平的實現必須人類大同之後，大同雖不能驟躋，但不可不向此方面做準備工夫，其入手之方，在教育思想的薰陶。過去軸心國家之所以特別發展侵略思想，主要在於其普魯士式教育之薰陶。今後若欲使此等民族由侵略轉為和平，必須扶助其國內的民主勢力，自動改革其教育思想。如能由國際產生一文化教育同盟，凡加入此同盟者，其教育方針及教材教法必須由同盟審定，世界任何國家之師範教育必須

由同盟主持，同盟應該就可能範圍內互換國民教育師資，使兒童在幼小時即受有博大寬容之世界教育，對異民族的情感風習得以了解。如此種政策能繼續至一代兩代之後，將來的人類或可懷抱一共同之理想，一切畛域之見自可掃除。但此事在今日未必即能辦到，不過應向此方面推進罷了。

戰後世界的和平建設如能依此五原則進行，則人類福利或可望及早達到。

——三一、三、七——八、新中國日報——

民主運動者應有的風度

——國慶紀念會講辭——

今天是民國第卅一年度國慶日，我們年年在這一天舉行紀念儀式，爲得是要珍重紀念這個光榮的日子，因爲三十一年前的今天，正是我們中華全體國民推翻二千年獨裁專制，建立民主自由國家的一個偉大日子，因此我願意趁這個機會，對於民主運動說幾句話。

現在全世界正在展開民主主義對獨裁專制主義的空前偉大的鬥爭，一方面是中英美蘇等全世界大多數的民主國家，爲擁護有光榮傳統的民主自由而誓死抗戰，另一方面是德日義等專制獨裁的國家，爲滿足其領袖及一部分黨徒的權力欲望起見，不惜發動空前殘酷的侵略戰爭，向民主國家進攻，以奴役全世界自由人民爲目標，這戰爭已打到了五年以上，戰火遍及七洲。照表面一時的現象看來，**「似乎獨裁國家因行動敏捷而着着爭先，民主國家因舉動迂緩而不免暫時落後一着，也許有人看了這種現象，不免發生錯覺，以爲民主政治畢竟不如獨裁專制來得爽快，因此最後的勝利或許竟不在民主國家方**

面，我個人相信愛好自由平等的中國國民，決不會有此錯覺，但理論上或許可以推演到這一步，因此感覺有特別提出來說說的必要。

我以為民主與獨裁的是非勝敗問題，現在已不成問題，因為民主主義的勝利是早已確定了，民主主義的思想早已征服了全世界了。我們現在震駭於全世界的獨裁主義的反動兇殘，以為勢不可當，但是如果稍稍有點歷史眼光的人，就不會承認這種事實是真的。從政治思想的演進史上看來，我們必須承認今天世界的獨裁主義者已經比他們三百年前的老祖宗氣焰小得多了。三百年前，歐洲的獨裁專制主義者，上自反動的君主，下至反動的思想家，一齊用「王權神授」的理論來否認民主的權利。他們根本不承認他們的政權是由人民所賦予的，他們以為君主的權力是受之於天，是上帝的意旨，他們天然應該統治別人，大多數人民天然應該受他們的統治，而不許絲毫過問，試問今天的獨裁領袖們，有那一個敢採取這種態度，根本否認他們的政權與人民公意不發生關係？希特勒是世界最大的獨裁魔王，然而他並不曾否認納粹的政權基礎不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他在未得政權以前，曾經努力於組織民衆，宣傳民衆的工作至十三年之久，最後，一九三二年三月的總統競選，他獲得了一百一十萬選民的支持，同年七月的國會選舉，他依然以一千三百七十萬票的擁護，獲得了二百三十個議席。由此才使興登堡讓步，而

於次年組閣成功。他上台以後，雖然着着實行專制獨裁的壓迫手段，但表面上却無一不根據民主的憲法程序，譬如，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因國會縱火案而發布的「國民自由權停止命令」，是根據威瑪憲法中總統應有的權力，並非非法的行動。希特勒內閣的獨裁權力，也是根據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國會通過的「全權委託法案」，當時的議會中以四百四十一票的絕對多數通過此案，反對者僅九十四票。自此以後，希氏每遇國家大政，如退出國聯，收回薩爾流域，萊因進兵等無一不舉行國會總選或全民投票，以覘民意。就是在今年二次攻蘇之前，也還請求國會授以獨裁全權，並沒有否認人民代表的權力，我們說一個話，並不是替希氏辯護，以為他是真正實行民主主義，我們的意思是指出一件事實——即猖獗狂妄如希特勒及其黨人之流，也還不敢公然否認民主的權利，否認他的政權不是由人民賦予的，如三百年前「王權神授派」的那樣胆大。此外，法西斯夥伴如莫索里尼及日本軍閥，在名義上也都有——個民選的國會，也都須取得選民及民衆代表的同意才能建立政權。因此，我們可以歸結到一句話，就是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敢公然否認他的政權不是由國民公意所賦予的，雖法西斯國家也不是例外，這件事實，就證明民主政治已成爲世界上唯一的潮流，民主主義在思想上已取得了決定的勝利。

反對民主政治的人，或許又引法國的失敗為例，以為法國因為實行民主政治才敗於獨裁德國之手。這又是一個誤解。我們知道法國的失敗並不是因為實行民主主義，而因為是並未真正實行民主主義，才招致了這次的大失敗。民主主義在法國是一個流行的口頭禪，但實際上法國的政黨和政治家沒有一個是真正致力於民主力量的培植和民衆意思的支持的。法國的政黨大多數是職業政客集團，他們掛着擁護民主的招牌，而實行買空賣空的政治交易，他們既沒有明顯的政綱，又沒有堅固的組織，更沒有廣大民衆的後援，他們祇是二百家金融寡頭的奴隸，他們的黨籍可以朝秦暮楚，他們的政治主張可以忽左忽右，他們的政黨聯合祇視一時的便利而定。許多內閣改組，政策推行的大變更，祇因少數政客的領袖私人促膝於密室就可以忽然決定，他們不會注意到黨員的公意，更不會注意到民衆的公意，這樣的政黨，雖然表面上打着民主的招牌，實際上還不如德國的納粹黨尚有民衆的基礎。所以貝當賴伐爾之流，可以任意出賣祖國，取消民權，而並沒有碰到顯著的反對。因此法國的失敗，並不是失敗於民主，而是失敗於沒有真正實行民主。如果我們把這種政客式的集團政治的失敗，認作民主政治的失敗，這是污辱了民主，也污辱了政黨。我們今天要講民主，必須澈底肅清這種政治擺客式的偽裝民主政治，而向真正廣大的民衆基礎上，建立真正的民主力量。

今天全世界的唯一主要潮流是民主政治的潮流，獨裁專制的時代早已過去，法國大革命已經替獨裁專制主義敲了最後的喪鐘，已餒之鬼不會再靈了。今天法西斯主義的猖獗一時，祇是因為他們曾經比沒落的偽裝民主主義者（如法國及日本的政黨之流）更致力於爭取民衆的工作，比較更有民衆的基礎，到了和真正有廣大民衆做基礎的民衆勢力碰頭的時候，他們必失敗無疑。我們中國今天是站在民主陣線方面，照我們五千年立國的精神和世界普遍的潮流方向看起來，我國今後只有民主的一條路，更沒有第二路可走，而且也只有這一條路才是唯一到勝利去的路。我們今天的責任，不是討論民主獨裁的是非，（因為這問題早已過去了），而是如何以民主運動一員的資格，替自己的國家和整個的世界推動開一個真正澈底民主化的大路，以期對得起三十一年前革命的先烈。

為達成這種偉大的任務起見，一個民主運動者需要培養出幾種必需的風度。

第一，須有具體明確的主張綱領，并把自己的主張拿出來與全民共見。民主運動是一種堂堂正正的光明運動，需要全體人民的了解與支持，因此必須有具體明確的主張，並且須使全民普遍了解自己的主張。現在全世界的民主政黨沒有一個是沒有具體明確的主張綱領的。即獨裁專制的法西斯黨也不會忽略此點。如果自己並沒有具體明確的主張，祇是隨時投機取巧，或雖有主張而不肯向民衆時時公開宣傳，甚或自己也忘記了，

或自己對於自己的主張並無真正的信仰和促其實現的決心，祇當作政治鬥爭的一種手段，又或自己的主張有不可告人之處，不使公開，所有這些都是民主運動的大忌。這是機會主義者的作風，不是民主的作風。民主運動的機會主義化是民主運動的致命傷。

第二，主張須切實能代表全民的利益。民主運動是為全民爭福利的，主張必須針對全民迫切的需要，要使全民認識這種運動是與他們的全體利益一致的，才能取得擁護。因此民主運動者不可祇注意於黨或領袖個人的局部權利，不可只注意於爭取政權的運動而忘記了爭取政權的目的。也不可以只為少數上層社會的利益打算，而須為廣大的全民設想。遇到社會上各階層的利益不能調和時，須以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為前提。比如說，與其為紳土地主豪商的利益作呼籲，不如為廣大的小農工商人的利益而作更合理的呼籲。離開了最大多數最大幸福的立場，便是民主運動的自殺。

第三，須爭取全民對於自己主張的了解和擁護。民主運動者必須時時向民衆講話，必須深入民衆，必須與民衆打成一片，看民衆的利益如同自己的利害一樣。要講民衆的語言，要用民衆的文字，要過民衆一樣的生活。不但要爭取民衆，領導民衆，還須要學習民衆，追隨民衆，一個真正的民主運動者不是民衆的主人，而是民衆的夥伴。一切高車駟馬的貴族生活，奔走權門的官僚生活，養尊處優的紳士生活，詩酒風流的名士生

活，作姦犯宄的流氓生活，酒食徵逐的惡少生活，書齋靜掩的學士生活，都不是一個民主運動者所應具的態度。

第四，對於異己的主張須有容忍的態度，民主政治的原則就是「道並行而不悖」，獨裁專制主義者祇承認自己的主張是唯一的真理，而不許他人另有主張，民主主義者承認真理是多方面的，承認人人有自己選定真理的機會。民主主義者尊重他人的人格和自由猶如尊重他自己的人格和自由一樣。因此對於與己不同的主張不可一筆抹殺，不可妄加猜忌，即使其主張十分淺薄幼稚，也祇能用平心靜氣的態度與之討論辯駁，而不必使用壓迫禁抑或造謠中傷的手段，民主運動者必須尊重他人的思想言論自由權，自己既向他人爭取思想言論的自由，自己便須首先作出尊重他人思想言論自由的模範榜樣。

第五，對於反對的主張須公開地加以討論辯駁。民主運動者需要容忍，但不是苟且調和的容忍。民主運動者需要尊重他人的意見，但也須堅信自己之主張。對於與己相反的主張不必害怕爭辯，要有辨明是非的精神與勇氣，如果自信很堅，雖千萬人反對也必堅持爭辯下去，民主政治就是容許羣異己的意見於一堂而光明坦白地加以討論，以真理折服他人。因此一個信仰民主的集團，必須時時容許羣衆有公開討論辯難之機會，真理由討論而顯出，不必盛氣凌人，也不可一味彌縫了事。

第六，以道德感化異己，以法律範圍羣己。孟德斯鳩說，君主政治的原理是光榮，而民主政治的原理是道德，民主運動的原則就是我們中國儒家的傳統精神，「以德服人」而不「以力服人」。一個民主運動者如被人反對，被人攻擊，或被人輕視，則必須反省自己是否有招致這種誤會之處，從前人家何以肯聽話，現在人家何以紛紛自由行動，是否因為自己的苦心孤詣不能為人人所了解，自己的困難處境不能為人人所鑒諒。要解釋這種誤會，便只有運用道德的感化力，依照民主的合法程序，使幹部以及羣衆各自在法律所規定的職權之內，進行和平諒解的決議。自己先站在法律的地位上，同時人格道德的光明坦白態度又能為人人所諒解，則一切問題自能迎刃而解。

民主主義不是一個漂亮的招牌，而是一個實際的生活態度，要爭取全世界的民主，必須有一部份真正信仰民主主義的人，首先切實地自己履行民主的生活條件，庶能蔚成風氣，轉變了打趨紛歧的世界。

——三一，一〇，一二——一三，新中國日報——

把握物價問題的中心點

目前抗戰形勢日趨好轉，軍事政治均無大問題，大家所最憂心的是物價的不穩定因而有促進財政經濟危機的可能。這一次國民參政會對於這個問題也特別注意，結果蔣委員長所手訂之加強管制物價方案經參政會之無條件擁護而通過。我們以為目前的物價問題不但是抗戰的一個暗礁，並且是國民政府施政能力的一個試金石，因此願貢獻一點基本的意見，以備政府及社會人士之參考。

要解決物價問題，必須對於年來物價飛漲的真原因有一種正確的認識，而把握其中心要點。近來一般以耳代目者，往往把物價高漲的原因歸罪於貨幣膨脹，甚至對某部分政府當局私人加以攻擊，似乎以為只要某某一二人一去，物價立時可平，這種論調實在是非常淺薄。姑無論抗戰時期，收入減少，開支浩繁，尤以軍費戰費支出佔國家歲出的最大宗。我們既不能贊成一般漢奸心理者所囑中希望的停止抗戰，則軍費戰費即不能減縮，因之財政開支也不能減縮，財政當局個人無點金之術，則除增稅以外，財政收入自不能不仰賴於舉債，向國家銀行以公債抵押的結果，又不能不使貨幣籌碼增加，這都是

情勢的不得已，任何國家在戰時都不能不走此路，任何人上台都不能不採用此法，以之歸罪於一二個人，未免非平情之論。貨幣籌碼增加自然就是貨幣膨脹，一定要說增加不是膨脹，也是欺人之談，不過若將物價問題完全歸罪於貨幣膨脹，也與事實不盡符合。現在物價較之抗戰以前的增長平均指數約在五十倍左右，有些物件如五金電料之類竟有漲至數百倍者，現在國家發行通貨的總額數字不可得而知，假定估計抗戰前的發行總額為二十萬萬元，目前的發行額為六百萬萬元，此種估計或大致去事實不遠，這樣是通貨較抗戰前膨脹了三十倍，物價如果單與貨幣有關，則也祇應漲到三十倍，不應該更漲到五十倍乃至百倍以上。所以通貨膨脹當然是物價問題的一個重要的原因，無容諱言，但並非唯一的原因。

當然物資保有者和販售者的乘機漁利，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政府當局要決心制裁奸商，也不失為一種辦法。但商人唯利是圖乃是他的本業，我們要商人不謀利，坐視他的資本因物價高漲而日日縮減，也非人情之常。況且目前的情形，居奇者雖均為擁厚資之人，而囤積者則並不限於此輩，一個車夫，一個女工，一個有數口之家的公務員，今天多買了一升米，明天多買了幾尺布，也不能不說是囤積，也不能說對於刺激物價沒有一點關係，但情理是可以原諒的，不能一筆抹殺都謂之為奸商。

商人的居奇是爲着營利，過分營利罪雖可誅，但殺一並不能儆百，老百姓囤積是爲着避害，情理更有可原。趨利避害本來是人類的天性，我們不能不教人趨利避害，也就和我們不能不教水往下流一樣。治水之法，與其用人工築堤，千方百計以障水之就下，一旦堤防失固，將有潰決之虞，倒不如因其勢而利導之，使水不爲人害而轉爲人利。鯀壅洪水之失敗，因爲他逆水性而行，禹疏百川而成功，因爲他順水而能利導。理財之道正如治水，用「壅」的方法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只有用「疏導」的辦法才能有效。我們中國的傳統政治就是重疏導而不重隄防，史記上說：

「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這是中國政治哲學的精意。與水爭地，必受洪水橫決之害，與人民爭利，其害更不堪設想。我們願談物價問題者要把握住此點。

至於經濟疏導之策應如何，以後容再別論。

——三一、十、一七、新中國日報——

中英文化之異同

人和人相交必須志趣相同才能情感相孚，有了真交情，否則便是小人勢利之交，其交不久。國與國之交亦然。中國今天在世界上朋友甚多，但求其文化思想根柢相同，彼此情感不求孚合而自孚合者，莫如英國。中國和英國，彼此之間自然也存在着許多異點，如同：中國是一個五千年歷史的古國，英國在歐洲各國中雖然比較古些，但建國也不過一千年；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民衆，英國單就本土計算，只有中國的十分之一；英國是一個海國，中國則爲大陸國家；英國是工業國的先進，中國尙在落後。但這些表面上的差別都不妨礙兩大國家間文化本質上的相同。

英國是一個崇拜士君子風度的國家，上自政治家，下至平民，無不自幼就養成一種士君子的風度，遇事雍容大雅，講禮貌，重節操，個人的見解雖有異同，但人與人之間相處仍有一定的規範，不至陷於傾軋險詐。這一點也是中國文化的特色。中國人受孔子教義的陶鑄甚久，自來就尊重士君子的風度，評論人物必以道德人格爲先，因此與英人的觀點很容易接近。

因爲這一點士君子風度 陶鎔，所以這兩個民族都養成一種中庸的習慣，遇事按步就班，不激不隨。英國人自來就尊重常識，不過於空想。常識也就是孔子之所謂中庸，政治上因爲尊尚中庸和常識，所以遇事能夠相互諒解，相互讓步，造成各黨相忍爲國的局勢，凡百事業上因爲也尊重中庸和常識，所以變更不驟，一切都有軌道可尋。

這點常識或中庸的態度，就是民主政治的基礎。英國是憲政的先進國家，中國過去雖然專制很久，但二千多年前的哲人早已提倡過民本的政治，見於書經孟子等書。中國人和英國人自來就是一種民主的民族，今後中國必能追步英國民族軌道，力求實現真正的民主無疑。

中英兩國又同是愛好和平，崇尚寬大的民族。英國屬地遍於五洲，但隨地都採取自由寬大的政策，尊重被治民族的習慣與自治權利，不常加以干涉。中國過去爲亞洲盟主者垂二千年，對於屬邦向來也不加干涉，聽其自治。

內政方面，兩國也採取同樣的寬容態度，兩國同承認宗教的自由，從不以一教壓迫他教；同承認民族的自治，從不以一族凌駕他族；同承認地方人民的自治權利，中國自古以來就提倡鄉治，鄉村農民保有極大的自由和自治權，這一點也是英國之所同。

兩國又同樣尊重自由講學之風，英國在十二三世紀建立大學制度的時候，中國的書

院制度也正在同時發生，並且繼續延長下去。

兩國又同具尊重傳統習慣，微傾於保守而並不妨礙進步。英國人的保守舊習之強，世所共知，中國亦然。兩國對於歷史文化的崇拜愛護都已養成習性，雖經戰亂而不改。然而兩國的隨時進步也是一件顯著的事實，保守性與進步並不相妨。

兩國又同樣崇尚正義，尊重理性。中國自孔孟以來，下逮宋朝的程朱理學，都竭力鼓吹理性的尊嚴，反對使貪使詐之習，這一點也正是英國的哲學家格林（Green）—白拉得來（Bradley）輩所竭力鼓吹的。同時，中英兩民族又都是個實際主義的民族，凡事務實際而不貪虛名，對於事功的重要性並不反對。

中英兩大民族因為有這些文化上的共同根據，故自來邦交即極親密，此次在世界戰爭中又結為共同生死的同盟，其相互了解的程度自必日進無疑。

自然，中英兩國文化之間，也有極不同的地方。如同英國是一個基督教的國家，社會的基礎建立於個人主義之上，個人在英國是建國的堅強基石，中國則因為孔教的陶鑄，自來就以家族主義代替個人主義做社會的基礎。這一點的區別，使兩國在政治上，社會上，人情世故的看法上，都發生很大的歧異，但這一點歧異並不是不能調和的。基督教的教義，雖尊重個性，但也極重視家庭的堅固結合，並未加以破壞。孔教的教義，

中英文化之異同

雖傾向於家族主義，但對於個人品格的修養和權利義務的尊重，也並不曾抹殺。今後中國自應學習英國的長處，竭力發揚個性的尊嚴，中國孔教的孝弟倫常之道，若為英國人所了解，也必能幫助英國工業化後家庭制度動搖的危機，而重新將牠鞏固起來。今當英國國會訪華團及英國學者相繼來華之際，我們願將中英兩國文化上異同的關鍵，貢獻於中英兩國人士之前，俾可促進了解，而更能增加友誼。

——三一、二一、二〇、新中國日報——

人物與風氣

愚曩年論學專持主外之說，以爲文化之薰陶，制度之經緯，其力足以範圍人心，蔚成風氣，嘗欲爲中國主外學史，以荀卿上承孔子，下開非斯，以逮於漢之賈鼂，唐之劉柳，北宋之范希文，歐陽永叔，李泰伯，王介甫，南宋之永嘉諸賢，以至明清之亭林，習齋，東原，實齋，其在中國思想界比於朱陸心性之學，似爲旁流，實則正脈。蓋宋明理學高談心性，實自印度思想一轉而來，若論宋以前中國本土之正統思想，制度文物之成分甚多，而心性玄言之成分甚少，凡此諸賢者，其立言之途徑各有不同，然其着眼於制度文物之陶冶，欲由外以治內者，大體固無不同也。孔子一生，性與天道，弟子之所罕聞，其以恆言者乃在詩書六藝，孔門四科，政事言語文章居其三，而所謂德行者亦不過孝弟忠信庸行之灼然易見者，無極太極之辨，無善無惡之談，孔子所未嘗有也。然則儒家者流，其始欲以政治致太平，其後亦不過以文教陶末俗，惟孟子爲例外，以今所傳孔子身後諸儒以逮漢代經師之學，具見於三禮三傳者攷之，大體方向如斯而已。中國古代學術之喜爲玄談者，莫過於老莊，然道家末流由老莊一變而爲黃老，則亦由玄言而轉

實用，及至魏晉之際風氣始又一變。所以然者，中國民族之務實根性有以致之也。

凡此所論，至今觀點未變，惟比年以來，涉世漸深，經歷漸富，觀察所及，頗覺宋儒正心誠意之說，亦有未可偏廢者。蓋制度文教之已行，固足以陶冶羣倫，經緯邦國，然制度文教必賴有所以推行人，徒法不能以自行，苟無其人，雖有良法美制，朝令夕改，適足以長姦而資詐耳，此荆公變法之所以失敗也。故制度與人物，若車之兩輪不可偏廢，人物之養成，待乎風氣之鼓舞，鼓舞風氣之道，貴在以心感心，非塗飾表面所能奏效，此宋明儒者心性之說，所以不無可取也。

中國談變法四十年矣，由帝制而改建共和亦三十二年於茲矣，舉世界所有法制政教，幾無不一一納諸國中而倣倣之，而實驗之，而推行之，其收效幾何，人所共見。今論者方爲民主獨裁之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爭，實則凡百制度，繫乎人心，苟民族根性之窳敗如故，泄沓如故，自私自利如故，雖有任何良法美制，將賴何人以持之？法西獨裁之制行於德國則強，行於義大利則敗，民主共和之說行於英美則富強，行於拉丁美洲諸國則禍亂頻仍，故知關鍵所在在彼而不在此也。

夫風俗之偷窳，人心之陷溺，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所以鼓蕩而廓清之者，則不能仰給於齊民，必賴有俊偉豪傑之上，振起於流俗，相與以言論行誼培養新機，若萌芽之出

於腐草，及其風氣既成，則雖鄙夫賤人亦將相率自飾於忠義，此中心人物之所以可貴也。

我國舊說，以士爲齊民之首，舉凡政治之興革，風俗之變化，無不責望之於士，故士之自負甚高而自律亦甚嚴。今世民主社會之義既行，則或謂士不當自別於齊民，而立國之道但恃大衆，亦無待乎有中心人物之領導，然吾攷之於史而知其不然。國家民族之自立必賴有中心人物之領導，無論何時何地皆然，而此領導之中心人物不出於士則必出於流氓士棍貪人鄙夫，出於前者則國治而風醇，出於後者則俗薄而國亂，古今中外未有無中心人物而可以立國者。三代以上，政治出於封建，而政權操於貴族，貴族風格之養成則資於「士」之制度，故古之所謂「士」者以武爲主，即歐西中古之所謂 *knights*，與後世文弱讀書之士，取義不同。在封建制度之下，貴族子弟智識一開，即有阿保師傅之屬，夾輔左右，教之以禮義之行，自衛衛國之具，故其所謂士者，雖成就之廣狹不同，要皆有忠信義勇之氣，此中國歐洲之所同然也。自封建制度壞而後文武分途，士之名始專屬於讀書文弱之人，習齋顏氏所謂：

「白面書生，微獨無經天緯地之略，兵農禮樂之才，率柔脆如婦人女子，求一豪爽倜儻之氣亦無之。」

然觀儒行所載孔子答魯哀公之言：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則知孔氏初教，亦未嘗專以文弱爲宗也，要之，春秋以前與春秋以後，所謂士者雖稍稍不同，然舉一國之中心領導屬望於所謂士者則同。即歐西亦何莫不然，封建時代同於中國，固無論。即在今所謂資本主義，民主政治之下，不亦有所謂律師記者政客之屬，相率組爲政黨，以爭取政權乎？在法西獨裁，共產專政之下，不亦有所謂黨徒，領袖，委員，組長之流，由黨議而過問一國之政乎？夫一般庸衆，終日疲神於所業，無政治之素習，亦無政治之興趣，故不能不依分工專化之原理，委政治於少數專家之手，此任何時代皆然，故一國必有中心領導之人物，此人物所構成之階層而健全，則國興，否則亂且亡，故論國者不必反對有特殊之領導中心人物，而但問其是否健全而已。

遠者 不必徵，即就清季而論，當時政治之腐敗，官習之貪污，慮有百倍於今日者，然民間清望猶存，所謂士大夫者，率皆誦習孔氏之說，服膺節義之教，濡染日久，其根實未撥，雖伏處草茅，手無斧柯，猶能張赤手空拳與當時之惡濁政治較得失，明是

非，辨利害，黃花崗一役，仗義殉難者七十有餘人，四川保路之舉，呼而應者數萬，前仆後繼，視殺頭下獄爲家常便飯，清室雖有淫威，莫敢如何，即在朝服官者，縱或旅進旅退，辭章之習未除，亦猶多數能尙愛惜官箴，輕佻變詐，比暱下流，常官猶恥爲之。此無他，所受之教育及濡染之文物環境有不同也。此等人物豈非吾等今日眼中所罕見者乎。

夫造法制易，造風氣難，造風氣尙易，造主持轉移風氣之領袖人物尤難，人物若不造成，風氣若不轉移，雖百變其制，千易其法，政令諄諄，家喻戶曉，猶之無有也。以今日之政治教育環境，欲求培養此種士風，實無異南轅而北轍。吾人惟望上之有主持政教之責者，曉然於政本之所在，稍稍放棄以利慾威脅士氣之手段，開放輿論，激揚清流，而下之有領導士風之責者，亦毋自忘其地位，嚮身事人，與市僧傭保比伍，而稍稍樹其方剛之氣，堅其冰雪之節，以培養元氣於一二。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今日正貞下起元，一陽來復之候也，吾曹豈可不自勉乎。

——三二、一〇、一二、新中國日報——

國策比國都更重要

近來討論戰後國都問題的文章很多，大家似乎過於着重了這個問題，彷彿國都問題一經解決，中國立刻就可以轉弱為強，轉危為安，以致把向來策論家的什麼「居中馭外」，「高屋建瓴」的陳套話也搬出來了。我以為問題似乎不是這樣簡單。地理條件固然可以影響國勢和國家的一部分，但在歷史上看起來，人事的因素比地理的因素畢竟重要得多。在過去交通不便，戰爭器具不發達的時代，地理的形勢或者可以發生一部分重要作用，但在今日航空技術一日千里的時代，事實上已經沒有絕對安全的國都。就是在過去，又何嘗有一個國都是絕對安全的？北平，南京固不必提，以西安而論，大家盛稱漢唐的光榮時代，其實就在這個時代，長安也已經屢次受到外患的威脅。漢代長安附近的外寇共有七次：文帝三年，匈奴入寇，帝如甘泉；十一年，匈奴寇狄道，募民徙塞下；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寇朝那，蕭關；後六年，匈奴寇上郡，雲中，烽火通於甘泉，長安；直到武帝元朔二年，遣衛青取河南地後，邊患始少紓。東漢安帝永初元年，先零羌會滇零僭稱單于，寇抄三輔，南侵益州，殺漢中太守，東侵河東，至河內，詔徙

緣邊郡縣於內地以避寇，雍涼境內郡縣多陷；滇零父子叛亂凡十餘年，并涼二州爲之虛耗；順帝永和四年，燒當羌復叛，攻金城，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六年馬賢征羌失敗，諸羌遂寇三輔，殺掠吏民；桓帝永壽二年，諸羌復叛，屢寇雍州，涼州。唐代長安附近的外寇共有六次：高祖武德七年，突厥大舉入寇（前此數年已屢寇關中），上議遷都以避其鋒，幸秦王世民諫而止；武德九年，太宗初即位，突厥頡利突利兩可汗又連兵入寇涇州，進至渭水便橋；代宗廣德元年，吐蕃攻入長安，帝幸陝州；二年，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進逼奉天；永泰元年，懷恩又誘回紇，吐蕃，土谷渾，黨項，奴刺數十萬衆寇，合兵圍涇陽；大歷八年，吐蕃寇涇邠。綜計漢唐兩代因建都長安之故，國都附近所受大規模的外族侵襲凡十三次之多，內亂如更始，赤眉，安祿山，黃巢等事變尙不在內，其他各代更不在內。

這並不是說長安不是理想上安全的國都，北平，南京，洛陽，等歷史上有名的國都又何嘗不如此？這些事實祇足證明即在從前戰爭器械拙劣的時代，地理的條件也不足以保障一個國都的安全，要緊的還是在人事，人事的因素，比地理的因素重要得多。

因此，戰後國都無論建設在那裏都無關重要，重要的是需要一個妥當的國策，能夠保障這四國家的正常發展，也就間接保障了國都的安全。關於戰後國策問題，自然頭緒

甚多，除了憲政民主問題及戰後經濟復興問題已經政府當局宣示態度，國民只有盼其切實完成外，我以為以下的幾點是最重要的，特別與討論國都的問題有關。

第一是和平，我們在戰後必需有長久的和平時期，才能充分完成國防，改進民主，這個時期至少需二十年，多則五十年以上。我們的現代化基礎太落後了，無論在精神物質方面都需要長期精奮的努力，強國的頭銜不是輕易就換得的，更不是輕易就能長久保持下去的。這一次抗戰的最後勝利不成問題，但勝利之後千萬不要把戰爭看得太容易了，我們需要的是和平而不是戰爭。只有長期的和平，才能使民主條件完成，才能使民族精力恢復。才能使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家。因此必須以忍耐的精神小心避免一切性質的戰爭，不問內外，和平第一。

第二是睦鄰，我們與英美蘇等民主同盟國家，邦交自來密切，戰後更宜保持戰時合作的精神，永久合作下去，即對我們的敵人日本，如果戰後有一個愛好和平的民主日本出現，我們當然也不再視之為敵，在這個條件上我們所最需保持的，是中蘇的邦交。戰後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蘇聯這個朋友是絕對放棄不得的。這並不是出於崇拜蘇聯的心理，而是因為我們從東北到西北，與蘇聯接壤的國境差不多佔我們陸地國境的一半，全世界上從古到今從沒有兩個國家接壤之長有如今日的中蘇兩國的。我常說我們中國在

亞洲的地位很像歐洲的德國。德國的真國策是保持對俄的邦交，這樣才能辦到國防安全，避免兩面受敵。威廉第一和俾斯麥懂得這個道理，所以普法戰後小心翼翼保持對俄的關係，威廉第二和希特勒不懂這個道理，才弄到後來狼狽不堪。我們戰後國策之一應該是睦鄰，與一切國家保持友善的關係，才能長久和平建設，而維持這個長久和平局面的最有力因素，就是中蘇兩大陸上國家的精誠合作。

第三是空防，今後的世界，無疑地是空中第一的世界，因為航空技術和組織的發展，一切地理形勢都變了，國都問題因此失去了重要性。今後一個國家要保持安全，不是把國都建設在安全的地帶上，而是建設一個偉大的空防系統，能夠有效保衛國土的任何地帶。當然陸防，海防也是重要的。我國的海岸線這樣綿長，戰後需要建設一個能夠保衛海疆的海軍是無疑的。但海軍的建設需要有錢而且有時間，在現在國防技術一日千里的時候，往往一隻軍艦造成，軍艦的救艦已經過去一半了。況且我們和英美兩大海軍國家做朋友，我們如果要建設海軍必須切切注意英美兩友邦的感情，不要引起他們的誤會，所以海軍的建設在戰後若干年間應該謹慎而有限度，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所能做到的的是全力發展空防，所應該做到的也是全力發展空防。

「和平」「睦鄰」「空防」，這應該是戰後國防政策的三大口號，只有這三大政

策的成功，國都的安全才有了保障。至於談到國都問題，我還是主張建都北平，理由很簡單，第一表示我們不忘東北的決心，第二也省開支一筆重新建築費。不過希望北平那些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築物不要為整理市容，修建衙署而拆毀了，那些有歷史意義的街道也不要胡亂改些平等路自由路之類的新名。

——三二、一〇、一二、新中國日報——

衍人荒

平陽宋平子先生（衡）嘗著「闢中原人荒議」以爲「哀莫大於心死，悲莫大於人荒，心死之極，流血千齡，而不稍動惻！人荒之極，縱橫萬里，而不得一士」。其言曰：「使中原人荒至此極者，其奇渥氏朱明氏乎，蓋自有紀載以來，焚屠淫掠之慘，莫甚奇渥氏；閉塞愚弱之功，莫甚朱明氏」。

平子之言，誠有感於當時矣。抑何時無人？何地無才？菽麥稻稷之種，播於沃壤則怒苗，播於鹵土則枯死，其所種同，其所出異，則機緣爲之也。龔定庵嘗有詩云：

「九州生氣仗風雷，萬馬奇疇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定庵蓋有感於當時之人荒，而不知與彼並世者，洪楊曾左諸才傑早已在人世間矣。使不遇非常之時，無尺寸藉手之地，則畢其生羅山一老儒，湘陰一劣衿，湘鄉一文學侍從之臣而已。是知有用人之柄者，不必患人荒，而患在無所以培養啓沃人才之道，雖有人才，不死於焚屠淫掠，即死於閉塞愚弱。死於焚屠淫掠者，猶可謂異族爲之也，彼本不欲吾之有人也，彼惟恐吾之人多而有才且賢也；死於閉塞愚弱者，則以同國一族之

人，橫設爲內外之防，上下之禁，脅之以威刑，誘之以利祿，腹誹有誅，耳語有禁，自卯角之日起，卽授之以愚昧閉塞之教，塞其聰明，蔽其耳目，使心無雜思，目無旁鶩。彼明祖之施政也，功臣如李善長，胡惟庸，藍玉輩，橫遭誅屠，猶可謂有由。宋濂一儒者，高啓一文人，亦必監其思想，摘其文字，甚至以孟子爲主張民權而欲撤從祀，其所懸以教士者，惟是高頭講章，八股文體而已。是其用心惟恐人之才且賢與奇渥溫氏正同，然則人荒者人自造之，非天之生才有異也。卒之，明之一代，學問空疏，事功微弱，不百年而胡虜入侵，國君被俘，自後遂爲閹宦細人之天下，忠良之士，一廷杖斃之而有餘，是其愚弱人者適所以自愚自弱也。其智遜奇渥溫氏遠矣。蓋奇渥溫氏之焚屠淫掠，所以摧殘敵方也，朱明氏之閉塞愚弱，則以摧殘己才也，其所施同，而其所審於人已者異。人有惡己之耳目手足以爲多事者，剝剔之，翦裁之，欲一切束縛錮蔽之，以爲舍此不能統一於心君，卒之，五官百肢俱失其靈，而心亦槁且死矣。朱明氏之所以爲政者何以異於是。

嗚呼！人荒之難，蓋古今無以異也。

夫才難之歎，古今所同，抑培養生發，非無其道。以西京之偷蔽而有東京，以五季之頹污而有北宋，彼漢光宋祖非有異術以生才也，能執其風氣之柄，開其進退之路，已

。故以天子之尊，屈於布衣，新興之朝，推獎異趣，敢言者無罪而有功，抗節者率土而從化，禁網悉撤，言路大開，此兩朝風氣之淳美，節義之輩出，皆賴養之得其道也，夫
人荒豈難闢哉，貴在知其本而已矣。

——三二年（月日未詳）新中國日報——

救文莫如質

古代儒家評論文化形態，曾標出「文」「質」二義，此說起於孔子，「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

大抵文化初起之時，人民質樸未漓，則質勝於文，文化日久，人民習於虛文，而少實際，則文勝於質，任何民族開化的次第，均先質而後文，用現在的術語說，便是先野蠻而後文明，在孔子的時代，虞夏在前，殷周在後，故孔子又說：

「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小戴記，表記。

孔子雖然是一個中庸主義者，他不主張偏於文，也不主張偏於質，而祇說，「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然而他生於周末文勝之時，眼看浮文虛節，充滿一世，他應該也主張救文莫如質了，所以他又說過：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論語

就是說，與其用後來君子的繁文瑣節，還不如存先輩的質樸之風，雖受野人之譏

而不辭，換言之，便是寧贊成先輩的野蠻，不贊成後輩的文明，孔子是一個野蠻主義的崇拜者。

孔子論文化祇標文質二義，到了漢儒董仲舒想以三統說的歷史哲學來和鄒衍的陰陽終始五德說競勝，才把夏殷周三道分開，勉強又闢出一個「忠」字來，硬說是「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其實照表記，說苑，白虎通義那些解釋看來，夏人所尚的「忠」和殷人所尚的「質」，並沒有什麼大分別，何況表記又明明說「虞夏之質」，「殷周之文」呢？故我們以為用文質二義來批判文化便夠了，用不着再加上一個忠字，因為「忠」「質」之義一也。

周朝是個文勝的時代，便是孔子也未能免俗，春秋是一個紀事的史冊，據事直書便夠了，但是他老人家偏偏要撰出什麼春秋筆法來，替真實的史實塗上了一層文飾。明明「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却說是「魯無篡弑」，明明踐土之會，晉文公實召周王，而却說是「天王狩於河陽」，這個惡例一開，以致後無信史，王八朱三之類，只要是微倖竊取到政權，便算是神聖文武太祖高皇帝，神功聖德，累牘難窮，一切攀龍附鳳的雞鳴狗盜之徒，也就都成了開國功臣了。只有那頗富幽默趣味的魏文帝曹子桓，才在他受禪登極的時候，輕輕說了一句「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算是自己肯戳穿自己的西洋景。

中國民族的一切政治社會風俗制度，都是從周朝奠了基礎的，再加以儒家的陶鑄訓教，因此這個文勝的風氣也就從周朝沿襲下來，歷三千年而變本加厲，日甚一日。外國人稱中國人是愛面子的民族，這「愛面子」三字便是「文勝」的注腳。明明父親死了，照樣吃喝談笑，却要說「苦塊昏迷，語無倫次」，明明太太老了，自己想討小老婆，却要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從前清朝有一個大帥，打仗屢戰屢敗，自己想把事實奏了上去，却嫌「屢戰屢敗」四個字不甚好聽，「恐干天怒」，後來有一位聰明的幕友想出一個法子，只用筆輕輕把那四個字勾了一下，變成個「屢敗屢戰」，便算是抗戰精神堅持到底了。因為中國人這樣愛面子，所以儘管對外戰爭喪師失地，締完了喪權辱國的和約，却要說「我國家愛育羣黎，視天下如一家，不忍干戈相繼」，外國人也懂得中國民族這樣愛面子的心理，和中國人辦交涉的時候，只要得到實際的權利，在面上儘可以相當讓步，讓中國人得點面子，而中國的朝野上下也就揚揚得意，自以為遠夷畏威懷惠，天朝強莫與京了。文勝之弊一至於此！

大抵一個民族在文化初啓的時候，風俗質魯，淳樸未漓，所以能夠上下一心，不識欺詐為何物，這種民族當然日強一日，到了文化濡染既深，文勝於質，於是人心習於變詐，雖有良法美意，無從期其必行，金史世宗本紀云：

「十三年四月乙亥，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真詞，願謂皇太子及諸王曰，……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真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

又十六年正月丙寅，上與親王宰執從官從容論古今興廢事曰：……女真舊風最爲純直，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客，信朋友，禮無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當習學之，舊風不可忘也。」

柳翼謀先生的中國文化史也說：

「滿州之興，固無所謂盛德大業，徒以部落褊小，上下一心，事多公開，不得欺隱，無明人之腐敗氣習，故能乘明之弊，力征經營，不三十年，遂竊神器，觀其初興之時，尙無文字，弟藉蒙古字以創滿文，雖經達海之增益，亦未能造成一國之學術，僅可藉以翻譯漢籍，其人之鄙塞可知。」

可知女真滿洲之興，皆興於其風氣質樸，不識詐僞，及其衰也，亦均衰於習染頹風，文勝其質，一切民族皆然，固不僅此二民族，即近代西洋各國之所以強盛者，又何嘗不是由於其民族性的質勝於文之故。若我中國，文勝之弊既久，上下習於虛僞，談法治則人人善於舞文弄法，談人治則人人習於沽名釣譽，一切歐美的良法美制，一到中國便變了質，民主也好，獨裁也好，立憲也好，專制也好，東方文化也好，西方文化也

好，國粹也好，歐風也好，總之變來變去，祇是在表面文章上做工夫，人人嘴上說的是
一套，心上想的又是另一套，文勝之弊不除，雖百變其法，千易其制，何濟於事！

救文莫如質，我們現在應該是提倡質野風氣的時候了，再不可以舞文弄墨，做些自
欺欺人的把戲了。

何謂救文莫如質？用質樸的人，說老實的話，做言行相符的事，上以此倡，下以此
和，風氣一正，萬事迎刃而解，此為其綱，至若其目，以俟後論。

——卅三年新中國日報元旦增刊——

憲法及其背後的力量

憲法是什麼？不是一張白紙寫上幾行黑字就算了事，如果祇是這樣，那麼憲政問題就很簡單了，用不着再談什麼運動了。

爲什麼美國的憲法是憲法，曹錕的賄選憲法就不算憲法？爲什麼英國的憲法並沒有成文，却爲舉世的模範憲政國，爲什麼德國的威瑪憲法條文那樣定得完密週到，却不到十幾年就失了效？這其中一定有些道理。

當然，憲法條文之周到合理與否，對於憲法的實施效力有密切的關係，但條文儘管周到，如果其產生憲法的背景沒有獲得大多數人民的同情，以及實施之時并無誠意，則條文之研討不免多事。譬如曹錕憲法以天壇憲法爲藍本，最初訂定者爲各黨各派之名士，用意不爲不周到，但因係由賄選之直系政府所產生，故國民自始即不加以重視，其憲法亦率歸於無效，又如美國獨立時的憲法，過重理想，缺少彈性，偏於剛性，至今扞格難行，俾美國全國人民，至今篤守此憲法，不敢輕議修改。可知憲法的地位初不繫於條文的完善與否，如果把條文看得過於重要，斷斷計較，那就不懂得憲法不是普通法律，

不是幾個白面書生咬文嚼字就能夠捧得起來的。

當然，憲法產生的程序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事實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憲法不是在表面合法的程序上產生的，即使是袁世凱自訂的新約法，也要假借民意，召集約法會議，但其所謂法，非吾之所謂法，終於流產。而且越是元氣淋漓，能夠代表全國人民真意的憲法，其產生的程序越不十分嚴格，繩以手續，草率之處甚多。因為此等憲法，大抵訂定於革命初期，程序的草率是不可避免的。譬如民元時代的約法，僅由十七省代表所組成的臨時參議院產生，而此十七省代表也并非由全體人民依合法手續所選出，但因其能代表當時全國人民蓬勃的革命精神，故民元約法的產生程序雖草率，內容雖疏漏，至今仍為談中國憲法史者所尊重。

憲法之價值既不在於內容條文之周到與否，又不在於產生程序之合法與否，然則在什麼地方呢？我們以為憲法本身不過是一種形式，形式背後還有本質問題，憲法的價值決定於其背後所代表的本質，木質如有價值，則形式上的憲法雖然草率疏漏，仍然具有不可磨滅的精光，否則，雖然完密周到，依然不過是一張白紙上寫的黑字。

所謂本質，實際上就是憲法背後所代表的力量，此力量產生憲法的要求，規定憲法的內容，保障憲法的實施效力，有此力量，則憲政可以長治久安，無此力量，則憲法不

過是一張白紙。力量如有缺陷，則這法無論怎樣完善，也依然是一本缺陷的憲法。

所謂力量，可分兩種，一種是組織力，即憲法背後有經過組織的大多數民衆爲之支持，如果民衆對於憲法并不感到興趣，也不感到對於自身權益的關係，或卽有感覺而不能形成有力的組織，或雖有組織而祇限於少數智識較高的分子，則憲法縱具形式，沒有支持的力量，結果祇能流於形式化。

另一種更加重要的是精神力，凡是憲法之能光輝發達，永垂久遠者，必由於其背後能代表一種精神的或道德的力量，全國人民對此精神的力量深受感動，聲光所及，如響斯應，如此，則憲法一經形成，卽具有精神的威力，使人視如神聖而不可侵犯，如是之憲法，始能垂之久遠，若如袁世凱曹錕之徒，憑藉少數爪牙，私訂憲法，強姦民意，則精神全失，雖有憲法之形式，內容周到，程序嚴整，亦不過一張廢紙，當時之人雖敢怒而不敢言，事過景遷，丟到毛脚堆裏亦無人過問矣。

欲憲法之永垂久遠，與其徒重形式之討論，曷如致力於兩種力量之建立，此朝野上下所應共努力者也。

論學者當知所以自處之道

封建壞而貴戚世族之權分於游士，六國之士，布衣立談以取卿相，降及後世，辟舉，科試，取途不同，而士之可以問政干祿則一，其任重則其慮多，其途闕則其志廣。故古之論士，不過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而已，後之人則動則以天下國家自任矣，顧亦有匪士之思慮所敢企及者，封建之世，帝王世及，迄乎漢祖，以亭長起家，開平民天子之例，自是厥後，易姓革命之際，起乎匹夫貴爲天子者往往有之，其人類多武夫走卒負販耕氓，顧未有出於士者，巨君以世戚，文叔以帝胄，皆非真士也。原夫封建之世，士之一級，出則事公卿供役使而已，後世之士，出路雖殊，亦不過以向之事公卿者事帝王，任臣宰者任卿相，其名雖異，其仰面事人供奔走役使則一，故後世之士，雖志廣才高者，極其思慮，不過以帝師王佐自命而已，「彼可取而代之」之呼，「大丈夫不當如是」之嘆，未聞敢出於士之口而發於其心也。

夫士之自處既不過如是，則其欲申其志於天下，勢必待有能役使奔走之者，故士又往往談君臣遇合，「不惟君擇臣，臣亦擇君」。其有擇而不得遇者，則「三月無君，皇

皇如也」。然君臣遇合，談何容易。以諸葛之遇昭烈，宜可謂君臣魚水矣，當其遺恨吞吳之際，猶不能不竊竊嘆惜曰「使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主上東征」，何則？諸葛雖親，不敵關張之多年共患難也，向使先主不死於白帝，關張不殞於寇讎，或者後主英俊有類威廉二世，則諸葛終未能大行其志也，求不爲俾斯麥之放逐則已幸矣。若夫其不及諸葛之遇合者，商君受傾於貴戚，李斯被擠於近侍，王安石得遇神宗而晚節寥落於金陵，劉基得遇明祖而未歲憂讒畏譏，憔悴以死，甚且有中毒之疑，士之不遇則仰屋興嘆，及其既遇，則末路亦不過商李王劉而已。何則，其所處之地祇能如是也。

龔自珍氏嘗有「賓賓」之議，其言曰：

「古者開國之年，異姓未附，據亂而作，故外臣之未可以共天位也，在人主則不暇，在賓則當避忌……其言曰，臣之籍外臣也，燕私之游不從，官庫之藏不問，世及之恩不預，同姓之獄不鞠，北面事人主而不任叱咄奔走，捍難禦侮而不死私讎」。……又易世而太平矣，賓且進與人主之骨肉齒，然而祖宗之兵謀有不盡欲賓知者矣，燕私之祿有不盡欲與賓共者矣，宿衛之武勇有不欲受賓之節制者矣，一姓之家法有不欲受賓之論議者矣，四者三代之異姓所深自審者也。……若夫，其姓賓也，其籍外臣也，其進非世及也，其地非閨闈燕私也，而僕妾色以求容，而俳優狗

馬行以求祿，小者喪其儀，次者喪其學，大者喪其祖，徒樂廁於僕妾狗馬之倫，孤根之君子必無取焉。

嗚乎！龔氏之言誠可謂深切著明者矣。夫興王之起，必起于兵戰，冒鋒鏑，爭死生；揮金貨，間敵情；聚米穀，通饋饋；此三者必與腹心肺腑從龍之臣計之，而俱非白面之士立談之間所能勝任也，故貴戚近侍武夫走卒尙矣。叔孫通所謂不能與絳灌爭者也。故仗策之士，於地則不近，於情則不親，於功則不若武夫走卒之出生入死也，人主之以禮貌接之，不過取其摺紳縫掖，魁然大物，聊備冠帶之一格而已，國家之大計，一姓之家法，固斷斷乎不欲賓知而議之也。爲賓者苟能審乎其分，明乎其誼，則不得已而仕於其朝，亦惟有杜口箱舌，旅進旅退而已矣，於此而猶欲伸眉攘臂，論家國之大政，與貴戚近侍爭榮辱於一朝，龔氏所謂「小者喪其儀，次者喪其學，大者喪其祖」者也。

然則世之學者當知其所自處矣，政治待於人者也，學問自取有餘者也。待於人者，遇合不可必，榮辱不可知，而先已喪其所守，曷若優游乎學問之域，汪洋恣肆乎思想之圃，自有園地，自闢而自耕之，其幸而有成，不異乎取天下之樂，其不幸而終無所就，亦尙得免於狗馬僕妾之辱也。竊悲夫世之所謂士者，多未能自審於賓主之分，故言

高論以預人家國事爲己責，其始之未入藩籬，猶得偶蒙禮接，及其墮身於勢利場中，莫能自拔，則盡喪其所守，而人亦不復重之。其上者愧悼宛轉，掩戶自傷，其下者則揚眉翹首以某公某公厚我自詡，賣其師而及其祖矣。故作此論以續龔氏賓賓之議云。

——三三、二、二、新中國日報——

論熱中

天下之惡多矣，而熱中居其一。

夫熱中非過惡事也，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皆熱中於救世者，棲棲皇皇，日不暇給，後世以聖人稱之，蓋其一片悲天憫人之懷，莫能自己，故衷心不期熱而自熱。後世未有以熱中譏孔墨者，蓋知其熱中非爲己而爲人也。

然卽以孔墨之聖哲，因其熱中救世之故，行動上遂不得不有所遷就。衛靈公夫人南子，一估寵擅權之婦人也，後世稍知自愛之君子，皆知其牝雞司晨，殃及家國，禍水終凶，冰山易倒，而孔子以熱中救世之故，不得已往就見之，遂爲其弟子子路所不悅，再三矢誓，未知終能解其疑否？楚人將伐宋，墨子命其弟子三百人持守圉之器，爲宋拒楚，而自往說楚，夫楚王宋公等是民賊，楚固橫暴，宋亦未嘗非殘民以自肥者，惡楚而助宋，以大聖羣賢而甘爲民賊供驅使，蓋亦發於熱中救世之一念。卒之，孔子既見南子，未得免於招搖過市之嫌，而有吾未見好德如好色之嘆，墨子之道亦未見其得行於宋，二位大聖之兩片熱誠，徒爲殘賊獨夫所利用耳。

蓋人既熱中於某事，自不得不對環境有所遷就以期其事之易成，其始尙以「爲目的不擇手段」自解，其漸則爲手段而忘却目的，其終則以手段爲目的，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本來目的遂不覺拋之九霄雲外矣。此熱中之雖非惡而終必爲惡也，

夫人，情動於中則智昏於內，水本至清也，沸之則騰躍渾濁失其清之本性，燈本至明也，搖之則迴環惑亂失其明之本質，人情凡事不干己者其判斷頗能公允，一經身入局中，便不免左袒右袒，諺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是也。人之熱中者必有所欲，有所欲必有所惡，於所欲者則譽之惟恐其不至，於所惡者則恨之亦惟恐不至，其理智先已昏矣。以情動智昏之流，當家國經綸之業，嗜欲迫於中，情感發於外，黨同而伐異，是墨則非朱，國欲不亂，安可得乎？嗚呼！四十年來，中國之所以紛紛不寧者，豈不以此乎？豈不以此乎？

人有轉物者，有爲物所轉者。熱中之人，既有所欲，情已牽于外物，以身殉欲，一旦不得則皇皇不可終日，故功名之士，捐枕嘆息，唐衢痛哭，屈子行吟，人生天地間，寥廓四達，儘多迴翔之地，自熱中之士觀之，則棲棲皇皇，若不可以終日者，人生苦境，皆自熱中而來，所謂自討苦吃者也。情既牽于外物，則俯仰由人而非由己，始則轉于物，終則轉于人，若登場之傀儡，笑啼皆由人而不由己矣，以此而談改造社會，復興國

家，豈非南轅而北轍乎？

故人若欲爲「轉世人」而不爲「世轉人」（顏習齋語），則必自不熱中始。人不熱中則於世無所希冀，無所冀則事不求其必成，功不期其自我。大丈夫處世磊磊落落，若浮雲之聚散於太空，行其所不得不行，止其所不得不止，故能勝固欣然，敗亦可喜，雖有萬鈞之勢，百億之富，莫能牽率使之就範，若此之人者，非無救世之宏願也。特不熱中耳。世多以不能熱中者卽爲冷心冷面，山林隱士之流，不知兩者之間原自有別，貴在有識者爲之辨之耳。

——三三、二、九、新中國日報——

現實主義與國際政治

在現代的國際政治裏，究竟是理想主義得勢呢？還是現實主義得勢？這是一個極關重要的問題，特別是素來對於國際形勢隔膜的中國人，更應該加意警覺。

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自來是國際政治的兩大主流，當中國的戰國時代，就有這兩種主流存在。儒家和道墨兩家代表了前者，而法家，縱橫家，兵家代表了後者。結果，孔孟的仁義之道並沒有見諸事實，而成功的到是最現實主義化的秦國，歷史第一次作了兩造的裁判人。

從秦以後，中國人在二千年大一統的長期孤立環境之下，漸漸忘記了國際環境的現實利害關係。直到清末受了鴉片戰爭以後歷次外患的教訓，才稍微明白了一點。我們看清朝末年一般政論對於國際形勢的剖析都是很健全的，但這種覺悟到了民國以後不久便被理想主義的空氣所欺騙而忘掉了自己的地位了。當上次世界大戰之後威爾遜的理想主義曾經使中國人熱狂過一時，但不久就被凡爾賽條約和二十一條的現實教訓所糾正了。國民革命的前後，列寧的理想主義又曾經使中國人熱狂過一時，但不久也被蘇聯

的現實所糾正了。這一次大戰，民主國家方面是站在羅邱大西洋憲章的四大自由理想之下而作戰的，我們熱誠崇拜這輝煌理想的大西洋憲章，而祝其提早實現，但我們也希望中國的國際專家們同時要注意國際的現實主義環境，而加意警覺一點。

現代國際政治的中心仍在歐洲，而歐洲自從馬奇維利以來就是一個現實主義的舞台，儘管十八世紀以來，什麼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理想相繼出現，但都不過是在野政黨和文人的空話，這些唱高調的人一到上了台，就立刻現實化了，這並不是他們輕易忘却原來的理想，乃是現實的環境教訓他們不得不如此走。

現代歐洲的主要同盟國家是英蘇兩大國家，英國向來走的是現實主義的路，十七世紀以來英國的着着成功，大半依靠他們民族的現實性格，這一次大戰，英國在邱吉爾首相的偉大領導之下，從敦刻爾克的撤退起，到今天為止，處處都表現出現實主義的精神，其中如英法合併的提議，如東方的撤退，如印度問題的堅持，如歷次的飛聘 國，飛聘蘇聯，以及最近的開羅，德黑蘭兩次會議中的應付態度，處處都表現出英國政治家的現實精神來，最近邱相在國會的演說，明白表示對蘇波問題及南斯拉夫內政問題接受蘇聯的主張，更足表現英國的現實色彩，這是我們所不能不注意的。

其次如蘇聯，斯達林委員長在這次大戰中，所表現的手腕，如蘇德協定，如蘇芬戰

爭，如蘇日中立條約，如蘇英二十年休戰協定，如解散共產國際，如修改憲法，承認十六邦的外交軍事獨立權，以及對於波蘭邊界問題的態度，也都是非常現實的，而且手腕更敏捷，魄力更宏大，蘇聯是現實的，和英國一樣的現實。

美國是比較理想主義的，現在的羅斯福總統雖比威爾遜總統實際些，然而根柢畢竟是理想主義的，這也是美國的地理環境使然，但我們也不可忘記在美國還有一個現實主義的大勢力在潛存着，民主共和兩黨之中都有，在戰時，他們不得不擁護羅斯福總統，到了戰後，現實主義也許抬頭，像上次歐戰及反對威爾遜的現實派抬頭一樣。

假如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人就更不要後悔沒有老早注意國際的現實主義的潮流了，現在就開始來注意，似乎還不為過晚。

——三三、三、三、新中國日報——

遙贈威爾基先生

在這個世界上，有沒有偉大的人物？我不知道；有多少偉大的人物，我也不知道；我祇知道，有兩個人物確實可以稱得起「偉大」兩個字而無愧。這兩個人之中的一個是大英帝國的現任首相邱吉爾先生，另外一個呢，便是美國新興的政治家，最近宣布放棄共和黨候選總統競選資格的威爾基先生。

這是兩個典型全然不同的人物，邱吉爾先生是英國的現任首相，是現實主義的政治家，也是成功的政治家，威爾基先生呢？則是曾經競選總統失敗過的在野的政治領袖，是政治上的理想主義的代表，至少在目前是一個政治上的失敗者，這兩個人代表政治上兩種相反的典型，其成功失敗也不相同，但同不失其為偉大。

邱吉爾先生的偉大是人所共見的，他受命於危難之際，支持一個風雨飄搖，孤城落日的大英帝國，他却能發揮他的鐵一般的意志，鷹一樣的眼光，電一般的手腕，一步一步，腳踏實地，不受虛聲的恫嚇，不為俗論所動搖，把自己的祖國從深淵帶到坦蕩的平途，看他這幾年來應付各種問題的手腕，既鎮靜，又機警，沒有一毫的失着，這真是一

位了不得的人物，大英帝國有這樣的人物來作領導，是大英帝國之幸，二十世紀的歷史能產生的人物，是歷史之光，我們像看戲一樣看到一個第一流的名角在登台表演，嗓門，腔調，台步，做工，都火候純足，真夠過癮。世人是捧成功的，邱吉爾先生的偉大，不但我知道，許多人都知道，也都佩服。

但要認識威爾基先生的偉大却不是這樣容易的了，因為威爾基先生還沒有登過台，他的表演成績如何無從知道，照理想，恐怕即使登台也未必能成功；但威爾基先生的偉大，並不在他的成功，而就在他的失敗，就在他不怕失敗，敢於向失敗挑戰。凡偉大的英雄都是敢於向失敗挑戰的，邱吉爾先生在此次歐戰未爆發以前，也曾在政治上失敗過十幾年，但從未屈服於庸俗的政客的淺見之下，他胆敢向庸眾挑戰，不怕失敗，這樣才奠定了他今日的成功。現在，威爾基先生也在胆敢向失敗挑戰，他失敗了，他的失敗也奠定了他的偉大。

威爾基先生是生在國勢興隆，人民滿足現狀的美國，他的政籍是隸屬於比較毗於保守的共和黨，美國的民主政治是受支配於政黨和輿論，而政黨和輿論的背後支持者却是若干馳名世界的人所結成的陣線，這些有錢的人他們對於政治的希望是保守現狀，不要輕易改革，是縮減政治軍事的費用，減輕他們身上的担負，是抽身於國際漩渦之外，閉

關孤立；是防止下層民衆的得勢，預防世界革命。在這種立場上他們怕受英國的利用，捲入歐洲事件過深；在這個立場上，他們也不願意過分牽入太平洋戰爭，寧可坐視中國孤立；在這個立場上，他們特別憎恨蘇聯，深怕她放棄世界革命的政策；在這個立場上，他們之中也許有一部分還暗暗同情於法西斯主義，希望她們不要驟倒；威爾遜先生所碰到的是這樣的一個政治氛圍，他假使想在政治上成功，他必須和這些「大亨」們妥協，接受他們的政見，代表他們的利益，把他的政策主張修改得十足穩健，十足保守，這樣他就一定會得到黨的支持和輿論的擁護了；然而他不肯，他寧可和失敗挑戰，他提出來的主張比羅斯福總統還要激進，還要開明。羅斯福總統就因為推行新政。引起了敵黨和自己黨內一部分保守人士的不滿，上次歐戰的威爾遜也因為提議國際聯盟的理想而失敗於國內的政敵之手，威爾遜先生的主張比羅斯福總統還急進，比威爾遜總統還大胆，他的失敗是當然的，然而他不怕失敗，他並不因為怕失敗而和這一般有力者妥協，他的偉大就在這個地方。

美國式的民主政治不如英國的民主政治有一個貴族風度的保守黨為中心，憲法裏對於總統任期和職權的規定又過於呆板。不容易活動，故英國常能產生第一流政治家，而美國的第一流政治家多遭失敗的命運，歷史上有名的美國總統，自華盛頓以後，不過哲

斐孫，林肯，麥肯來，老羅斯福，威爾遜和現在的羅斯福總統，寥寥可數的幾個大政治家，其餘的並不是沒有人物，但偉大的人物就很難通過於這樣的庸衆之前，這就是美國式民主政治的最大缺點。

政治家的成功不一定在事業，有時理想的成功比事業的成功還偉大長遠得多，一個成功的政治家他在實際政治上的影響有時也許遠遠不如一個失敗者，威爾基先生這一次放棄競選，自然並不是說他永遠不能抬頭，但無論他將來能否東山再起，他的理想根本就是一件偉大的成功。時代的輪子一步一步轉了上去，有遠見的政治家雖然一時不爲羣衆所了解，然而終必有被了解的一天。我們現在誰人能忘記了脫離共和黨另糾進步黨而競選失敗的老羅斯福總統的雄姿，一隻受傷的獅子遠勝於一羣低首的綿羊，偉人之所以爲偉人者就在此。

我們敬祝威爾基先生在政治上不要灰心，四年之後，再和國人及世界相見。

——三三、四、二一、新中國日報——

國防與外交

自從陳啓天先生在「國防中心論」一書中提出應以國防爲中國的建國中心主張以後，近幾年來，因抗戰事實的教訓，已成爲國人一致的公論了，但一般國防中心論者，往往只注意到軍備問題。以爲只有建造強大的軍隊才能鞏固國防，這種見解是很狹隘的，並且難免有流弊。軍事力量誠然是國防的重要基礎，但如僅靠軍力而忽略其他，則軍力愈擴張，國防或愈不安全。納粹德國可謂致全力於軍事準備了，但因其不知於軍事以外尚須兼顧其他要素，故弄成現在四面楚歌的境地，也許因爲憑恃其軍力之強大才發生忽略其他要素的自大心理，所以說軍力的強大有時未必即能達到國防安全的目的，甚至與此相反。

國防安全的要素有政治，軍事，經濟，地理，文化，外交諸項。現在祇談談國防與外交的關係。

外交爲國防安全的重要要素之一，有時更重於軍事，不但軍備落後的國家須注意外交，即軍力強盛的國家也須注意外交，才能策國防的安全，以德國爲例，當十八世紀之

初，普魯士不過是一個北方的新建小王國，兵力並不算強，因能與英瑞等國相結，共抗法王路易十四的侵略，才日臻于強盛，到腓特烈克二世憑恃其武力，侵略奧國，引起俄英奧的聯合反對，七年血戰，柏林被圍，腓特烈克幾乎自殺，幸俄帝易人，外交形勢轉變，始免於滅亡，這就是但憑武力不重外交的結果。俾士麥相普，利用巧妙的外交手腕，孤立其敵人，三次戰爭，俱獲勝利。普法戰後，俾氏不因德國之強而忽視外交，柄政二十年中，兢兢業業，以維持英俄奧意的親交，孤立法國為職志，對於北方強鄰俄國的交誼，尤其注意。直到威廉二世即位，俾氏在被逐之前，猶含垢忍辱完成俄德同盟，以策國防的安全，大政治家的炯識與苦心，于此可見。後繼者的威廉二世與今天的希特勒，不懂得這個道理，妄自與俄為敵，並與世界為敵，才使德意志民族兩次墮落到悲慘的命運，德國的成敗往例，可為世界各國的殷鑒。

以外交來策國防的安全，其要有三：

一曰知幾。幾者動之先，明眼的政治家和國手下棋一樣，在每一着棋未動之先，就要算到若干步以外。譬如眼前有一件事似乎對我有利，但高手都能看出在目前的小利之後隱藏着無窮的大患，因此雖有利而不貪。政治家決不拿自己一時的小小成功誇耀民衆，滿足虛榮，却要為國家民族的遠大利益打算，有時雖受重謗而不辭。貪一時之小利而

忘未來之大患，政治家所不爲。

二，辨形。處於列國交爭之中，立國者必須審辨其四周的形勢，何國爲我之友，何國爲我之敵；何國可友而不可友，何國可敵而不可敵；何國萬不可爲我之友，何國萬不可爲我之敵。這一切都須依照地理，歷史，國情，及國際的利害形勢爲判，萬不可但憑個人的喜怒，亦不可迎合民衆的心理。每一個國家都有其萬不可開罪的友邦，如德之與俄。德國處歐陸中原四戰之地，與任何國家爲敵尙不至亡，但如與其背後強大的俄國爲敵則必敗無疑。俾斯麥一生兢兢以保持德俄國交爲務，就是懂得這個形勢。

三曰取實。政治家爭實而不爭名，國與國的交涉，不能但佔便宜而毫不吃虧，政治家能爲國家佔便宜，而忠於謀國的政治家尤貴有時能爲國家吃小虧，故小氣不必爭，小刺激須能忍，對於萬不可與敵的鄰國尤貴果決剛斷，吃虧忍辱，把枝節的懸案，儘量解決。吃點小虧不要緊，因爲小虧是大便宜，若是小事爭執，絲毫不肯從容解決，到了吃大虧的時候，就手足無所措了。

偉大的政治家 知幾之來甚微，形之分甚明，故能事先準形而立策，臨事知幾而預謀，當前審虛實而果決斷策；無識的政治家，事前則爭小利而不知趨避，臨事則張皇失措，當爭不爭，當讓不讓，國事因之而敗壞者不知凡幾。所以立國當賴有大政治家之領

道，國防的基礎與其說建築於軍事上，不如說外交更重要些。

——三三、四、一一、新中國日報——

政治與軍事

在抗戰時期，舉國上下都以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為號召，這自然是天經地義，但如何才能達到軍事勝利的目的呢？這就不是很簡單的了，因為軍事勝利有其先決的條件，這些條件不一定是屬於軍事的，有如政治方面的設施和做法，雖非軍事性質，却可以直接影響到軍事方面，政治上如果措施得宜，必可以促進軍事勝利的早日到臨。

譬如此次河南戰事，在日寇雖係臨死前的掙扎，但其勢也不可完全輕視。野獸到了臨死的時候，挺而走險，其反噬的力量必倍於平日，此次河南的戰事雖結果日寇必將蹈前幾次湘北戰事的覆轍。抱頭鼠竄而去，但就眼前講，日寇的野心和毒計都比那幾次湘北戰事更加兇險，前幾次的戰事，日寇的目的是在虜掠物資，破壞我經濟力量，並不見得有深入的計劃；此次河南戰事，則除經濟目的以外顯然尚有其他更大的目的。因此我們對於此次戰事也不可以輕心掉之，我們不可狃於前幾次湘北戰事的結果，以為日寇之志仍不過在虜掠，必須警覺他有更險毒的陰謀而須以全力應付之。

談到全力應付，就不單是軍事的事了，目前我政府在西北一帶，駐有大兵，本不懼

日寇的西犯，此一路大兵如能抽掉出關，參加豫西的戰事，則戰事全局必可改觀。又陝北方面亦另有一路重兵，此重兵若能開拔東下，從晉南出太行山以附日寇之背，則日寇必進退失據，無形中減輕了豫西軍事上若干的負擔。但此兩路重兵若欲同時開拔，則不單純是軍事的事，必須以政治力量輔助之。據本月十二日重慶大公報社論評述，知王世杰氏在西安正商談此事，我們希望此事須速求一解決，切不可輕心掉之。抗戰以來，全國上下，均以國家民族的共同利益為前提，精神團結，一心一德，才有今日的國際地位，寇患愈深，各方面的警覺也愈切，我們知道今後中國各方面的有力人士，必更能本「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精神，全力合作，以政治促進軍事的效率，以軍力打擊日寇的反噬。

再如物價問題，在眼前抗戰中的中國成爲一極嚴重的問題，一般公教人員叫苦連天，尙是小事，我們試想前方的士兵，那一個人沒有家眷，沒有親屬，若是前方的軍人流血打仗，而留在後方的親屬受物價的壓迫，無法生存，影響有多大！中國軍人這七年來爲國家的犧牲貢獻真夠偉大，今後社會情形更形艱苦，中國軍人的吃苦精神也必更能表現是無疑的。但爲社會公道起見。我們却不可坐視軍人吃苦，以爲軍人當然吃苦；我們必須努力解決物價問題的危機，使軍人不必顧慮其自身及後方親屬的生活問題，安心打

仗，但如何才能解決物價問題呢？這依然是一個政治的問題，只有政治上有了辦法，才能穩定物價，制止投機，並進而實行計口授糧，憑證購物的嚴格經濟統制政策，以穩定前後方的人心。

現在正是試驗我中華民族政治才能之際，願舉國上下勿忽視此事。

——三三、五、一六、新中國日報——

變化裏的統一

希臘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經發現過一條關於美學的原則，這就叫做「變化裏的統一」。凡是藝術上成功的作品，都必須是一面有變化多端的複雜性。一面又不失其諧和的統一性的，不合乎這個原則的，就不算是成功的藝術。

亞里士多德的這條美學原理，雖在二千年後的藝術學家眼中，也被認為不易的真理。

政治也是一種藝術，成功的政治家同時也就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創造者，所以亞里士多德這條定理，也可以同樣應用到政治方面。

變化的統一，是對單調的統一而言。一個國家的政治必須保持其統一性，這是無疑的，因為不如此則不成為一個國家，但所謂統一，決不是全國的人都穿一樣的制服，走一樣的步伐，讀一種報紙，喊一樣口號，只許保持一種的信仰，——這都是納粹德國的拿手好戲。如果是這樣的統一，這是單一的統一，無標的統一，因為在統一裏面沒有變化，所以失去了藝術的價值，只有像德國和日本那樣低能的民族，才會創造出這樣醜惡

的失去藝術性的政治方式。

現在成功的國家，都是能夠遵守這種「變化裏的統一」的藝術原則的，英國是世界政治上最成功的國家，也是最能應用這個原則的國家。英國的政治外表最複雜，一面容許各自治領，各黨派，各階級，各個人的獨立自由，一面却又最能發揮諧和統一的效用，一點也不妨及國家的統一。其他各國雖不如英國人的政治藝術這樣高明，但也都漸漸地向這條路去走，特別是蘇聯，自從撤消第三國際和准許各邦有外交軍事獨立權後，已遵着英國的這條路去走了。

特別在大國裏，這條原則的應用更形重要。統治一個大國比小國更難，人口多，土地廣，種族和信仰複雜，經濟的利害也不盡同，所有這些矛盾如果用一條鞭的辦法去強求單調的統一，結果必致反失却國家的機動性，使整個民族變成了一大堆的機械木偶，只有應用變化裏的統一的藝術最高原理，才能使國家從無機的狀態，化到有機的狀態，民主政治之所以高於獨裁政治，就在這個地方。

——三三、六、一、新中國日報——

超過和戰的戰爭

人類國際間的戰爭可分兩種：一種是普通國際間的戰爭，可以叫做「和戰的戰爭」。這種戰爭以媾和爲目的，無論勝敗誰屬，敗者不過喪師失地而已，過後仍可以恢復兩國的國交，立於平等地位，我國春秋時代的大部分戰爭，和歐洲在十九世紀以前的許多戰爭，大體都是屬於此類；另一種則是兩個民族或兩種文化體系賭生死存亡的決戰，這種戰爭不是用通常的媾和關係所能夠解決的。敗者不但喪師失地，并須將全民族的命運和信仰屈服於勝利者鐵蹄之下，完全改變了他們的傳統和生活方式，接受戰勝者的統治；我國在戰國時代，和古代西洋希臘對波斯的戰爭，羅馬對迦太基的戰爭，以及中古初期羅馬人對日耳曼人的戰爭。都是屬於此類。

我們已屢次指出今天的世界已由春秋時代入於新戰國時代，今天的戰爭是世界上各民族賭生死存亡的大戰，而且是幾種文化體系的決戰，人類歷史到了現階段，必然要發生這類性質的大戰。從前希臘時代的比羅奔尼蘇戰爭即屬於此類；但是有些人仍然不明瞭這種戰爭的嚴重性質，譬如在此次抗戰之始，還有些妥協分子暗中想以和議解決中日

間的衝突，不但在日本，他們的軍閥曾經夢想三個月內解決「支那事件」，以為只要打到南京就可媾和，即在中國方面也還有不少汪精衛的應聲蟲，自命為悲觀主義者的人，暗中希望以媾和了結此事。論理，七年來的長期抗戰，應該把這種迷夢早就打破了，但是在此次日本東條內閣的坍塌和納粹德國的炸彈案發生之初，還有不少人以為是德國和日本投降的預兆。不錯，德國和日本終久必要投降，是不成問題的，我在七年以前就和一般自命悲觀分子的人爭辯過這個問題，但所謂投降，必然須是羅邱所宣言的無條件投降，而絕不是普通戰敗後的平等議和。即使德國的國防軍打倒了納粹，即使日本的文治派打倒軍閥（這是決不可能的事），他們也只能於無條件投降和繼續堅強作戰的兩條路中間選擇一條，決不能希望還有平等議和的可能，如果盟國方面還有人夢想此次戰爭可以議和方式了結，則結果必致誤墜入敵人的詭計，培養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種子。

就中日兩國關係而言，七個年來日本國策早就以滅亡中國為目的，軍閥如此，文治派也是如此，不過文治派比軍閥所用的手段更巧妙些，更毒辣些，所謂幣原外交并不是和平的外交，而是用經濟，文化，外交等更毒辣的方式滅亡中國的手段，比軍閥所用的手段更狠毒百倍，幸虧天奪其魄，日本國民選擇了拙劣的軍閥來代替狠毒的元老重臣，方有今天的四面受敵，所以我們以中國人的立場看來，一個自由主義的日本，甚至社

會主義的日本，也決不能放棄滅亡中國的念頭，比軍閥日本更可怕，更要防備，只有澈底打倒日本，解除日本的武裝，摧毀日本的工業基礎，才有永保東亞和平的可能。

——三三、七、二五、新中國日報——

培養事業精神

抗戰勝利在望，而建國大業百端待舉，我國今日號稱四強之一，徒以過去七年血戰，軍民上下之犧牲奮鬥有以得之。願戰後而欲永保此強國之地位，則非切實於建國必須之基礎事業下極深之努力不可，若如今日之文事武備，乃至衣食住行，舉無不仰給於外人，而猶欲自廁於強國之林，誠未見其可也。

建國事業，經緯百端，今人動輒期諸政治社會之全般改革，不知所謂政治與社會者，特抽象之代表名詞耳，凡大名詞皆由無數細微之小單位積累而成，由一點一滴之改革，累積而成鉅大之變革，所謂「羅馬非一日之羅馬也」。若不從細微處入手，惟事大言壯語以奔走政治改造社會自命，則所變更者不過一紙空文，幾條口號，少數居上位者之人選而已，下層各項機構，依樣葫蘆，換湯而不換藥，所變更者殆已幾希。辛亥以前，一般人以為只要政治革命成功，國家即可一步登天。民國十四五年之際，一般社會革命者亦以為只要社會革命成功，中國亦必立時轉換面目，其結果均不如所期。大抵中國過去文人傳統，以不求甚解，務觀大略為高，以為有志天下者即不必灑掃一室，其

結果但能大言壯語，而委以事業，一籌莫展，甚至以事業家爲俗惡，爲萎瑣，舉天下之號爲清流者，但能揮塵清談，而百凡事業遂不得不委之於俗惡萎瑣者之手，此革命之所以數十年而國基仍未鞏固之原因也。

今日欲真正努力建國事業，則必自打破清流習氣，培養事業精神始。對於已成功之事業及事業人才，宜多方維護，略其小節而全其大體，對於未成功之事業及事業人才，尤宜多方協助，解除其困難，增勵其勇氣，使未成功者能循正途以成功，既成功者更得因舊基而猛晉，積少成多，化零爲整，一事成功，事事成功，則整個社會皆可得卒獲其益焉。

今日爲事業之敵者有數端焉：一曰嫉妬，見人成功則生嫉妬之心，必欲破壞之而後快，此其一也；二曰意氣，激于意氣，雖是亦非，不論實際，但鬧逞快，此其二也；三曰情面，牽於情面，不能放手做事，事業家有求事業之合理化而不顧情面者，則羣起攻之，此其三也；四曰凌犯，事業成功，貴于上下組織井然，如臂使指，而中國人習氣，多好以下凌上，以爲清高，結果使事業秩序紊亂，無法推動，此其四也；五曰鬆懈，凡事洩洩沓沓，不肯起勁，如已疲之卒，雖驅不動，此其五也。凡此五端，皆爲事業之大敵，欲事業之有成，必須去此五敵。

國人積習，好繩人之短而不好稱人之長，如有見一善而津津樂道不去口者，非目以鄉愿，即疑以妥協，此種態度實使事業家灰心短氣，而任何事業不能企其有成。願舉國上下其共勉而改之。

——三三、八、一八、新中國日報——

貝當將何以見法人？

大戰勝利在望，戰後和平會議中有一條最重要的自然是審判戰爭的禍首，因為世界上幾千萬人的生命財產之犧牲，都是由這幾個禍首所造成的，所以戰後對於這些禍首之審判，必須從嚴，而不可稍事寬假。

禍首之中自以希特勒莫索里尼之流為元兇渠魁，理應付之極刑，但還有比希莫諸魔更罪大惡極者，這就是賴伐爾，吉斯林之流的賣國賊。因為希特勒之流雖然窮兇極惡，畢竟就他本國的立場看來，不失為為國效忠，他們的舉措雖然錯誤，以致替本國惹下滔天大禍，但這只能說是誤國，禍國，而尚非賣國；誤國，禍國之罪與賣國固尚去一間。惟有賴伐爾之流，甘心出賣祖國的利益，投效敵人的陣營，為虎作倀，認賊為父，廉恥喪盡，良知全泯，尚靦然以救民水火，維持和平自居，這一類人乃真是人類所不應容者，為宇宙正氣計，為人類尊嚴計，為國家綱紀計，這一類人都應當在十惡不赦之例是無疑的。寧可以放過希特勒，而決不應該放，賴伐爾之流，這就如曹操雖然姦雄，尚可義釋華容，而華歆之流的漏宮角色，則為大義所決不能容之故。

現在盟軍已經逼近巴黎，巴黎和全法國的解放即在目前，維琪政府一般傀儡人物，已經狼狽逃往萊因區邊界之貝爾福特，最後當然逃往德境，託庇於讎敵宇下，等到盟軍打進柏林之後，賴伐爾之流的命運不問可知，這其間最難過的當然是貝當。

貝當和賴伐爾的情形有些不同，賴伐爾乃是甘心自願當賣國賊，供敵人的玩耍，罪在必誅，貝當則情形尚有可原，因為他是老朽昏庸，頭腦簡單，不知國際大勢，一時受姦人包圍，墮入陷阱，做了個頭號的大傀儡，原他的本心，或許尚出於愛國的動機。在他當初的估計，也許受了一般法國反英派親德分子的宣傳，以為英國背棄了法國，為法國計，只有投入德國的懷抱，才能保全一般上流社會的生命財產。這一般人又製出一個自己騙自己的口號來，說什麼歐洲大陸自己團結，以抵抗海外的侵略。如果歐洲大陸的國家，真是平等合作，織成一個自由的歐洲聯邦，這自然是很合理的，無奈希特勒式的歐洲聯邦，乃是以德國為主子，而其他各國都是奴隸，這樣的聯邦，正和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一樣，是一種澈底騙人的口號，如果有人甘心贊成這種賣狗皮膏藥式的合作，不是喪心病狂，便是老朽昏庸。

為貝當計，以他在軍界的資望，以他的年齡，以他的號召力，如果在法國戰敗之後，即領導自由法國流亡到海外去繼續抗戰，則今日聲威赫赫，進入巴黎，何致讓戴高

樂讓出頭？即不然，忍辱求和爲城下之盟，保全半壁江山，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希特勒撕毀了康邊協定，進兵南法，土倫軍艦自行鑿沉之後，德軍已破壞信約，貝當便應該毅然下野以謝國人，乃不此之圖，聽任賴伐爾上台，而仍舊戀棧下去，甘爲傀儡，魏剛被禁而不能救，海軍自毀而不能殉，如此元首，有何意味，事到如今，悔之晚矣。

這就是一切悲觀分子的下場榜樣，爲貝當計，真不值得。

——三三、八、二二、新中國日報——

戰後處置日本問題

我不知道在這個時機提出這個問題是否合適，也不知道這個問題能否容許公開討論，但我便覺得這個問題似乎終久有提醒大家注意的必要，因為今後五十年中，中國國運的安危和太平洋上和平繁榮的保持全看這個問題的處置是否得當，我們既是一個中國人，爲忠於謀國起見，不能不憑自己的良知貢獻一點懇直的意见。一方面，討論這個問題的時機似乎也已經成熟了，盟國的勝利業已在望，四大強國已經在華盛頓開始討論，戰後國際和平機構的種種問題，羅斯福總統已經宣稱中美兩國關於佔領日本一事成立口頭協議，外交大計雖由政府主持，但在民主國家中，全國公民對於這些問題是容許自由討論的，因此我願意以一個中國公民的資格來公開討論這個問題。

有些戰後的問題，在戰爭期間是不大容易平心靜氣的討論的，特別是對於敵國的處置問題。在戰爭進行的時候，國民心理充滿了仇恨，直捷痛決的議論最容易被接受，而憂深慮遠的見解則每易忽略過去。立國的大計，世界的全局，豈是單憑感情所能應付得了的，一個國家，多有幾種比較理智一點的意见，對於事實總不會有什麼大害處

吧！

日本不但是中國的敵人，也是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的公敵，明治維新以來七十六年之中，日本的國策，一貫是由征服朝鮮以征服中國大陸，由征服中國大陸以完成其征服全世界，「八紘一宇」的迷夢，爲着抵抗日本的征服行動，中國及其同盟國家，七年以來犧牲了無數生命，財產，血汗，時間，以圖制止這個惡魔的行動，現在這種犧牲還在繼續擴大增長之中，到了戰後，豈不是應該想一個一勞永逸的辦法，以防止這個惡魔的復活，使我們的子子孫孫不再受一次或數次的蹂躪嗎？單就人情講，這種要求也是很公道的。

但如何才能永久防止日本侵略運動的復活？我們既不能從地球上面一舉把這個擁有七千萬人口的侵略惡魔移往地球以外，日本民族存在於地球上一天，和她鄰接的國家便須時時刻刻提心弔胆以準備不定何時突然而來的侵襲，聯盟國家不能永久派兵佔領這個國家，因爲這是事實上所不容許的，中美英蘇和太平洋上最多愛好和平的民族的相互團結雖可以使日本從此不生野心，但國際間的關係且變動不常的，誰能保二十年後這些主權國家的關係還能沒有一點變動？國際制裁機構的成立自然是一種比較進步的計劃，但世界政府既然一時尚不能出現，民族的意識和利害打算一時也不能消除，照現在擬議中

的計劃，將來制裁的責任仍將委之於幾個主要國家之手，這幾個主要國家間的步調，誰能保其永久融洽一致？過去國聯的失敗便是我們前車之鑒。然則靠國際和平機構來制裁野心國家的侵略復活，依然是一種不可知的變數，依然是不能保險的。這就是我們同盟國家當前的一個焦心問題。

爲着這個，主要同盟國家的幾個領袖之間，似乎有一種默契的諒解，就是在戰後短期佔領日本，以待教化日本人民學習了愛好和平的生活以後，再來讓其恢復自由，這就是羅斯福總統所宣稱的辦法，也是頓巴敦橡樹林會議中所行將解決的辦法，也就是我們此地所要討論的。

戰後暫時佔領日本，盟軍在東京大路上作勝利式的行軍，這是二次世界性大戰的邏輯的必然結果，也是必要的。爲着教訓日本人民，了於自己已經戰敗，而並非自動放棄其「大東亞共榮圈」計劃，免致再受其軍閥及野心家的欺騙煽動起見，盟軍以勝利式的姿勢在東京市上出現，是必要的，但並不能單靠這個方式來保證永久消滅日本的復讎野心。因爲盟軍的佔領不能無限期地延長下去，如果善後的保障不能建立，一旦佔領軍撤退的時候。就是日本舉國上下埋頭復讎的時候，這復讎一旦到來，將比蘆溝橋和珍珠港的火燄更爲可怕。

我們必須承認，民族自尊的感情是不容易也不應該抹殺。納粹和日本的失敗，就在輕視這種民族自尊的感情，有已無人，妄想以征服的方式強迫他人與之合作，結果適與其預期相反，對於這些一味迷信武力的蠻族，雖不妨即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叫他們也嘗嘗征服的滋味，但是這種方法是不可靠的，對於像德國日本這樣愛國心強烈的民族，單靠佔領的方式去強迫他們洗心革面，而佔領又不能永久，控制的力量也不保永遠鞏固，這無寧是埋藏一個火藥庫於地下，以待將來的爆發，危險是不堪設想的。

羅斯福總統說得好：「日本爲日本人之日本」，這句話一方面說，凡非日本人所生聚的地方，都不應該准許日本人染指，從另外一方面說，則凡日本人歷來所生的地方，就應該聽任日本人自決，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樣，這種辦法不但是公道，也是聰明。我們既不能用殲滅，驅逐，及永久佔領的方式去對付這一個蠻族，則最合理而又最聰明的辦法，自然是扶植日本內部的民主力量，使理智的勢力戰勝感情的力量，讓日本國內的和平分子慢慢領導他們的國家走上與世界各國和平相處的大道。誠然，日本目前並無此種民主和平的力裏，但我們不能說日本人全是野蠻嗜殺之徒，其中產生不出一點和平的種子，凡和日本平民相處過的人，以及對於日本過去的文學哲理稍微了解一點的人，都應該承認日本大多數的平民原也和世界一切平民一樣，是願意過和平生活的，不然，在

豐臣秀吉瘋狂的侵略之後，就不會有三百年長期的德川幕府的和平孤立時代了。日本人的侵略性，是近七十年來軍閥有意模仿普魯士教育的結果，是違反日本平民的自然欲望的。所以問題并不在日本人民能否變為愛好和平，而在乎如何使日本國內愛好和平，能過民主自由合作生活的力量抬起頭來。任何仰仗外國勢力所直接扶植起來的政府，是不會得其本國人民的衷心擁護的，是不會樹立統治的威權的。一個被征服國家的政府，如果國內駐有外國軍隊，如果政治設施處處仰外國人的鼻息，如果國防經濟教育文化處處須接受不利於本國的條件，這樣一個政府就不會自動存在許久，而不過是替未來的反動派造成攻擊的口實，這個反動派一旦到舊領軍撤退之後，即刻會抬起頭來的。

歷史上有幾件國際的大舉措可以供我們作正反兩面的參考。拿破崙失敗之後，聯軍進入巴黎，在維也納會議中依然准許法國代表以平等資格參加，不割地，不喪權，因此在和議以後法國的路易十八政府并未受到民衆的攻擊，法國民族也不存復仇的心理，歐洲各大國之間和平相處了四十多年。一八六五年的普奧戰爭，俾斯麥力排普魯士軍人的橫暴主張，避免進軍維也納，戰後和議，不割寸地，結果普奧國家由仇成好，奠定了後來三國同盟的基礎。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戰爭，俾斯麥不能制止威廉第二和毛奇的虛榮心，不但割地賠款，而且在凡爾賽宮舉行德意志統一的典禮，大大刺激了法人的感情，

結果種下後來四十年兩國的深仇大恨，而招致第一次歐戰的失敗。第一次歐戰之後，克來蒙梭以復仇的氣焰威壓德國，強迫接受不合理的凡爾賽條約，以致威瑪憲法所產生的民主力量，因接受屈辱和約之故，不為德國人民所諒解，拉特瑙被刺於前，斯特萊斯曼盡瘁於後，反動勢力逐漸抬頭，遂有希特勒政權的出現。如果凡爾賽和會中的列強巨頭，能稍稍有梅特涅和俾斯麥的遠識，以平等的條件處理戰敗的德國，則民主勢力不會在德國傾覆，復仇心理不會在德國人民心中滋長，這一次全世界的慘禍也許就不曾出現。我們看了拿破崙失敗後的法國態度是如何，就可以知道一個民族復仇火燄會不會燃燒起來，是和他們在戰敗後所受的待遇如何有關的。

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至少在今後五十年中，中國也必依然是個以陸上為生存主要條件的國家無疑。今後五十年中中國的國策，一面固須小心翼翼避免與海權主要國家的衝突，以免無謂捲入糾紛，一面更應該小小翼翼求取陸上國際的安全保障。陸上與中國毗鄰的大國，自以蘇聯為最重要，今後中國的國策必須效法法俾斯麥相的遠識，以求取蘇聯的友誼為第一要務是無疑的。其次便是日本。日本雖是島國，但與中國大陸距離最近，與陸上鄰國無異，此次戰後，日本的海陸空軍武裝自必全部解除，以期取去侵略的爪牙，但解除武裝並不是一種絕對保險的辦法，凡爾賽和約後的德國何嘗不解除武

裝，但希特勒上台不過七年，便已有了征服全歐的武力，我們應該沒有忘記最初德國的軍事機構，是在蘇聯境內秘密培養起來的。明白了這個，便可以知道一個復仇心盛的國家，即使武裝全部解除，也依然有復興的辦法。海軍的恢復較難，而陸空軍的恢復則較易，將來日本如欲秘密恢復軍備，自必須從陸空軍着手，復讎的火箭不指向較近而較易着手的中國，又將指向誰？然則數十年後，我們豈不是又陷入第一二次大戰中間法蘭西的噩運？本欲求安全保障，而結果反保障終無，安全不易。所以今後無論何人何黨執政，對於中日的歷史恩怨必須求一長治久安的解決方策，否則幾十年後再來一次歷史的重演，我們實在受不了。

中國和日本過去歷史上的關係好比一對前生冤孽的夫妻，離又離不開，和又和不了，中國人有句俗話，冤家宜解不宜結，既是前生對頂，今生便須謀解除冤孽之道，以免來生冤冤相報，糾纏不已。日本的侵略我國，由於其軍閥眼光短淺，不識大體，人來迫我之時，我自有誓死抵抗到底，給她嘗嘗苦頭，但到了戰勝攻取之時，我們的算盤便應該打得更精一點，更遠一點，照歷史上宿命的看法，中日的關係是有類於十九世紀德奧的關係，俾斯麥在普奧戰爭後對待奧國的方略，是我們今日所應該仔細研究一下的。

二十四年以前，我到日本的時候，當時改造社會出了一本徵文專號叫做「百年後之

日本」，記得裏面有一篇文章主張日本風景美麗，百年後應該闢作世界的公園，這篇由日本人之手的論文，由今看來是很有見解的。爲日本人民的繁榮福利計，爲太平洋四周國家的安全和平計，日本變成一個世界的公園，實在是人已兩利的事情。日本人民如有遠識，應該效法北歐的瑞典，放棄侵略的野心，做一個和平孤立而繁榮的國家；太平洋上主要國家的政府如有遠識，也應該在戰後扶助日本使向此途發展。日本的重工業必須摧毀，但輕工業不妨聽其存在；海軍必須摧毀，但商船不妨酌留一部分；使日本人民在戰後能憑藉其勤勞的習慣，科學的素養，從事於和平商業的發展，以養此三島上七千多萬的人口。日本人民有了生計，「鬼有所歸，始不爲厲」，野心家了沒有煽動的機會，一個民主和平的政府才能存在。爲世界人類的和平計，全世界民主國家都應該注意此點，爲中國與日本的特殊關係計，中國人更應該及早了解此點。

——三三、八、二六——二七、新中國日報——

回憶過去·創造將來

——三十三年國慶獻辭——

今天是民國成立的三十三度紀念日，我們欣逢國慶令節，曠觀國際大勢，最後勝利的光明局面已經擺在眼前，檢討國內的政治軍事局勢，又覺尙待警惕之處甚多，我們站在這三十三年後的今日，回顧民國締造的當初，尤覺感想重重。一個國家的締造真是不容易，時間經過三十三年了，我們這個國家還沒有真正走上民主國家的大路，國家的獨立與自由還在受威脅，失地還不能尅期收復，並且還在繼續失地喪師。人民的生活也還沒有改善，并且日益艱苦。我們有什麼說的呢？一句話說，我們對不起爲革命流血的先烈，對不起武昌起義當時全國人民熱烈的期望，對不起歷史的教訓，因爲我們直到三十三年後的今日，還在才從革命以前的預備立憲第一章開步走。

回想三十三年以前，中國的統治權正握在一般昏庸執拗的滿清貴胄之手。滿清統治的命運，自從曾左諸人戡平洪楊的鉅亂以後，一時似乎有中興的氣象，但不久就被中法，中日兩次的失敗所沖沒了。中日戰爭的失敗，引起全國留心國事的人民的憤慨和要

求改革的呼聲，當時國內對政治改革的主張自然分爲兩派：康梁的變法運動，始終不過想在保全清室政權的前提之下求取一點進步的改革，這種運動不但與清室無損，並且確實實對於清室是有利的。當時康梁一派的保皇黨人所持的理由，是清室這個政治中心不可輕易推倒，因爲推倒是容易的，但推倒一個中心之後，要想再建設一個強有力的政治中心，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了；在這舊中心已倒，新中心未建設成功以前，國家的局面必陷於混亂，甚至危亡；因爲這個，所以他們誠心誠意希望在承認舊政權的前提下，謀取憲政的改革。當時的清朝君主光緒很能接受立憲派的這種要求，也很願意和他們攜手共謀國家的改革。無奈頑固的反動勢力在滿清皇室貴族中力量太大，他們不了解憲政運動是大大有利於滿清政權的，他們不了解只有實行憲政才是保全清室政權的唯一大路；他們分不清楚憲政和革命的區分點，視憲政黨人和革命黨人同樣可惡，同樣應該排斥，因此才使比較溫和的康梁一派始終不能推進政治入於常軌。結果全國人民由失望而憤慨，由憤慨而轉趨極端，滿清皇室貴胄的昏聩頑固，助長了革命黨，助長了革命的成功。到了梁任公先生在國風報上也大聲疾呼中國非革命不可的時候，滿清的命運就決定了。

孫中山先生等領導的革命運動，起初本是直接受洪楊革命排滿思想的影響，最初本

不爲全國多數智識份子所了解，所接受，直到立憲派的戊戌變法運動受清朝頑固派的阻撓失敗以後，接着庚子拳亂和日俄戰爭兩次的國恥國難，清廷尙不知覺悟，徒以五大臣出洋，九年預備立憲的空言搪塞國人，這才使人民逐漸傾向他們一向所懷疑戒懼的革命黨。同時革命黨人也改變方略，以孫中山先生爲領袖的興中會，本是以海外華僑爲主體，雖有雄厚的資力背景，但對國內尙感鞭長莫及，直到同盟會成立於東京。集合以黃克強先生所領導的兩湖會黨爲主體的華興會及章太炎先生所領導的江浙智識份子爲主體的光復會，三派合流，文字宣傳與武力革命並重，革命的高潮才一天一天膨漲起來。當時在攝政王領導下的宣統朝廷，一面有慶親王奕劻等老朽貪污的元老重臣，公然招權納賄，一面有貝子載洵，貝勒載濤等少年紈袴，竊弄兵權，驕詐狂妄，一面又有良弼等死硬派的滿人高唱「寧送外人，不送家奴」的口號。在預備立憲的假招牌之下，各省算是成立了諮議局，中央也成立資政院，但是政權却死握在一般親貴之手，換來換去總不過是這一般人，政治上看不見一點革新的氣息，還在夢想中央集權，奪取各省地方的權利，結果引起了四川的鐵路國有風潮，斷送了滿清二百六十八年統治的天下。

辛亥革命是革命立憲兩派合作的結果，自從武昌一起義，立憲派如湯化龍等就在軍政府中佔重要的地位，四川的保路風潮完全由立憲派人所領導，是人所共知，此外如江

蘇浙江等省的獨立，也是由諮議局中的立憲派所促成的。立憲黨人爲什麼會贊成革命，會和革命黨合作，這不是他們願意如此，是滿清親貴的頑固政府所造成的。如果他們能服從他們有遠識的領袖光緒皇帝的主張，早點接受憲政派的要求，實行憲法，開放政權，則武昌革命不會發生，帝國也不會換成了民國。

我們今天站在三十三年度的國慶令節，來回顧民國當初的艱難締造的歷史，真有點替滿清惋惜，惋惜他們太愚蠢了，辨不清朋友與敵人的分野，不能當機立斷，採取一種最有利於自己的政策，以政治改革打銷革命黨的宣傳；反而逼迫溫和派不能不走上和革命黨攜手的路上去，不但他們的政治生命完了，連國家的命運也幾乎同斬，大亂直亂了三十有三年。

人類是應該有自由意志的，過去這些陳舊的歷史覆轍，是不值得我們再重演一下了。我們今天舉國上下所需要的，是拿出理智來，拿出自由創造的勇氣來，同心協力，創造一個自由民主的新國家，創造我們將來的，勝利的，歡欣鼓舞的中華民國第三十四年度的國慶。

老生常談節錄

二十六年秋，抗戰軍興，余時參太原大帥戎幕，日居危城中，進無以獻籌軍國，退無以協濟生民，乃發憤閉戶讀書，日有所感，輒記之於帙，兩月中成書兩卷，題曰老生常談，嘗有句云：「袖手談心早自慚，危時無計只空看，閉門學得安心法，兩卷書成當罪言。」蓋記實也。入蜀後，偶有所思，亦追記之，惟牽於人事，所得不多。人生思想如電光石火，若不及時捕捉之，稍縱即逝，事過景遷，追憶甚難。嘗慕法儒 巴斯噶之思想一書，今茲所輯，亦略仿其意。當作是書時，行年未四十，不敢云老，然已垂垂老矣！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余「罔」則未能，「殆」則庶幾云耳。時事多艱，人生靡定，所以重理此稿，付之校刊，亦懼其久而散佚之故，非敢以云有所見於道也。

昔年意氣正盛，作詩雖有中年憂患之句，實未知中年憂患之真意。自前昨兩年亡妻碧梧及小女紹汾相繼死亡，旋遭國破家亡之禍，迄今時事固日非，而舉家五口，寄跡戰

區，已三月不通音訊，生死莫卜，乃知中年憂患之如此其逼人。

讀陳師會悼亡詩三首，語語逼真，若代我作者，爲之擲筆。

翊清逝後，余悼亡之作甚多，碧梧逝後，至今兩年，所作寥寥，非厚於彼而薄於此也。少年心專，中年心雜；少年詞暢，中年詞艱；少年春也，雖悼亡而不失生氣；中年秋也，雖不言悼而生氣索然，無言之哀，其哀有盛於言者。

此時心情說哀亦不是，只是惘惘，萬事都覺惘惘，無過哀亦無過樂。碧梧逝後，余嘗有悼詩云：「心事中年漸已灰，但能惘惘不成哀！」即指此心情也。

人生憂鬱，有由於環境者，亦有由於性格者，性格由於生理，最難排遣之憂鬱病爲生理的憂鬱病，如消化不良，血液不淨，俱易刺激神經，發生憂鬱，甚而自殺。余幸無此病，然偶遇疲勞過甚，或消化不良，睡眠不足時，亦時有憂鬱之想，然大體言之，余究爲樂觀的人。

人的思想感情大抵受生理影響者多，所以人到中年以後，多數有悲觀憂鬱傾向。

人的年齡雖同，而思想和生理情形不必盡同，我以爲欲判斷人的年齡，至少須分三種：第一是社會年齡，即普通社會所公認之年齡計算法，如某人四十歲，即是其人在社會年齡爲四十歲；第二爲心理年齡，第二爲生理年齡，此二種年齡，不必與社會年齡一

致。有人年未老而身體先衰，思想已不進步者，有年已老而體尚健，心智尚強者，足見論人之年齡，當有三種計算法也。

生理學家說：人之血液循環次數，大抵一生皆相差不過，不過循環有快有慢，循環快者壽促，慢者壽長，其實皆一也。因思道士輩以靜坐內視之法延壽，即設法使血液循環速度變慢耳，若以血液循環之次數作為年齡計算標準，則修道者之長壽仍與短壽者無以異也。

修道者縱使長壽，其一生官能的感覺和智力的感受都較未修道者為齷，此種長壽有何意味？

一種社會文化的發展，也有遲速長短之別，凡文化過於燦爛者其衰必速。

世界近百年來之文化進步，等於過去三千年的進步，以社會的生理年齡論，近來的一百年，便抵得過去的三千年，又抵得石器時代的一百萬年。

因此研究歷史者，必須懂得歷史時間與一般時間不同，歷史上的時間，是以事積累成的，事愈多者，其時間即愈長，在歷史上即應佔重要地位，楚漢交爭時之五年，比後來二百年為長，若僅以一般時間之標準而論歷史，則為笨伯。

宇宙間的時間也是由事積累成的，所以宇宙間無相等的時間，此理相對論已發揮過

了。

事是由動作積累成的，故宇宙祇是一個動而已，動之極即是不動，兩物皆向同一方向動則爲靜，兩物向異方向動始爲動，故動靜一也，其所以不同乃是看法不同耳。

凡動靜皆是由我的地位看出來的，即所謂坐標也，無我，則無動亦無靜矣。（以上皆二十七年五六月間作）

狂人與有常識的人究竟那一種人能够做出大事業，是一個待討論的問題。大抵世界上的大事業都是由狂人做得出來，而常識豐富的人大抵不能做事。但大事業不必即是成功的事業，大事業差不多都是失敗的，故狂人能做大事而多失敗，常識的人不做任何大事而成功了。

世界上的人不狂者甚少，每一個人總帶幾分狂性，不過程度深淺不同耳。

每一部好的歷史，都是代表歷史家的哲學，無哲學的歷史是笨伯的歷史，無哲學的民族是無前途的民族。

人說英國人是最富於常識的民族，然英國的富強文明亦是由許多狂人所造成的，拉雷、漢布頓、格蘭斯頓、克倫威爾、克萊武皆狂人也。

天才亦有多方面的，如蘇東坡、立奧達文西、萊比尼茲、歌德皆是。

中國學術自漢以前講得是天人兩字，宋以後講得是心性兩字，從今以後則應講羣己兩字。

因思及陳銓先生謂西洋文學有四個階段，希臘時代以「世界」爲中心，中古時代以「上帝」爲中心，文藝復興以後以「個人」爲中心，現代則以「社會」爲中心，與吾前說可以印證。（見大公報三十一年一月七日戰國第三期）中國文化亦有四期，除前舉之三期外，自魏晉至唐爲佛教思想極盛時期，可與歐洲中古時期相等，惟此時期之中心觀念，非上帝而爲「色空」一耳。

友人謝慕沙君謂中國古代傳統思想爲「天人相應」說，天即「自然」，人即「人事」，專講天人相互適應之理，故有裨於民族發展，是爲「人的文化」。自印度思想輸入後，乃始拋棄人事，專講天理，可謂爲「鬼的文化」或「鬼道主義」。今日中國思想運動，應努力拋棄鬼道主義，恢復「人道主義」。（以上三十一年作）

野蠻民族一經沾濡文化，變爲文化民族之後，每被其他野蠻民族所征服，此爲歷史之恒例。蓋野蠻民族呼吸於自然空氣之中，日受自然之鍛鍊，精力彌滿，一如天然之花草，較之人工培植暖室生長之花草，其適應環境之力較強也。此亦可謂爲自然對人工之報復，人類誇稱征服自然，徒虛語耳。

野蠻民族因羨慕文化生活之舒適而起征服慾，及征服成功，一變而爲文化民族，瞬即文弱衰頹，甚至生機斷絕，種族滅亡，不但民族國家如此，家庭及個人亦然。蓋天下無專享福不受罪之理，自然界之乘除如此方爲公道，達爾文主義者徒知優勝劣敗，不知優勝者終必歸於失敗，劣敗者轉有圖強之機會，此進化論之不如道德經之見理透徹處也。

人每羨慕他人成功，不知成功者僅就其所成功之一點而言，就生活全部論，所舍棄者已甚多，有多數部分之失敗，始能造成一點之成功，故成功愈大者，其生活之苦痛處愈多。古來帝王及一切政治上之偉大領袖，其子孫多不肖，多互相殺戮，終至舉族以殉。就其個人生活而言，亦無朋友，無娛樂，無自由，無休息，如拉磨之驢，終日辛苦，不知所爲何來？自政治慾不強者視之，其苦實不堪言。大學者，大發明家，其事業之成功者，亦必舍棄家庭及社會生活，終日埋頭矻矻，甚至常識全無，起居飲食尙須他人照料。就天道（即自然公例）言之，此爲乘除至理，就社會言之，此爲分工之必然現象，不如此，社會即不能進步。故圓滿者不偉大，偉大者不圓滿，決無兼而具之可能。就社會觀點言，似以偉大較圓滿更重要，蓋圓滿所以造就個人，而偉大則能造就社會也。談教育理想者必須注意此點。惟就目前社會進化之階段言，似以少數天才發展其

偉大性，多數常人發展其圓滿性，爲較切於事實。

孟子謂人之欲富貴，所爲的是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余謂此三項以最後一項爲最有力，人之不耐貧窮者，布衣粗食尙不苦，最怕者爲社會之看不起，故貧窮人咬菜根易，耐人白眼難，能耐人白眼而滿不在乎者，始爲豪傑之士，始能轉社會而不爲社會所轉，此陶靖節之所以爲千古高人也。

貧而耐尙不難，貧而樂乃真難，古人環堵不蔽風雨而歌聲出金石，其胸中自有一段境界，超乎流俗故也。（以上三十三年四月九日作）

讀斯文赫定博士亞洲腹地旅行記，載有吉爾吉斯人關於帕米爾高原模斯達格亞達山（Mus-Taq-Ata）的神話，謂有一賢老上山，見山上有數白衣老者坐於李樹下，此老吃李，遂加入其中，亦變爲仙人云云。因思此故事或與老子指李爲姓的神話有關，又與老子西去化胡的故事有關，不知兩者之間孰先孰後，或漢魏以後中國勢力達於西域，始將此神話帶到西域耳。

靈感非他，即電流最激動腦神經之時也。（四月十日）

讀王壬秋湘綺樓說詩，此老一生務高務偏，行迹詭異，心術人品俱無可取，湘軍志一書專意詆毀當時賢豪，蓋謗書也。論詩亦甚偏，不但管杜，且謂大家重詞不重意，詩

之旨須以詞掩意，學阮陶不如學陸（陸機），均有意翻案，實無可取。其可取者：一文有朝代，詩有家數，文取通行，故一代之風，詩由心聲，故一人有一人之派，論文而分班馬，論詩而區唐宋，非知言也。」此論判詩文之異，頗有獨見。惟後又謂「詩亦自有朝代」，則又不能自堅其說矣。

由王壬秋而廖季平，由廖季平而康南海，今文家之說遂猖獗一時，皆心術之蔽也。凡今文學家多心術不端，故學術遂誤，然能掀起一代之革命，故不失為豪傑之士。凡革命思想家，皆心術人品之詭異者，如盧梭、福祿特爾之流，否則迂儒如馬克思之流。人品平正者，其學術亦平正，只能為孟德斯鳩、彌爾，不能為盧、福，只能談改良，不能鼓吹革命也。革命是反抗社會傳統意識制度之事，故必為社會所不齒者為之。

同光之間，論詩派者王壬秋高標六朝，章太炎繼之，其途自誤。惟如鄭蘇戡陳伯嚴之揭舉宋派，江西詩法，風靡天下，亦非正道。近時為同光體者，多流為漢奸，由其心術詭異故也。陳伯嚴不喜張廣雅詩，余則以為堂廡闊大，終以廣雅為正，雖有紗帽氣何妨。紗帽中人而貌為山林，如嚴鈴山阮圓海之流，乃為偽耳。

湘綺論詩有極痛快處：一歐陽伯元又送詩來，詩自忠節，行自叛逆，詩言涕淚，而方慶賀新國，乃知讀書人之偽，由文與行分二事也。一鈴山詠懷兩集，意境何嘗不高，

而爲人如此，故觀人必於其行。

張文襄轡軒語雖爲中人以下說法，未免陳腐，然自是達道。凡世途昌明，則學術思想自歸於平正通達，世衰道敝，則人心必先相率趨於詭異。近代詩宗西江，詞宗夢窗，書法宗北魏，皆人心詭異之敝也。

讀歐陽竟無釋悲（內學院院訓），此老學道人，胸中鬱勃不平乃爾，於親族死生之際，亦未能釋然，此老是豪傑，非聖賢也。古云出家是大丈夫事，英雄豪傑爭取天下，更大之英雄豪傑則爭取宇宙，及其既爭得宇宙，則化爲聖賢，而無不平之氣矣。宗教家皆情感盛於理智者，大學者如牛頓、康德、達爾文、愛因斯坦之流，則理智重於情感，故無偏倚之氣，惟其理智過重，故末流不免流於貪鄙，如培根是也。

非希特是宗教家，而非理智者。

分宜讀書鈴山堂時，尙有清操，此時之詩，未必是僞。圓海則純粹小人，鈴山不過庸人，爲富貴所誤耳，此二人高下之分。

竟無先生論佛學，標舉法相，般若，而訾薄中土各宗，此自家法門戶之見，自教徒立場觀之，自應爲是，若自局外人觀之，則中土諸宗，何嘗非各有見地耶？必謂印土傳來者，始爲真正佛法，不知佛之初教不過小乘，若大乘諸派，皆後起之假佛以自樹一說

者，如漢宋諸儒之說，本不能即認爲孔子原意也。儒家爭漢宋，佛徒爭中印，皆局內人門戶拘虛之見耳。（以上四月十二日作）

讀新中國日報卅三年四月十四日社論：「大家都來自新吧」（似是余景陶作），論近幾十年來因革命黨爭之結果，人心愈趨機詐：「今之學校青年，其熟悉世故，其構造人事網，其竊位弄法之思慮，深澈固密，令人不寒而慄，懸想一二十年後，中國不知更將遭受到如何的慘禍！」其言痛切，可發人深省。

今日世事頗與西晉初年相似，經三國之擾亂而有晉武之暫時統一，然統一不過二十年即有八王之亂，瞬至五胡雲擾，中原淪陷者，以其創業之始，即純恃權詐恣睢，欺人孤兒寡婦，毫無道德之感召，豔妻怙寵，官吏貪侈，士夫清談，宗室驕暴，如此政治，即無外族之窺伺，亦必亂無疑。

凡是一種大事業，大學問，其成功全靠最後五分鐘，天下事本無一做即成者，艱難困苦，正是鍛鍊人的勇氣，孟子所謂「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確實閱歷有得之言。釋迦牟尼得道之先，必經過苦行禁食之鍛鍊，耶穌基督受魔鬼的試探四十餘日，穆罕默德也有同樣的經驗，這些大聖人之所以能創立世界上偉大的宗教系統，就因

爲他們曾經忍受過這些鍛鍊。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正是經過試探以後的自信語。

個人如此，民族也何莫不然。一個民族的獨立自由，也必須經過無數苦痛的試鍊才能獲得。古代羅馬反抗迦太基名將漢尼拔，血戰十餘年，長期對抗至百年以上；十四世紀法國人反抗英國的征服，大戰百年；十七世紀荷蘭人向西班牙爭取獨立自由，血戰十餘年；十八世紀普魯士腓特烈克大王反抗俄奧英法的聯軍，血戰七年；美國獨立戰爭，血戰七年；甚至已經亡國的民族如波蘭人爭取獨立，百年之中，前仆後繼，終告成功；愛爾蘭新芬黨人爲自由奮鬥，殺人流血，前後也達數年，始得有今日的自由邦，這些都是我們中國人的好榜樣。

中國民族因爲體質太差的緣故，往往缺少長期堅忍的意志，在球類競賽中，往往球藝雖佳，而不免敗於舉動笨拙的日本人，就是不能長期堅忍的緣故。現在這一次民族生死的大競賽中，希望我們不要又犯了老毛病才好。

王靜安先生在新著《人間詞話》中，有一段說得最好，他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須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

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最後之境界也。中國的抗戰現正到了「衣帶漸寬」的階段了，要緊的是「終不悔」這三個字，只要做到這三個字，偉大光榮的新中國，必然可以在「燈火闌珊」之處產生出來。

錢賓四先生國史大綱謂：晉初不能以忠教人，故不得已而專談孝，其言甚是。晉初大臣如王祥，末宦如李密，皆以孝著，然祥身事二君，視人家國如奕棋，徒以不拜司馬為高，雖孝何益？李密不得已而仕晉，其心可原，然晚年轉以仕宦不達為恨，則亦可謂患得患失者矣。

中國民族自西漢以後，即趨衰老，故江左六朝之昏亂，轉不如北朝魏周之猶有制度文物可觀。隋唐盛治皆憑藉鮮卑民族基礎，即其帝系亦為胡漢混血，非純漢人也，唐室中興，平安史之亂者，多賴番將，可知漢人精力早已衰亡矣。宋明皆漢人所建朝代，其規模氣力遠遜於蒙古滿洲，以此言之，中國民族前途希望甚少，一姓不再興，此言亦可應用於民族興衰。

一部中國民族史，是由北南遷的歷史，受北方新興民族之壓迫，漢人乃不得不逐漸南移，愈趨近溫暖地帶，則民族之生機愈少，近代中國之支柱者全賴嶺表湖湘人物，且寢至於南洋島嶼矣，此民族前途之悲運也。

欲挽救民族之衰老，非及早實行混血政策，與新興民族通婚，以變換衰老之血統不可。唐太宗原是混血兒，母族竇氏，出於匈奴，外祖宇文氏出於鮮卑，李氏亦有羌人之疑。妻長孫氏亦鮮卑人，唐之偉大即在於此。

元時色目人雜居中國，文化及血統上混合甚大，明太祖之創業全賴阿拉伯回教徒之力，常遇春、鄭和，皆回回也，明之所以稍強於宋者，殆以此。

自唐末至明末，應謂爲阿拉伯文化輸入時代，近人講中國史者多忽略此點。

今世民族最有希望者莫如斯拉夫民族，此次戰爭如德國失敗，則斯拉夫民族將代條頓民族而興。秦在春秋，被阻於晉，始終不得志，及三晉既分，魏霸衰而後秦人虎視，莫之能禦。今之俄，古之秦也。斯巴達與雅典爭霸百餘年，而後馬其頓起於北方，統一希臘，今之英、美，古之雅典，今之德，古之斯巴達，今之俄，古之馬其頓也。列寧變法，如商鞅之治秦，中國不幸與此北方之強隣相接，今後安枕之機會甚少。

有萬萬不可與敵之國，如中國與蘇聯是也。友人曾慕韓襄主三戰立國論，欲對俄一戰，其言幸而不用耳。試問中國對俄將如何戰法？小心翼翼，以備強隣，謀國之忠當如是。俾斯麥相德，始終主張親俄，此俾相所以爲大政治家也，威廉二世，希特勒，不知此理，所以致敗。

今日對俄必須保持邊疆，以圖兩國之緩衝，而保持邊疆之策，在善用外交，和平相處，懸案必求速決，小爭執必須立讓，不可因小失大，毒蛇螫手，壯士斷腕，今日謀國者必須知此意。然虛僞之氣中於後生，如何能識此意？（以上四月十五日作）

昨與陳善新君談：良史家須有歷史的智識，哲學的眼光，文學的手腕，今日中國之史學家僅知對歷史材料考據精詳，而無哲學眼光以駕馭材料，故不能造成系統，僅能堆積若干材料成爲流水賬簿而已。至於藝術手腕之描寫，更爲一般作史者所忽略，甚且公然反對矣。今日平旦，枕上覆思，此即劉知幾所謂史有三長，才學識是也。才即文學的手腕，識即哲學的眼光，可知吾輩議論，古人都已見到，說過，今人稍有知見，即自矜創獲，其不爲古人所笑者幾希矣。

一種民族，由野蠻進至文化之後，即由強而轉弱，甚至衰亡，故文化對民族生命甚爲不利，但由野蠻進於文化，乃民族進化之目的，若長此滯於野蠻境地，則亦非民族之所願，此等民族謂之爲尙未成熟可也。野蠻者必企文明，未成熟者必企成熟，既文明既成熟，生機即達於圓滿之境，同時即開始衰亡，此乃自然界乘除之公例；如生物於幼稚時代必企成長，及成長之後瞬即死亡。蠶化爲蛾，死期即至，然欲蠶之不企化爲蛾不可也，蓋化蛾乃蠶所以出生於世間之目的也，若永無化蛾之可能，則亦無生蠶之必要矣。

蠶與蛾同爲一種昆蟲生命之一體，野蠻與文明亦同爲一種民族生命之一體，蠶蛾之個體滅亡，而種族綿延，即爲成功，民族之種性淪亡，而文化綿延傳遞於後起之其他民族，自此民族視之，誠爲不幸，而自全人類之立場看之，仍不失爲成功也。

中國哲學最知陰陽消長盈虛之理，周易老子均發揮此義。夏至陽極而一陰已伏，冬至陰極而一陽已生，泰極則否來，剝極則復至，天道以圓爲極，故曰：「若張弓然」，成功之極即伏衰亡之機，世未有永久成功之人與事也。道家惟知此義，故深懼成功，以免失敗。儒家明知此義而不避失敗，盡其所應盡之責任，故儒家之義爲長。釋氏厭苦幻滅，企求超出生死，永住涅槃，乃妄見耳。

圓者事之極，均者圓之體，圓無體，以均爲體，即以衆事爲體，而不立一體也。中者圓之用，即不執着於一點，隨均勢爲運用也。求中於一點，或離萬事以求超然之中，其所謂中者已非中矣。

近念年來治史學者多偏重考據，汲清代漢學之末流，雖賢者如梁任公輩亦爲時代風氣所轉移，墮入此種窠臼，其細者疲神於瑣屑掌故碎義，難逃玩物喪志，已屬無謂矣，而近年以來，史界風氣益趨詭異，好爲荒誕之說，牽強附會，汗漫不經，自清末已有附會法人拉克伯里之妄論，謂中國民族源於巴比崙者，又有認穆天子傳爲正史，據之以考

古代中國與西域之交通史蹟者，其說已極可笑。近時又有人主張墨翟爲印度人者，有主中國人首先發現美洲者，甚至有謂楚國民族及文化源於印度者，大抵根據一二音聲之相似，再牽合一二種荒誕不經之小說（如梁四公傳之類），以成其妄論，此又考據之下乘者也。

中國考據家好以音義相似之字附會成說，自王念孫之讀書雜誌已犯此弊，其實古今音訓偶然相似，已難據以立證，況中外語言文字互異，豈可以音聲之偶近，即強指爲一物一事耶。如章太炎之法顯發現西半球說，謂佛國記之耶科提國，即中美洲之厄瓜多爾，不知厄瓜多爾乃西班牙人發現西半球後所立之新名，義指赤道國，豈得於一千年前即有此名耶？今人知章說之可笑，而不知其證明方式之類似章說者正多也。

石頭記考證及紅樓夢索引二書，以名義之影射，牽合清初史蹟，其誤謬與近時考據之風正同。憶民初衆議院大演武劇，副議長陳國祥受傷，有人於報端戲作紅樓夢考證一文，謂賈寶玉秦鍾等大鬧賈家塾一回，即影射此事，蓋陳國祥與賈天祥之名頗可影射也。今之考據多此類耳，施之小說尙不可，況正史耶。（以上四月廿一日作）

錢著國史大綱，謂自曹不受漢禪以後，中國人凡屬同族相遞嬗者，皆用禪讓方式，惟異族如元清之入侵，如明太祖之北伐，始用征誅方式耳。在曹魏以前尙未發明禪讓公

式，故王莽篡漢，不得不以五德終始符瑞受命之理論自緣飾，其說可取。漢魏之間發明禪讓公式之人必爲大有才者。

曹子桓頗富文士幽默氣息，其受禪之日自語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後來篡奪之君無此從容，曹氏父子畢竟不凡。滿清遜位亦係用禪讓方式，可證錢說。

前年益世報文史副刊（？）有人謂王導之所以爲江左夷吾者，以其能勸晉元帝引用江東大族，不分畛域也，其言深有見地。惜今之當局者無此宏度，三國惟吳之祚歷爲長，亦以其能與世族妥協耳。

王導深於黃老之術，能與自然推移，故能草創東晉，延民族一線之緒，然東晉之所以始終不能恢復北方者，亦坐此。庾亮兄弟欲任法裁物，正欲矯此風氣，而不爲時代所容，所以失敗。桓溫亦然。然東晉國基未固，若逞庾氏兄弟之欲，或早亂亡矣，張浚符離之潰可鑒也。

諸葛孔明明知蜀漢之力斷不能滅魏，其所以六出祁山者，乃以攻爲守耳，故不爭必爭之地，而耀兵於隴南僻遠之區，其不用魏延子午谷之計者以此。當時及後世人多不知武侯此種苦心。（以上四月廿二日作）

今日（三十二年四月廿六日）新中國日報社論「要做一個利人利己的人」，謂中國

的社會有缺憾，大概是因爲中國的人倫哲學有缺憾之所致。因中國哲學欲平天下必從修身齊家做起，國既不治，家亦難齊，身亦難修，故目的終難達到。洋人則先從治國入手，然後再談身家，故國治而身家問題亦迎刃而解，其言頗有新見地。此問題之是非，一時尚不能決，容細思之。

大學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若如上述記者之論，則大學反爲本末倒置矣。大抵先家後國者儒家之論也，先國後家者法家之論也。

讀馮承鈞先生「唐代華化蕃胡考」，謂「科學人種爲下等人種、天然人種、動物學方面的人種，文化人種則爲混合人種、歷史人種、社會學方面的人種，總而言之，雜種是已。」「吾人研究歷史，又得下一公例：凡歷史種族皆爲雜種。」「漢種爲歷史種族，則吾人研究中國歷史，又得下一公例：漢種爲雜種。」其言深得我心，其謂高齊李唐均爲蕃人，亦與余前歲在華文月刊所說相同，當時尙未見馮說也。（以上四月廿六日作）

重慶大公報胡政之先生著「訪英訪美心影記」，載有某蘇聯人士來到英國，謂英國戰時氣氛不及蘇聯之一半，而美國戰時氣氛又不如英國之一半。美國以得天獨厚之故，其人民習於富厚，看事甚易，此次來華之美空軍青年，多認爲三個月內即能打通海口，此種執梃子弟氣象，以吾輩視之，終恐非美國前途之福。斯賓格勒謂美國將來必爲世界

之霸主，余則謂凡富庶之國人民習於佚樂者，絕無大志，美國並不可畏，雖有機器，不過助長其腐化速度耳。將來可畏者仍在蘇聯。

中國歷來留學政策，偏重留美，結果將美人之佚樂精神輸入中國，惟物質享樂之是求。夫美人機械文明已達高點，其人民之務於享樂猶可言也，若中國之物質文明未做到一成，而亦效美人之提高生活標準，此如破落戶之舊家庭子弟，與新興之暴發戶子弟相交，一切效其所爲，其不自戕生命者幾希矣。今後如欲拯救中國，必須改變留學政策，多遣留歐學生，少送留美，俄國太苦不易學，學英德最好。惟今日政治社會領導權已操於留美學生之手，恐此議未見能實行也。

中國舊論：「生於貧賤，死於安樂，」終爲見道之言，雖廿世紀此論不能廢。

早起寫字，誤筆迭出，此爲精神不貫注之證，凡大事業大學問皆從精力出，余年未五十而精力渙散已如此，且早已如此，可卜其無大成就也。

「需者事之賊」，余終身犯此病，知之而終不能改，意志不强之故也。

余少生長於山西中部平原之地，富厚之家，遺傳外祖之文學瀟灑性，故意志終不能堅，以未受艱苦之鍛鍊故耳，此亦可證「生於貧賤，死於安樂」之說。

水滸故事流傳人口，其書實含有社會革命之精神，後來續作均不識此意，羅貫中之

征四寇，陳忱之水滸後傳，俞仲華之蕩寇誌，及近來張恨水之水滸新傳，均欲強使此一百八人爲宋室忠臣，或爲宋室忠臣所剿滅，所見何其小耶？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以宋江之才傑，勝於趙佶趙桓何止千萬倍，使當時果有此一百八人之俠義團體，則逢金人入寇之機會，必能外攘敵寇，內除昏君奸相，而打出一座新江山矣，何必定爲趙氏效忠，始爲可取耶？趙匡胤既可攘天下於柴氏孤兒寡婦之手，宋江何不可取天下於趙佶趙桓之手而代之，或擁護柴進恢復周家之故物耶？（趙宋天下本係周世宗代爲打出者）嘗擬撰新水滸演義，使梁山英雄攘金取遼，代宋而興，廢君主世襲之制，實行社會革命，創一理想之俠義民主國家，因所事甚多，此書未必能動手作，故聊記其大意於此，姑作快想。

洪楊之太平天國，即本「水滸精神」而擴大其事業者，惜洪秀全非宋江之才，又誤用洋教，不合國人心理，故卒歸失敗。曾文正有成功之道，而受儒、道兩家思想陶鎔過深，不敢有取天下之志，均屬可惜，使中國國運敗壞於那拉氏婦人之手者，曾氏之謙退有以致之也。

曾氏初起，頗有法家精神，惜後爲儒道兩家所誤，觀其以李贊皇張叔大自居，可想見其少年氣象。然法家者流，亦僅期爲霸佐，不敢自居於最高領袖也。

曾文正當時所部豪俊，對曾並不心服，故即使曾氏有帝王之野心，亦必失敗，其神不足以懾人也。

楊揚卿勸當局削藩，乃強幹弱枝至計，友人某公乃以削藩爲楊氏致死之道，以此爲罪，豈中國不應成立統一強固之政府，藩鎮勢力不應削除耶？

日本明治維新之初，藩閥策士勸其主獻地奉權，以促成國家之統一，中國之策士乃爲其主劃策以對抗中央，是僅知有派系而不知有國也。

先安內後攘外乃立國不易之道，今人懷抱黨見者乃以此爲罪，不知中國倘真有遠識及大魄力之領袖，則早應集中力量澈底削平內亂及割據勢力，對外則必須忍辱退讓，不輕易興起大戰，倘使後方之割據及亂黨勢力早經完全掃除，然後起而抗戰，則今日後方許多姑息養奸之狀態，必不至重現，惜乎豎子輩不足以語此也，蓋大豪傑作事，必須不爲俗論所動搖耳。

漢武之攘外，乃漢初至文景六十餘年間長期對匈奴忍辱和平休養生息之功。漢人重實際，故對外政策應付得宜，即東晉雖士流崇尚玄虛，然有識之士如蔡謨王羲之輩，猶能自審己力，抨擊高調，以桓溫、劉裕之雄傑，值北方分裂之機會，尙不能收復北方，桓一敗於霸上白鹿原，再敗於枋頭，劉取關中而不能守，可知東晉實無經略北方之實力。

也。宋以後士大夫徒知高調，而不務實際，秦檜主和固爲奸臣，然如陳亮、陸游、辛棄疾輩文人，即使付以大權，輕率北伐，其能免於符離之潰也幾希，王玄謨即其先例也。

林文忠固是名臣，然鴉片事件不明外情，竟輕率啓釁，使始終當海疆之任，亦不過葉名琛耳。今人過於客氣，譽之過甚，未免無謂。惟如有人力翻舊案，認琦善爲大外交家，則似亦不必。當時主戰者盡妄人，主和者盡庸人，即後來之曾李輩，亦未爲真知外情者，僅一郭嵩燾對西洋政治社會有真知灼見耳。（以上四月廿七日作）

凡人立言各有所宜，因時不同，因地不同，蓋人不過社會複雜關係中之一環，其言非完全代表個人意見，實兼代表其社會地位及關係也。如一國外交，勢須讓步，但在國民立場則必須主張強硬，因非國民態度強硬，則政治外交即連妥協也做不到也。所以古人云「與父言慈，與子言孝」，梁任公以今日之我與前日之我挑戰，君主時代則主君憲，民國以後則反對復辟，此正深得立言之宜，梁任公之所以偉大遠勝於康南海之處在此，今日之拘墟者執一孔之見，欲以施之何時何地，反訾任公爲投機趨時，適足見其固陋而已矣。（四月廿九日）

讀重慶大公報載，董時進先生論「兼職之風」（卅二年四月廿八日關欄），現身說法，頗有趣味，此君可愛。

昨日（卅二年五月二日）報載嚴立三先生逝世，此公堅苦卓絕，爲今世不可多得之人物。惟氣度稍狹耳。湖北人一般認爲狡獪者多，故有「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之誚。然以余所見友朋中鄂人骨鯁者甚多，惟氣度均狹。張江陵殆即此種人型之代表。金聖嘆評水滸林冲，謂此種人一定做得出事業來，但斲喪元氣也不少，即謂此也。前乎江陵者有李贊皇王荆公，甚至王景略亦此類人物，均適於法家性格，「刻深峭直」四字是其的評。湖北人此種性格不知是地域之關係歟？（所謂九頭鳥者乃指鄂東武漢一帶商人「俗謂之下五府」，非能概指全部，此二十年前友人邱君「亦鄂人」語。）抑清末以來學風之提倡所致歟？

凡人主張多即其性格中所缺乏者，心理分析學上所謂彌補缺憾者也。友人某公性格本近法家，而偏要主張儒家，余則性格絕不近法家，而偏主張法家，蓋皆所謂彌補缺憾是也。

讀三十二年四月十一日桂林大公報重慶通訊「盟國之間」，載郭沫若在新華日報撰「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稱頌李自成及李巖等（原文未見）爲民族英雄，中央日報遂爲文駁之。左派人士好捧土匪流寇，過去李小順楊公宋江黃巢等均有人捧過，此與漢奸學者之捧秦檜、琦善，均爲有意之宣傳作用，實則歪曲事實，故作翻案文章耳。李闖打破

北京之後，一遇清兵，即譁言辨子兵到矣，遂大潰敗，棄京而西逃，此種武力，謂能抵抗外侮，恐與事實不合。

唐高祖取長安，隋兵見突厥兵而驚潰，黃巢破長安，見沙陀鴉軍而驚潰，與李闖事前後一轍，勇於內戰，怯於對外，民族根性何其卑劣也。（以上五月三日作）

連日讀李劫人小說大波，記四川辛亥革命前爭路風潮事，可當史料讀。余意歷史能如此作，或可人人讀之有趣，筆墨亦近寫實，以楚子材與黃太太之偷情爲骨幹，尤爲點染不易之法。作者寢饋於法國文學既久，天資又高，故能得法國自然派作者之遺意，惟議論稍多，抄文件稍多，貪作史料，不得不如此耳。

趙爾豐周孝懷輩當時爲川人所恨，至欲殺之，乃事隔卅年，今日談康事者猶無以易趙氏，談川政者亦無以易周氏，二氏之功績，即川人中之有識者亦均稱之，可見公道自在人心，久而後始見也。張之洞在鄂興辦工業，當時人譏其鋪張，乃今日抗戰後方工業尚須倚賴於此，可見人做一點事，總有一點成績。

今日談政治工業，猶須推尊趙周張諸氏，亦可見民國三十年來進步甚少，過去政治上人物之誤國，真可恨也。

昨夜讀文選陳琳代曹操「檄吳將校部曲文」，內有「驅率羌胡」，「羣氐率服」，

「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燹……武都氏羌」等語，可知當時國軍中異族人甚多，蜀漢亦有叟兵，是五胡亂華之禍已伏於此時矣，與西羅馬帝國末年相似。又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文中亦有「胡騎千羣」之語。（以上五月十一日作）

漢哀帝建平四年正月，關東民訛言行籌，無故驚走，持傳相付與，日行西王母籌。按此即今之所謂十人連鎖、五人連鎖也，特其動機不同耳。（五月廿三日）

歷史事常有巧合者，清世祖入關後，與明裔對抗十餘年，及永曆被執而順治亦殂，明年聖祖立而鄭成功卒，是明之氣運歷順治一朝至康熙而始絕也。又順治入關之前一年（一六四三）法王路易十四即位，太后及首相馬薩林攝政，其時英王查理一世與國會衝突，克林威爾專政，至順治十七年英王查理二世復辟而告一段落，其翌年順治亦殂矣。聖祖即位之年，法王路易十四始親政，康熙廿一年（一六八二）三藩亂平，而俄帝大彼得始立，故康熙時代可謂爲路易十四時代。仁宗嘉慶元年（一七九六）拿破崙始征義大利，及道光元年而拿破崙卒，故嘉慶時代可謂與拿破崙時代相終始。道光時代（一八二一——一八五〇）恰爲歐洲自由主義革命時代，及文宗即位之第二年，而拿破崙三世稱法帝，咸豐時代（一八五一一——一八六一）殆與拿破崙三世之霸權相終始。穆宗同治元

年，而普王威廉一世立，局面又一變。同治時代即法衰德興之時代也。又道光末年洪秀全起兵，同治立而洪軍始衰，故咸豐與洪氏似亦相終始者。

南北朝初宋文帝與魏太武對峙卅年，即位於同年，卒年相去僅一歲，且皆被弑。魏文成帝時代，恰當宋孝武時代，獻文帝時代，恰當宋明帝時代，孝文帝時代，恰當齊高武時代，宣武帝立而齊亡，梁簡文立而北齊高洋亦篡立，元帝立而西魏廢帝不立年號，陳霸先篡立與北周宇文覺之篡立同年，此皆事之巧合者也。（以上六月十二日作）

讀陳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以種族問題爲唐代歷史之中心，其言深合生物史觀之旨，惟末論河朔之地本爲中原文化中心，後因民族遷徙，始染胡風，遂釀安史之亂，其言似稍有未審。按河朔之地在漢以前，亦非中原文化中心，當時文化中心在河南山東即黃河以南，以洛陽爲中心，河北向來即是邊區，東漢末爲防烏桓鮮卑，始積兵粟於河北，鄴郡及黎陽由此變爲要區。至北平之成爲政治中心，則又在慕容氏據薊之後，而造端亦始於東漢。光武據河北以定天下，劉備關張亦起於幽州自成一集團，東北之重要性開始於此時。

春秋中葉以後，以東方爲中心之齊魯文化俱漸衰老，代之而起者爲西北之晉及南方之楚，入戰國後，三晉分裂，西秦崛起，在文化系統上秦實爲晉之繼承者。楚分爲三、

西楚衰歇，文化中心移於東楚，即春秋末之吳越新興民族與楚文化之混合也。始皇以秦而統一中國，亡秦者項羽劉邦均東楚人。秦漢之際，即西北民族文化與東南民族文化之鬥爭最顯著階段，亦即結春秋晉楚相持之局，漢初以東南征服西北，其統治集團多屬楚人，自定都關中後，逐漸與西北文化混合，此兩大文化系統遂歸統一，吳楚七國之變，又其餘波耳。漢武以後，崇尚辭賦，吳楚文化遂風靡天下矣。（以上十一月七日作）

隋唐皆出於北周宇文泰之部族集團，故其派系意識極強，唐高祖赦王世充而斬竇建德者，以世充爲隋朝大臣，本屬同僚，而建德則起自細民，以布衣而革帝王之命，罪在不赦故也。其用宇文士及封德彝裴矩等亦此意。隋末羣雄角逐而唐卒成功者，以其屬於隋室大臣，隋之羣臣將士均歸心故也。李密亦屬隋功臣之後，而所憑藉爲羣盜，故不爲上層社會所歸服。（十一月十七日）

唐高祖純粹是一老官僚，其老朽昏庸處活脫官僚氣象，幸有幾個出色兒子和女兒，才成得大事。太宗固是人傑，即建成元吉亦均非庸庸者流，平陽公主尤爲傑出，大抵皆稟母氏遺傳。竇氏本爲匈奴紇豆陵氏，冒稱東漢竇武之後。竇太后外祖又爲宇文氏，其稟新興民族剛強之氣也固宜，太宗兄弟皆可謂爲匈奴鮮卑漢人混合產生之血統，故能文武兼資，迴絕百代，其太子承乾，自幼慕胡風，乃遺傳稟性，非偶然也。高宗之昏庸懦

弱，以遺傳自高祖者爲多，符於門得爾代遺傳之定律。以此觀之，則李氏或爲漢人，非胡族也。

晉明帝之母，亦爲鮮卑人，故有黃鬚鮮卑兒之稱，其英傑超過乃父者，殆非偶然。孝武之母李氏本爲機房女子，故帝之昏庸處不但似其父簡文，亦或遺傳其母之下流根性耳。司馬氏一家似有昏愚之血統，故晉、惠、簡文、孝武及會稽王道子皆特別愚闇。

北魏孝文帝之母爲漢人，故孝文帝特慕華風，北周宣帝之母爲江陵倡女，故宣帝荒淫，大失其祖父嚴整之風，均非偶然。

政治上成功的人物，自幼皆跡弛不羈者，邱吉爾顧少川在學生時代皆違反校規，不肯循常安故者。笛斯沙累少時亦豪奢爲其父所不喜。從來家庭及學校教育皆不過爲造就平凡人才計，固不足以適應非常之才也。

禽獸社會中成功之領袖皆強有力者，人類社會中成功之領袖皆奸狡者。一般學校教育乃以庸德庸行教人，皆教人爲被統治者，而非爲統治者設。（以上十一月廿三日作）

枕上偶思：王莽末民間預言劉秀爲天子，而光武即應其讖。何以如此有驗？按光武兄名劉縯，帝名秀，或原名係繡字，後始改爲秀，以應符讖耳。帝字文叔，固可云取文秀之義，謂爲取刺繡文之義，亦無不可。（十二月八日）

歷代領袖皆樂用小人而不樂用君子，何也？固由小人諂佞，而君子不肯詭隨使然，然亦不可概而論。大抵小人雖無德而多有才，君子則徒有德而才不足以副之，若欲濟一事，還是小人痛快，蓋小人練達人情而君子則否故也。魏武下令求不忠不孝，負污辱之名，不肖之行，而有富國強兵之術者，蓋深識此意。大抵創業當多用小人，守成則當多用君子，又對於小人不可多所譏刺，使稍養其廉恥，則不致毫無忌憚，如是而已。

房杜佐唐太宗陰謀篡奪，卒至子孫絕滅，長孫無忌亦然。李勣暮年深懼盈滿，以詭遇自保，臨終戒弟可謂懇至，然敬業卒覆其宗。始禍者不祥，誰謂因果不可信哉？（以上十二月十一日作）

閱文史雜誌第四卷三、四期合刊，李得賢君「湘軍志與湘軍記」一文，持論頗允，引柳亞子詩云：「少聞曲筆湘軍志，老負虛名太史公，古色斑斕真意少，吾先無取是王翁。」評王壬秋處與鄙見頗合。（十二月廿三日）

今之布爾什維克與古之回教頗相類，穆罕默德死後即有索尼、十葉兩派之爭，十葉派領袖阿力被刺，其勢力暫時被壓迫，但至一百三十年後（七五〇），其後裔又乘奧馬亞王朝之衰亂而恢復勢力，自立阿拔斯朝。蘇俄自列寧死後，亦分爲史大林、托洛斯基兩派，托氏雖被刺，托派雖被壓迫，然其教義及精神自有不死之點，不及百年，托派必

於另一國家中建立托派政權，懸記吾此言以俟將來之驗。（十二月三十日）

讀金毓黻先生東北通史，蒙古即室韋一族，室韋族中有居西伯利亞者，因悟室韋、鮮卑、犀毗、音近似，古無輕唇音，韋或即讀若卑，彼此或不無淵源歟？錄之以俟大雅正之。

蒙古居北荒，開化最晚，故其氣最長，此亦可悟北魏拓跋氏何以能最後統一北方之故。

凡民族最好時，即在由野蠻初開文化之時，過此則文化濡染既深，日趨衰弱矣。春花之鮮豔，少女之嬌嬾，亦均短期間事也。

花之紅目的在結果實，少女之豔目的在生育男女，民族之文化在傳衍種性，文化而能傳衍種性，斯不亡矣。

讀東北通史，韓氏之族望爲昌黎，南北朝時之昌黎郡即今遼寧之錦義二縣地，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晉有韓恬官玄菟太守，傳至後魏時，有韓播者始徙昌黎棘城，然則韓氏雖非胡人，要已久濡染邊風，或其先即三韓豪族，以土著而長玄菟者歟？此或亦可解釋韓退之之所以能爲唐代文學革命宗匠之故。（以上五則三十三年六月廿八日在樂山記，三十四年一月九日補鈔）

唐之詩豪推李太白，唐之文豪推韓退之，二人之先皆來自塞外，此可爲生物史觀之佐證。（三十四年一月九日）

讀 R. B. Mowat 近代歐洲外交史（王造時譯）第廿二章（三〇九頁）註一，記一九二一年八月十六日英相路易喬治在衆議院演說云：「勝利中的寬大，其重要不下於勝利本身，我進一步，我想勝利中的寬大對於一國比勝利本身還更重要，因爲你在歷史書上可以找到許多悲劇，乃是不善利用勝利而起，如果這些國家從來沒有得到勝利，他還會更好一點。」頗有見地，英人惟知此意，故能保持霸權，法人惟不知此意，故屢勝而百計斂德，終不能永絕德禍，且愈發愈烈。（三月廿二日）

讀朱孟實先生談修養（中國叢書），見到之語甚多，隨手摘錄其余所同意者如下：「一個人應該從幼時就學會在自己能力範圍以內起願望，想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也能做自己所想做的事。」（立志）「延與誤永是連在一起」。（同上）「三此主義：此身，此時，此地。」（同上）「我們如要測量一個人有多少人性，最好的標準是……」（文長不錄）。（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徑走）（三十三年六月廿七日在樂山記，三十五年六月廿二日在上海補抄）

封神演義載姜子牙爲妻馬氏所棄事，按說苑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小說

語亦有本。（三十五年七月十二日）

恒星在太空中因星體之互吸而成軌道，昧者以爲軌道之在太空真如鐵道之於地上，本來有此，不知舍衆力之相吸相拒外，別無所謂軌道也。理之於事亦然，理學家以爲別有離事獨在之理，飛機未發明之前，即有飛機之理，正如向太空中尋恒星軌道，真龜毛兔角之類也。（八月十五日）

歐洲自日耳曼民族侵入後，羅馬帝國解紐，豪族所在割據，各建堡寨以自固，平民多依附之，奉爲領主，遂成封建之勢。按之我國史籍，自永嘉之亂、五胡侵華後，亦有此種現象，有堡主，屯主，塢主等名。憶東方雜誌曾有人考之，今就正史所載撮錄數則如下：晉書祖逖傳：「推逖爲行主」，又「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蓬陂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陳留太守」，「桓宣遂留助逖討諸屯塢未附者」，「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諸塢至感戴。」魏浚傳：「永嘉末與流人數百家東保河陰之硤石……及洛陽陷，屯於洛北石梁塢……襁負至者甚衆」，又「時杜預子尹爲弘農太守，屯宜陽界泉塢」，「迎（魏）該據塢，塢人震懼並服從之。」郭默傳：「永嘉之亂，默率遺衆自爲塢主，以漁舟抄東歸行旅，積年遂致巨富，依附者漸衆。」郗鑒傳：「及京師不守，寇難鋒起，鑒遂陷於陳午賊中……午以鑒有名於世，將逼爲主，鑒逃而獲免，午尋

潰散，鑿得歸鄉里……遂共推鑿爲主，舉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嶧山。「凡此皆與西史封建之初起相類，惟中國旋即分統於南北朝，政令集中，故未形成割據之勢耳。今河淮之間，堡寨甚多，往往有豪族出其間，或即永嘉之遺風也。」

北史韋祐傳：「(祐)子初嗣位開府儀同大將軍閭韓防主」，魏玄傳：「轉和州刺史伏防主」，此所謂防主雖爲統軍之名，其初或即因其據地而授之，皆封建之類也。近塞者則謂之領人酋長，或曰領主。見爾朱榮傳：「世爲部落酋帥，其先居爾朱川，因爲氏焉。高祖羽健，魏登國初爲領人酋長……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爲世業。」此封建之明證也。

北史泉叻傳：「泉叻字思道，上洛豐陽人也。世雄商洛，自晉東度，常貢屬江東，會祖景言，魏大延五年率鄉里歸化……世襲本縣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復爲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令……叻九歲喪父……年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外請叻爲縣令。……及蕭寶寅反，遣兵趣青泥，圖取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應之。」此泉姓，即後世土司之類。泉氏出自巴夷，見本傳。又李遷哲傳：「安康人也，世爲山南豪族。」扶猛傳：「上甲黃土人也，其種落號白獸蠻。」陽雄傳：「上洛邑陽人也，累葉豪族。」任果傳：「南安人也，本方隅豪族，……魏廢帝元年，率所部來附，……及成

都平，除始州刺史，周文以其方隅首領，早立忠節，進爵樂安郡公，賜以鐵券，聽相傳襲。皆與泉氏相類。

湘綺樓日記挽曾湘鄉聯云：「平生以霍子孟張叔大自期，異地不同功，戡定僅傳方面略。」是以曾公平定江南之功爲餘事，而另有偉大之抱負也。又云：「惜其齋志有不敢行者，可惋也。」曾公所齋者何志哉？又記彭雪琴云：「雪琴此去，使京中王公知天下有不能以官祿誘動之人，爲益於末俗甚大，高曾左一等矣。」又云：「偶思雪琴建船山書院之意作一聯，不可縣示，亦如曾滌生挽聯也。」綜上引諸語觀之，曾彭諸公初起事時未必無民族思想，洎功成名就，將驕卒惰，更事漸多，持盈保泰之念互於胸中，當年壯志遂消滅於無形矣。湘綺能識此意，故清亡後服務民國不以爲嫌，較康聖人之自附遺老，似尙稍勝一籌，亦船山思想之餘烈也。

章太炎「書曾刻船山遺書後」，謂「衡湘間士大夫以爲國藩悔過之舉」，又謂最後有爲國藩解者曰：「夫國藩與秀全其志一而已矣，秀全急於攘滿洲者，國藩緩於攘滿洲者」云云，可與湘綺之說參看。

太炎文錄別錄「箴新黨論」，極切時病，至今猶然。其引抱朴子論郭林宗「雖不應徵辟，終不出於浮華競名之域」，亦深中名士之弊。「翩然一隻雲中鶴，飛去飛來宰相

衙，「古今名士類此者正多，固不獨陳眉公、袁子才等人，如淵明之蕭然物外者，豈易得哉！」（以上三則三十六年三月七日作）

翁文恭同蘇日記記薛福辰言破洋人惟有陸戰，陸戰之法，曰散陣，行陣，小陣，其守法則用滇黔地營，必可操六七成勝算。按此即游擊戰抗敵之說，七十年前人（翁記此事於光緒二年）已有見到者矣。（三月八日）

附錄

編者按：以下各則，係就先生若干未完成之遺稿中摘錄而成，雖並無系統，然仍有保存之價值，故附於本書之末。

▲自來中國筆記文字，約分六派：其一，考訂文獻，網羅逸聞，可命之曰文獻派；其二，訓詁經義，校刊書篇，可命之曰訓詁派；其三，旅行所經，記其風土，可命之曰遊記派；其四，搜奇紀怪，恢張鋪比，可命之曰小說派；其五，抒情紀感，文采流連，可命之曰小品文派；其六，評隲詩文，鼓吹風雅，可命之曰詩文話派。第一派如容齋隨筆，第二派如讀書雜誌，第三派如邱處機、西遊記，第四派如搜神記，第五派如浮生六記，第六派如唐詩紀事，余今茲之作（按指老生常談）皆非其類。按六家之外，尚有說理一派，如禪宗及宋儒語錄之類，可自成一派，此作略仿其意，惟偶感即書，說理不求其精，體例亦不斬其純耳。

▲從來非常時代政治上的成功者多屬流氓，漢高、明太之類是也，希特勒也是此類

人物。蓋流氓因爲腦筋簡單，故意志堅決，無身家性命的顧慮，凡事勇往直前，不屑屑於計較成敗利害，故在鬥爭場合中常易爭勝。書生則顧慮既多，左思右想，都覺得算盤打不過來，結果一事無成，坐候解決，水滸傳上白衣秀士王倫，即是此類典型人物。希特勒如果是書生，則在此次開戰之先，定必左右打算：英法的實力如何？有無打勝的把握？打勝之後又有什麼好處？自己的國力在此次戰爭中將損失若干？蘇聯是否靠得住的朋友？有無後顧之憂？如此一來，便勇氣全消，再也打不成仗了。英法過去之失敗，即因此類書生式政治家如鮑爾溫、路易布魯姆之流執政的緣故。設使法國在希特勒進兵萊因之時，即斷然出兵干涉，或在西班牙內戰時，即公開援助人民陣綫政府，則德國何至猖獗如此。乃優柔懦怯，坐失時機，今歲不戰，明年不征，致造成三面包圍的苦境，悔之晚矣。墨索里尼雖是英雄，但也是書生出身，故此次參戰也未免顧慮得太周到些，反失去機會，也未可知。中國歷史上書生之作非常時期政治鬥爭失敗者甚多，如後漢之劉表，隋末之李密皆是。其成功者僅漢光武帝一人，亦因同時與之競爭者並無流氓之故，如公孫述之盛陳陞衛，延見故人，即是道地書生作風，其失敗固宜。諸葛亮不敢用魏延出子干谷之計，以致終其生羈促於祁山渭水之間，亦因書生過於把穩之故。近代曾文正公爲書生中之戰勝流氓者，其生平小心謹慎，自是書生美德，然所以成功並不在此，其

成功之故，乃在其人頗有流氓手段，故遇事能蠻幹、狠幹，賴此成功；且其輔佐如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彭玉麟之流，都是流氓氣很重的人，斷非謹原一輩，所以能够成功。然曾李輩畢竟爲書卷所誤，設使曾氏在平定東南以後有自取的勇氣，李氏在西后與光緒爭權的時候，有清君側的勇氣，則中國早已有了新機，何至有今日！

▲民主政治的有力的支柱，是具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意見的個人。任何形式的專政都不承認個人；在任何形式的專政之下，只有奴隸，只有留聲機器，只有被強姦意思的弱者；所謂獨裁國家，就是一個國家只有一個意見，一種報紙，一種通訊社，一個聲音。

▲擁護獨裁政治的人，往往好拿領袖制和專家政治的需要來作辯護的理由，同時反對獨裁政治的人，往往也連領袖制甚至專家政治一齊反對，其實這都是錯誤的見解。須知領袖制度、專家政治、和獨裁政治決不能混爲一談；領袖制度並不是獨裁政治所特有的形態，事實上任何社會都不能無領袖存在，而民主國家之需要領袖更甚於獨裁政治。

社會學家素羅金氏在社會變動論一書中曾告我們說：社會扁平化（即一切平等）的理想永遠是一種空想，只要社會有了組織的形式，就免不了階層化的形態出現。所謂階層化，就是有領導者和被指導者，統治者和被治者，支配團體和被支配團體的不平等的事實。實際上我們也不會發現在那個民主政治或共產主義社會，甚至無政府主義的團體

中，沒有領袖制度存在，所以領袖制並不是獨裁政治的唯一特色，領袖制的需要也不足以爲獨裁政治辯護的理由。

相反地，真正的領袖制只能存在於比較民主的社會中，而獨裁政治卻祇能產生假領袖。獨裁政治下的領袖是靠暴力取得的，往往有不配做領袖的人因爲暴力的關係，僥倖取得領袖的地位，這種領袖本身不見得真有領袖的能力，所以最後終歸失敗；如同過去直系的領袖曹錕即其一例。此外還有憑藉世襲、血統、以及其他關係徼倖取得領袖地位的，更是常有才不勝位的現象，甚至引起革命，歷史上的君主政治或貴族政治下，這種現象指不勝屈。滿清末年的皇帝溥儀和他父親載灃，就可以爲例。

民主政治則不然，民主政治下的領袖完全是靠自己的才力德望得來，像晉惠帝那樣不辨菽麥的昏君，決無被選爲領袖的希望。所以在民主政治之下，才有真領袖可言。要擁護領袖制，就得先促成民主政治。

一切政治制度的決定因素在乎民族性，所以領袖的性格才德是因民族而不同的。某種性格的人，在某一民族中可當領袖，而在另一民族中則難免失敗；如同濱口、原敬、犬養等政黨領袖，若生在大英帝國立憲政治之下，不難與格蘭斯頓、沙士柏雷等並駕齊驅，不幸生在瘋狂的日本社會中，竟被犧牲。反之，拿破崙若生在英國，希特勒若生在

中國，也決不會得到多數羣衆的狂熱的擁護。

中國二千年來受儒家王道思想的陶鎔，養成了尚德不尚力的民族性，所以民衆擁護的領袖是以德望爲主，而不是以才力權勢爲主。二千年來中國歷史上最受民衆擁戴的政治領袖是周公、漢光武、諸葛亮、曾國藩等，都是比較以德望著稱的。

▲有一位著名的理論家，把帝國主義的侵略分爲三種方式，就是①貪圖金錢的歐美派，②貪圖土地的東洋派，③爲代帝國主義作文化宣傳的國內派，這三種分法的得當與否，因爲我不是理論家，所以不敢妄肆批評。不過我至少覺得這位先生還忘記了（或者有所諱而不言）尚有一個第四派漏未列入，這第四派便是方法多端的蘇聯派。這一派把前三派的長處都一齊吸收了去，並且神而明之，要得更爲巧妙，不露狐狸尾巴。他也貪圖中國的金錢（沒收華僑的產業，排斥中國人在外蒙的貿易，壟斷外蒙經濟權，煤油花標布等大量向中國傾銷），他也貪圖中國的土地（建設外蒙傀儡國，控制新疆，指揮共黨擾亂中國的內部），他更會豢養一大批爲赤色帝國主義作文化宣傳的國內派，在思想上製造左傾的把戲，驅青年拋棄祖國去擁護蘇聯。不但在共黨和準共黨中可以找出無數這樣賣身投靠的無恥文人來，他們還會搖身一變，自稱悔悟，加入他們所反對的陣線，而實際上仍是天天替馬克思宣傳。所以我奉勸一般讀者，在接受大理論家的理論以外，

不要忘了還有第四派。（本則民國廿四年作）

▲從這次歐戰的教訓看來，一切主義制度都不過是宣傳的花樣，無關大體，只有國力才是實實在在的本錢。但是國力並非專指船堅礮利而言，也得要看使用船使用砲的人如何。法國在此次歐戰之前，未嘗不船堅礮利，但是人腐化了，當國者無遠識，臨敵者無鬥志，雖有飛機坦克而無以用之，這就種下失敗之因。德國在上次歐戰之後，武裝是全被解除，經濟是全被封鎖，但是人沒有腐化，幹勁還在，所以才有今天。

▲理想是一件看不見摸不到的東西，但卻具有無邊偉大的能力。理想能够使一個人發了狂，去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理想能够使整個社會都發了狂，去爲一件宗教上、政治上的抽象原則而犧牲一切，共同生死。任何一件大事業或是大運動，不是專靠苟且敷衍，投機取巧所能成功的，背後必須有一種深遠的理想做原動力，理想如源，事業則如水，無源之水必枯，源深則水大，源淺則水小，故一切大事業必自培養深遠的理想起。

有孔子的理想而後有二千年以來儒教化的中國，有佛陀的理想而後佛教始普遍於東南亞洲，有耶穌基督的理想而後有基督教的歐洲，有穆罕默德的理想而後有阿剌伯帝國，有奧古士丁的理想而後有一千年的教皇統治，有馬丁路德的理想而後有新教革命，有加爾文的理想而後有日內瓦新教政府，有羅耀拉的理想而後有耶穌會，有盧驢的理想而後有

法蘭西大革命，有菲希特的理想而後有德意志的統一，有馬志尼的理想而後有意大利的復興。世界上古往今來一切大事業大運動無不自理想鼓動而來，因為大事業都是靠羣衆的力量造成的，只有理想才可以團結羣衆，利祿權勢卻只可以驅使一般塚中枯骨的行尸走肉。一個理想枯竭的民族必然不會久存於世界，一個理想幻滅的革命者必然會向現實投降，一個沒有理想的個人必然會以升官發財為唯一目的而腐化起來。

做領袖的人更應該時時以理想鞭策自己，因為只有以理想領導羣衆才能使羣衆心悅誠服，若是只知道以利祿牢籠驅使人，則豪傑之士決不肯心服，所能驅使者不過是一般庸衆，而且這些庸衆既為利祿而來，則一到緩急必難倚恃。古今來偉大的領袖，上焉者以理想鞭策自身，領導羣衆，其次也必以理想號召人，而以感情意氣輔之，決無專恃權謀利祿者。以曹操之奸雄也必須仗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尊王理想以為號召，而又能使部下激於意氣甘為效死，始能所向有功，若是專恃利祿牢籠人才，又加之疑忌，則其結果不過王世充之流而已。

▲我們應該認識目前的世界是一個新戰國的時代，決非如一般國際騙子們所鼓吹的什麼永久的和平之類。我們應該正確認識生物界的大法永遠是鬥爭不已，國與國的關係也永遠是鬥爭不已，一切和平合作都不過是弱者的幻想。中國今日固正在遭逢着歷史上

空前未有的國難，但即使這次國難倖解除以後，也依然還有無數未來的國際鬥爭在等候着，決無苟安的和平可言。世界的演進正依照着生物演進的大法，強凌弱，衆暴寡，小國終將消滅，只有大國才能存在。因爲小國縱然已進化到國族意識的階段，但因爲數量上的弱勢，如一旦被滅，不能即刻復興，終久難免被征服的國家同化。中國幸而是一個大國，所以在未來國際鬥爭場上，比較佔優勢，但優勢是不可終靠的，因爲在小國滅亡淨盡之後，接着便是大國與大國間的競爭，其慘酷更將十百倍於目前。中華民族若欲終免於失敗，必須以最大的努力與決心迎頭趕上去，加速創造一個堅固生動的新中國。

▲唐朝是我國歷史上政治、軍事、外交的黃金時代，也是宗教和藝術的黃金時代。

爲什麼到了唐朝會突現出這樣一個時代？這是全國各大民族文化結晶的結果。中國境內的五大民族——漢、滿、蒙、回、藏，在經過十個世紀以上的接觸交換的結果，到唐帝國出現的前一刹那而混合了，而彼此融化了；不但是文化上的接枝，並且也是民族血統上的合族。民族混血和文化接枝的結果，在東亞這片大陸上突現了一個前無古人的新集體生命。這個龐大的新中華民族，獨立地站在從蔥嶺到太平洋中間的這一塊茫茫大陸上，向四方放射出無比的光輝，沾溉了四方無數的後進民族，我們眼前的敵人日本就是其中最負恩深重的一個。

作爲中華民族主體的漢民族，從秦始皇起，開始完成了政治的和文化的統一，兩漢四百年中繼承這個民族凝成的形態，把她更團固了，更穩定了。到了東漢中年，這個民族已經有了五千萬以上的人口，當時全世界任何民族（包含羅馬帝國在內）所未會達到的最高水準。在孔子思想的統一教化之下，漢民族養成了崇孝弟，重農業，尚德教，愛和平的平易近人的美德。崇孝弟，故人口綿衍，不忘祖先；重農業，故社會經濟建設在極堅固的基礎上，不易動搖；尚德教，故能以文化團結自己民族，感化別的民族；愛和平，故和四圍的民族容易相處，促成相互了解，而國力也不至於浪費。這四種生活的態度，若是在個人身上，這個人在社會中是一個容易成功的人；在一個民族身上，這個民族就變成了世界上最實際最平易最容易站得住腳的民族了，這就是漢朝對我們的貢獻。

但是，這樣的生活態度也不是絲毫沒有缺陷的，因爲過於愛好和平，所以不免養成文弱的氣質，不容易和外來武健民族鬥爭；因爲過於務實際，所以文化藝術不甚發達，人民缺乏崇高的理想和浪漫的心情；再加上漢末以來政治的腐敗，內戰的連續，把人口大大地減少，經濟力量完全破產，東北、西北的異民族乘機侵入，就造成了五胡亂華南北朝對立的分裂時代。就漢民族講，這四百多年中是一個比較黑暗的時代，但是就全體中華民族講，這卻是一個最有意義的時代。

陰山山脈把中國本部和內外蒙古，成兩個人物風土絕對不同的環境，在山南，氣候是暖的，雨量是足的，河流是縱橫的，在這上面孕育了漢民族的農業文明；在山北，從東南海上吹來的暖風被山擋住了，只有西伯利亞的寒流天天挾着沙礫吹將過來，把土地吹得變成了一片沙原，只有最耐得乾耐得冷的野草才能夠生存，在這一塊大陸上，不能產生農作物，因之也不能夠產生一個愛和平勤耕稼的農業民族。居住在這一塊草原上的人，只有靠着騎馬射獵和牧畜牛羊爲生，因之就產生了一些武健流動的游牧民族，他們天天望着山南的錦繡平原垂涎作夢，有一天他們能夠也躺在那溫暖豐沃的平原上受不盡薰風的吹拂，他們的夢便滿足了。這種渴夢的強烈的誘惑，便構成了四千年北方民族向長城以南牧馬的不斷的鬥爭，秦始皇爲這個會築了長城，但是，天然的山脈還擋不住這一股來勢，人造的長城又能夠擋幾天呢？當漢朝初建國的時候，居住在這一塊草原上的就是有名的匈奴民族，他們和漢人鬥爭了一百多年，一直到了漢朝最英武的君主武帝出來，才覺悟了制馭北方游牧民族的最好辦法，不是消極的防禦，而是積極的進攻。從漢武帝到漢宣帝，經過了八十多年的奮鬥，把匈奴民族打成了一個漢家的附庸，從此以後，胡漢對立的形勢是消滅了，匈奴的單于娶了漢家的女兒，生下了孩子便是漢家的外孫，匈奴的王子到漢朝的京師來做侍子，學習了漢家的文化，到了東漢末年，索性把部

族也搬到陰山以南來了，在山西西南部落下了腳。五胡之亂，首舉叛旗的是匈奴的左部帥劉淵，但他姓的卻是劉，國號卻是漢，自許的卻是武超絳灌，文過隨陸，這個匈奴的領袖已經漢化了，他的部族不久也就完全漢化了。五胡亂華之禍，受害最重的雖說是漢人，然而卻替漢民族接受進來一個武健壯驕的匈奴民族的血統。

東北的通古斯民族，在魏晉南北朝之際最出風頭的是鮮卑人，漢化也最深。前燕的慕容恪、慕容垂兄弟，完全是一個漢族名臣名將的化身。拓跋魏起自代北，受的漢化較淺，但入主華北不過一百年，就出了一個愛慕華化的孝文帝，他把國都從平城（山西大同）搬到了洛陽，把自己的姓拓跋氏改成元氏，手下的大臣都隨着改了許多漢姓，獎勵和漢人通婚，語言文字都竭力學習漢人，從此以後，一個龐大的東北民族和漢人完全同化了，所未同化盡的，只賸下些留在塞外的本家，直到一千年後，趁着遼金清三次的南侵，才徹底和漢人打成一片。

西北的民族，五胡亂華時代到中國來的更多，大股的有羯人、氐人、羌人，他們在中國本部所建的國家如後趙、前秦、後秦、成漢等，也都是完全漢化的。譬如後趙的石勒用的謀主便是漢人張賓，他平生的自比也是漢高帝和光武。前秦主苻堅更是個比北魏孝文帝更早愛慕華化的人，他的用人不分種族，一視同仁，更特別尊崇孔子的禮教。如

果不是涇水之戰把符堅的統一之夢打破，外來民族的華化還要更早一百年。

西北各民族的入侵，不但在民族的混血上增加了幾股生力軍，並且在文化上開拓了幾多的新天地。西元四五世紀時東亞各民族的接觸，一方面是外來民族學習了中國的文化，接受了中國的血統，在意識上和形質上完全變成了中國人；一方面也是中國民族從外圍（特別是西方）吸收進來許多新的文化質素，學習了許多前此未有的新學問、新智識、新技藝、新的人生觀、新的宗教、新的生活態度——乾脆說，從此以後，中國民族整個換了一個新人。

原來波斯、希臘、印度這三種古文化在亞洲西部南部開了花結了果的時候，正當我們中國秦漢的盛世；中國民族正在有氣魄，有能力，有興致，可以接受外來的高度文化的時候。從漢武帝派遣張騫通使西域起，打開了西方的門戶，中國人開始發現橫互在西方大陸上的，有幾多光輝燦爛的文化體系。政治家和軍事家向西域開拓他們的事業，商人們向西域尋求財富，熱誠的宗教家跋涉萬里到西域去禮拜他們的聖土，這些人回國的時候帶回了各種各樣的西域文化，從最物質的苜蓿、葡萄，到最精神的佛教哲學。五胡亂華在文化交流之外又加上了民族移徙的新動力，這些外來的游牧民族，他們大都是在西域飽沃過文化的洗禮，他們雖然蹂躪過中國的土地，殘殺過中國的人民，卻也贖罪似

地替中國帶來了無數珍貴的文化禮品。兩晉六朝時代，民族上的大混血和文化上的大交流，替中國這片大陸開拓出一個光華發越的新文明。

唐朝大帝國便是在這民族混血和文化交流的兩大堅實基礎上湧現出來的。唐朝的帝系，有人說是出於胡人，此說尙待考證，但是從母系方面說，則含有胡人的血統無疑。唐朝最偉大的君主太宗，他母親竇氏的外祖母便是北周宇文氏的公主，而宇文氏是鮮卑人，竇氏一族據說是漢朝竇融之後，但東漢末年因竇武之禍已逃入匈奴，改氏爲紇豆陵氏，所以最低限度說也是受過匈奴同化的。因此，唐朝的帝系正可以說是漢蒙滿三大民族混血的結晶，如果承認李氏出於突厥的新說，則還可以說唐朝帝系中也含有回族的血統。中國境內四大民族——漢蒙滿回——的混血，產生了一個偉大空前的唐帝國，這是第一次中華國族的帝國，而不是單純漢民族的帝國。在這個帝國之下，一視同仁地統治了若干不同的民族，起用了若干不同民族的人才，從名將的契苾何力、黑齒常之、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李光弼，到詩人的李白、元稹，表現出這個偉大朝代有無比的包容性。

▲十餘年前，文化界會有所謂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參戰的雙方立論雖然不同，但其關於社會發展階段的區分都立足於馬克思主義之上則同。二十年來中國思想界不談社會

史問題則已，一談及這個問題似乎便不能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窠臼，以為只有馬克思關於社會發展階段的分類才是惟一正確而有權威的分類法，因此大家便只有在馬克思旗幟底下兜圈子。例如從商朝的後半期一直到西周末期，中國的社會是一個封建社會。春秋時代，即是這個封建時代的崩潰時期，至戰國時代則這個封建時代已經終了，而成爲此後新時代的造形期。這個繼封建時代而起的新時代，究竟應稱之爲什麼時代？這就異說甚多了。照馬克思主義正統的解釋，繼封建社會而起的應爲資本主義社會，但戰國以後的中國社會，顯然不是資本主義社會，雖馬克思本人也明白此點，因此他創爲亞細亞生產方式之說，以爲亞細亞各民族的社會發展是異乎西歐社會發展的過程的，是一個例外。這樣的說法無異於自己承認自己的理論可以有例外，而這例外的範圍中所包含的民族又是很廣泛的，遠過於西歐數倍。然則我們又何嘗不可以說，亞細亞各民族的社會發展過程乃是正常的過程，而西歐的社會才是個例外呢？如果照這樣說，則根據馬克思派的看法，亞細亞各民族的社會形態是停滯不進的，豈非停滯不進才是正常的社會形態，而由封建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反成爲不正常的例外了嗎？依我們看來，所謂亞細亞式的社會根本就不成一個名詞，因爲亞細亞全洲中包含有若干情形不同的地域和民族，單以經濟生活而論，有西伯利亞的寒帶草原和漁獵生活，有中央亞洲的亞寒帶草原和游牧生

活，有西南亞洲的沙漠和游牧生活，有印度半島的熱帶平原和農業生活，有中國大陸的溫帶平原和農業生活，依照經濟的情形，全亞洲至少可以分作這五大不同的區域，各自過着適應本區地形的社會生活，怎能够以亞細亞式的社會一名詞籠統代表，而目爲永遠停滯，毫無進步呢？馬克思對於亞細亞社會的例外認識，並非創自他本人，其錯誤實沿自黑格爾，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就把東方式的社會發展列爲例外的。百年以前，歐人對於亞洲各民族的认识猶未充分，所可資根據的材料又比較少些，其觀察錯誤自不必苛責。其實馬氏不但對於亞細亞的社會觀察錯誤，即對於西歐社會的觀察亦未見精確。他所主張的封建社會之後即緊接着資本主義的社會，此例僅能適用於英國，在歐洲大陸便不盡然。以法國爲例，法國的封建勢力自十五世紀以後便爲中央集權的國王勢力所打倒了，從路易十一以後，法國國王逐漸擴張他們自身的權力，以與封建貴族鬥爭，削減貴族的鑄幣、擁兵及徵稅之權，中央政府的司法權力也逐漸侵入貴族封土，這種趨勢到路易十四而登峯造極。所以法國在大革命以前，封建社會早已結束，而又明明不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篤信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這一階段的法國社會無以名之，便只得因爲她之尙未資本主義化而仍稱之爲封建社會，這猶如對於秦漢以後的中國社會仍作爲是封建社會一樣，實在是不合理的稱謂；因爲這無異於說路易十四以前及以後的法國，秦以前及以

後的中國，並沒有什麼嚴重的區別，這豈非抹殺歷史的事實？在我們看來，講社會史的人很可以不必這樣「削足適履」，寧可歪曲歷史的事實而不敢修改馬克思的理論，我們只要承認馬克思的分期法並不正確，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在封建社會之後，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之前，還應該有一個「專制社會」的時期，所有一切困難便迎刃而解了。

▲高度發展的文化對於一個民族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嗎？我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偏於否定方面的。我以為文化在發展的某一階段上對於民族是有利的，但爛熟的文化，發展到了極端，對於民族會害多利少，因此一個文化悠久的民族不應以其文化自豪，而應當警覺文化對於民族所帶來的毒素，趁早學習野蠻人，用野蠻的血清來澄清文化的毒素。關於這個見解，我在十年以前已於蠻人之出現一篇短文中略略提到。

自古以來，就有咒詛文化，主張復返自然的論調，中國的道家，西方的盧騷是最有名的代表。我的主張卻和這些意見恰恰相反。道家者流以為原始的人類是一個無私寡欲淡泊不爭的社會，有了文化以後才有爭端，因此他們咒詛文化，而渴想恢復到遠古時恬淡無為的寧靜世界。這種看法與現代人類學、社會學上所探索到的古代社會實況完全相反。事實上，這僅是一部分「文化人」的空想，這種空想之所以產生，一部分是由於當時的社會已因文化的毒質使有思想的人感覺到窒息的難受，而不得已發出自由的呼聲；

另一部分則由於這些「文化人」受文化的麻醉過深，他們雖不滿於現狀，而無力為積極的掙扎，反向更麻醉的理想境地去追求懷想。這正如一個鴉片煙癮過足了的人，渴望睡眠一樣，是一種中毒過深的表現。

事實上，和平、寡欲、恬淡、不爭，都是人類文化所陶鎔出來的理想，原始的蠻人是懂這些的。一些「文化人」總是主張在生命的世界之上還應當有一個理性的、價值的世界，這世界是屬於文化的，而非屬於自然的，只有高尚的人類才會認識這個世界，而社會進化的目的也就在於脫離野蠻的自然生活，實現這樣一個崇高理想的世界。但文化之所以可貴，乃因為它是為人類的需要而產生的，它在適當時可以幫助人類的生存發展，可是到了它的發展和人類的需要脫節時，祇能為人類而拋棄文化，不能為文化而拋棄人類。如果把文化世界從生命的世界中劃分出來，使它另自成一單位，並且認為應位置於生命的世界之上，則其結果必有為文化而犧牲人類之一日，如印度宗教家的灰身滅度之類，這樣的文化是自殺的文化，因為它已竟超過了人類所需要的限度而變為一種毒害生命的質素了。

▲所謂「學術」至少應該有兩種意義，一種意義是學術即知識，研究學術是為求得真知灼見，其目的在「真」；另一種意義則學術乃是做人的工具，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做

人，不是爲學術而研究學術，乃是爲人生而才來研究學術，其目的在「善」。這兩種對於學術的不同的看法，代表兩種知識觀，兩種人生觀，兩種文化型式；換言之亦即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之大分水嶺。

▲西洋文化自來就是一個主知的文化，希臘最初的哲學家其所致力之處，乃在解答宇宙的奧妙，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所以說哲學即是「愛智之學」。解答而無結果，於是懷疑派出來說世間本無真理，「人」才是一萬物的尺度」。蘇格拉底不滿意於這種懷疑詭辯的態度，想替當時的社會樹立人生倫理的規範，他的說法是：知行原是合一的，凡真能知者必能行，他依照當時希臘哲人的一般途徑，用知識的推論來證明倫理道德的正確性，從求真以達到求善的目的，這種態度本來是很正當的。但是其後繼者不能擺脫希臘思想的固有圈套，依然在知識的問題上去兜圈子，忘記了蘇氏原意本以求人生最高之善爲學術的根本。柏拉圖以「理型」爲知的真根源，與此理型相符合者即爲真知，「善」的理型也不過是衆多理型中的一個，雖然它是最後最上的一個。照他這樣說法，善不是一種「行」的形式，而依舊是一種「知」的形式，把行爲歸納於智識系統之內，這才像一個希臘人。他的弟子亞理士多德看重具體的事實過於抽象的理型，把精力專用於具體事實的研究上，這就建設了後來科學的基礎。柏亞二氏自然並沒有完全拋棄師說，他們

對於人生道德問題也相當注意，所以共和國的理想發揮於柏氏，而倫理學的輪廓造端於亞氏，但無論怎樣，他們兩個人依然和一般希臘人一樣，把知識的問題看得忒重，而把人生的問題當作副產物。後來西洋的唯心派哲學走的是柏拉圖路線，唯物派、經驗派和一切科學走的是亞理士多德路線，兩種路線雖然不同，並且似乎相反，但其以知識即學術，求真理即爲治學之目的則一。

▲「倫理」一辭在中國古書上始見於荀子臣道篇「倫類以爲理」一語，故一說到倫理便含有人與人的關係之意，倫理即是人與人相互間關係之規範，亦即是社會行爲的規範。社會是由人集合而成，集許多利害、興趣、思想不同的人於一團，如何能防止他們的衝突牴觸，這便需要有一種共信的倫理標準以範圍之。我們中國的傳統倫理思想具見於儒家學說之中，儒家思想可以說完全以規定人與人相互關係的行爲規範爲中心，如倫常、禮教、仁義諸說，都不外此義，而其系統最完整的莫如大學一篇。大學上特別提出「絜矩之道」四字，所謂「絜矩之道」，便是指人與人間的相互對待關係，也就是倫理規範中的主要問題。人羣結合的主要關係，不外乎家族、國家、天下幾層組織，而大學所講的便是這幾層組織間的相互關係，所以大學一篇是我們先民講倫理規範最有系統的書。二千多年來的中國民族，便是靠這種共同信守的倫理標準而能够綿延到今日。

▲對於人類歷史文化的發展，採取一種有機論的看法，並不是最近才有的，中國古人已常以「初」、「盛」、「中」、「晚」四期來說明政治上以及文學上的發展過程，印度的佛教徒也常用「生」、「住」、「異」、「滅」四階段來說明一種「法輪」的流轉命運。這種觀點，既非進化論，也非退化論，比較地近於循環論。但純粹的循環論是機械的，其思想由於古人觀察天體運行的結果比擬而得，如邵康節皇極經世書中「元」、「會」、「運」、「世」之說，即是一種完全模擬天體運行的機械的循環論；古代陰陽家的「終始五德」之說，亦屬此類。有機論的看法則與此稍有不同，有機論的思想不是從天體運行現象上比擬而得，乃是從生命現象上比擬而得的，其根源比一切思想更早。因為在原人時代，已經流行着一種「萬有有生論」的信仰，以為一切事物也都和人類一樣，有生命的徵象，可以生命的法則解釋之。這種見解，從遠古起，一直到現在，在人類思想上佔着很重要的位置。

歷史文化的有機論與進化論有相似之處，因為有機現象的發展可視為一種進化，但一般進化論多含有被動的、機械的意味，而有機論則承認生命界有自發的力量，即進化的路綫可由自己抉擇，不是被動的適應環境，而可以主動的創造環境，因此其進化並非機械的。有機論又近於展開論，因為它也承認歷史現象是發展的，但並不承認後來一切

展開的現象自始即包含於原始的種子之中，這是與展開論所不同之點。有機論又頗近於循環論，如中國古人所說的「四時之序，成功者退」二語，可解釋為循環論，也可解釋為有機論。本來，生命的生老病死現象，與天時的春夏秋冬現象，在表面上頗多類似之點，故由天時之循環以比擬人事之生滅，在古人視之實極自然，而死後輪迴之說也即由天時現象啓悟而來。但事實上物理的機械的循環現象，與生命的有機的發展現象，兩者之間實存在有鉅大的異點，生命的現象實不能認為屬於一純粹的機械的循環現象。

有機論者把歷史文化的發展看作是一件有機的過程，自有其種種的理由。最粗淺地說，歷史文化是由人類所構成，人類既為有機體之一種，故由其思想行動以交互構成的歷史文化現象，自應以有機論的原理解釋之。但有機論的精義還不在此，有機論者不僅把歷史文化現象看作是與個體的心理或生理狀態有關，並且更進一步，承認歷史文化現象本身就有超個體生命而存在的實在性，就是一個獨立的生命體。

▲神性與獸性之間有無本質上的連繫呢？在純肉的獸性根柢中怎麼會忽然躍出神性的理想之光來？我在人生的悲劇與國際的悲劇一文中曾經指出，產生人生矛盾衝突的根本原因是生命演化的自然結果，生命演化的基本趨勢是由無組織到有組織，由簡單組織到複雜組織。從單細胞生命到複細胞個體生命，是一種階段上的進化；從複細胞個體生

命到復個體集體生命，是又一階段的進化。在每一階段中生命產生了自我的意欲，自我意欲的基本要求是發展，無限制的發展，但客觀環境不容許每一個生命都作無限制的發展，因此生命的意欲不能暢遂，苦痛遂起。人類在今日是一個複細胞個體的生命，但一方面還殘留有單細胞生命活動的潛勢，一面卻又已開展了一個生命向上的新階段，即社會集體我的階段。細胞我，個體我，社會我，三者並存於一身，大我與小我，小我與更小的我，各有生命的欲求，也各各限制着另一種生命的欲求，再加以自然環境的限制，當然矛盾衝突是絕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們就可以了解：所謂神性並不是別的，就是爲大我的生命欲求而產生的心理條件；所謂獸性也並不是別的，就是小我的生命欲求的滿足。大我小我，社會集團的大利大欲，個人或細胞的小利小欲，根柢原是相同，不過是一種生命向上演化的幾個階段。「自環爲私，背私爲公，」公私原是一體。所謂私，不過是只顧小我的意欲要求；所謂公，也就是犧牲小我而求有利於大我的生命活動。爲求大我生命的完成，不得不要求小我作種種犧牲，互助，愛人，服務的所謂美德，這就是我們現代的理想主義；而同時一方面小我還在做種種有利於自己，而不利於公的生命的活動，這便造成了現實主義。大我和小我的衝突，造成了靈肉交爭的事實，由心理的矛盾演成了人生的悲劇。

理想的生活雖是可貴，然而人不能一躍而消滅個體生命的欲求而完全變為社會集體的一分子，因此理想主義必須顧及現實，但純現實者執着現在而忽略將來，執着小我生命而阻礙了生命向上發展之機，更不值得。

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調和，神性與獸性的協調，把握着當前的需要，不落後，也不過於超前，人生之道，如是如是！

▲禮本是封建社會秩序的總稱，中國社會到周朝才完成了封建的形態，所以周人也最重禮教。孔子的時代禮教已經陵遲了，一般賢士大夫除了少數實際政治家如鄭子產之外，多數總還夢想恢復這種已墜的秩序，孔子也是其中之一，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便說：「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魯之季氏，八佾舞於庭，孔子便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顏淵問仁，孔子便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禮教之興是文化大啓以後的事，是比原始的自然狀態為進步的，所以子夏聽了「繪事後素」之論以後，聯想道：「禮後乎？」孔子便說：「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禮不是一成不變的，更應該隨時改革，但必有所因，所以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顏淵問為邦，孔子便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可

見禮實取各代之長，不必膠膠於一代之制，這是孔子對於禮治論的特別貢獻，後世所以稱爲「聖之時者」。孔子尙禮的主張，到再傳以後，始發揮淨盡，成爲儒家最中心的思想。

▲周朝封建社會的建立，原來是從宗法的關係推演出而，宗法關係是封建組織的核心，因此君主和臣民的關係也就是家人父子兄弟的關係。明白了這個，便了解大學上爲什麼說：「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的道理了。就天下而言，天子是宗子，是天下之大宗，所以其他的人都應該尊事他；就一家而言，也有宗子和支子的區別。宗子有承繼祖先的優先權，所以祭祀祖先是他的主要職務。這樣的社會關係是把天下和家族打成一片，其根本在孝弟兩個觀念。因爲要子應孝父，所以才有祭祖之禮，喪葬之禮，及祀天配祖之禮；因爲要弟應事兄，所以支子才推尊宗子，諸侯才服事天子。孔子深知此義，因此對於孝弟之義竭力提倡。他的弟子有若也說：「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周朝的封建社會，最重禘禮，禘是祭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乃追溯到家族的本源，孔子是最明白這個道理的。

▲過去歷史的演化可分三個階段：一、傳奇時代，其特徵是主情的，求美的，文藝

的；二、教訓時代，其特徵是主意的，求善的，倫理的；三、考證時代，其特徵是主知的，求真的，科學的。一部完整的歷史，必須用科學的方法去搜集史料，用倫理的標準去選擇史實，用哲學的想像力去構成系統，用藝術的手腕去撰成歷史。偉大的歷史必須能喚起偉大的共鳴，因此它必然是社會心靈的產物。我們學歷史的人，應以歷史為一有機的生命而研究之，以個人及集團人格滲入歷史而了解之，須知有生命的歷史本身即為一不朽的生命，同時有生命的歷史可以促進生命的向上。

▲一切科學能成爲一種獨立的科學，因爲它們都各有特性，各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歷史的特性尤其顯著，即以其時間的特性來說，其內容包含以下幾個要點：一、隔代：其他科學所研究的對象多數是屬於空間性的，研究者可以對之作直接的觀察與實驗，但歷史則不然。歷史學所研究的對象（原始事實）和研究者中間隔着一個時間的牆壁，我們現在所研究的乃是通過時間長壁後再現於我們眼前的事實的「影象」，而並非事實本身，其理甚明。二、不再現：原始事實已屬過去，無論如何不能再現，故不能採實驗的方法，像化學家化驗物品一樣。三、傳遞：原始事實雖不能再現，但是可以經過各種媒介，傳遞於後代，但當展轉傳遞之時，其所傳遞之事實，已非原始的事實，而化爲「史實」。四、演變：傳遞的過程須經過若干次，每傳遞一次，原始的形狀即改變一次，故

「史實」是演變不已的。五、累積：史實在傳遞和演變時，即是通過時間之流，因此每一個時代對於史實常加入許多新影響，通過的時間越長，新增的性質也越多，故史實的本性是累積的，但看一個偉人的言行，越往後材料越豐富，就可證明。六、淘汰：時間對於史實，不但有累積的作用，也有淘汰的作用，有許多原始事實被時間所淘汰了，考古學和輯佚學的工作就是爲想彌補這個缺憾而起的。七、綿延：史實在時間中發展時，前後際是不能隔斷的，所以是一片綿延的狀態。綿延的狀態一旦被截斷，史實便受了淘汰，歸於湮沒，因之也就失去了歷史學研究對象的價值。八、重構：原始事實雖不能再現，但可以經過時間的作用，到現在重構起來，事實上我們所研究的歷史，都是重構的歷史，原始真相是無論如何不能確知的。

▲我們平常用慣了「合理」兩個字，而從不加以深究，究竟所謂合理者是合些什麼理？理是從那裏來的？理是誰定的？理不會變嗎？理是人人相同的嗎？

中國的理學家，歐洲大陸的理性派哲學家，以爲這些問題是不成問題的，因爲理就是天理，所謂天理不過是指天然自具於人類心中的共同條理而已。中國的古人說：「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既然如此，所以理是本來自具於人人心中而非由外鑠的，你能

懷疑嗎？你能反對說人心中沒有本來自具的理性嗎？這一派學說說到極端，便成了陸王的良知之說。

但是我們可以反問他，如果說人人心中都有理性，而這理性又是普遍相同的，爲什麼世界上偏有許多人做出「非理」或「悖理」的事來？我們不能否認世界上有惡人，亦不能否認惡人心中有惡念，因此至少我們必須承認人類在「理性」之外還有「反理性」存在，宋儒也不能否認此說，所以他們創出「人欲」及「氣質之性」等說，以解釋這種不能隱諱的現象。照宋儒一般的解釋，似乎天理是本來圓融的，不過爲氣質之偏所蔽，以致舍理徇欲，所以要用「正心，誠意，格物，致知」的工夫去去欲返理。

這種理欲二元論的說法，仔細推究起來也是不能自圓其說的。什麼叫做理？什麼叫做欲？且舉個事例爲證。從前王陽明先生有人問他「何謂良知？」他老先生說：「你把褲子脫下來，」這人羞赧不肯，陽明先生說：「你要問良知，這就是你的良知。」照此說來，不肯當場脫褲子的良知，似乎是人人心中所本具的了。然而如果請他老先生到熱帶地方的土番部落中走一趟，到巴黎紐約的裸體跳舞場中去領略一番，否則就到上海的澡堂裏去洗一次池浴也可以，他老先生就可以覺悟不肯當場脫褲子的心理並不是什麼良知，祇不過是一些相沿的習慣，在某一種地方脫褲子便覺羞恥，在另外一種地方便不覺

得羞恥，這不過是習慣而已。假如世界上的人都是向來不穿褲子的，恐怕他的良知反以穿褲子爲可恥了。

有人說，陽明先生的意思並非指不肯脫褲子的行爲，而是指那不肯脫褲子的羞惡之心，這羞惡之心便是良知之一端，羞惡之心是人人所同具的，這便是理性。無論他以脫褲子爲恥，或以穿褲子爲恥，總之他是有恥心的，這恥心便是理性。

照這樣的說法，所謂良知的「良」字就應該去掉，因爲單是「羞惡之心」本身並無善惡可言，我們不能說人有羞惡之心便是有了善念，盜賊爲怕示弱於同儕而殺人，是羞惡之心；浪子和人家嘔氣而傾家狂賭，也是羞惡之心；野心國家爲怕傷及國家的光榮而殺人盈野，也是羞惡之心；妓女非穿綾羅綢緞不肯上街，也是羞惡之心；漢奸賣國賊非做官不能過癮，也是羞惡之心。這些人以不能殺人、散財、賣國爲羞，羞其所羞而非吾之所謂羞。足見羞惡之心本身並不含有道德的意義，充其量不過表明一種心理上的狀態而已。

▲在哲學上，關於演繹、開展、發展、生長這四個概念的同點和異點，必須加以注意。發展的觀念在康德以前的哲學界中就早已孕育了。大陸派的理性哲學中，笛卡爾與斯賓諾莎對於實體的觀念是幾何型的，因此原理自身是本來具足的，祇用得着演繹的觀

念，而用不着發展的觀念。但到萊布尼茲手裏，就已把幾何型的實體轉變爲物理型的實體。照萊布尼茲的想法，實體是能夠活動的存在者，就是力，不活動者不存在。實體就是能夠自行活動的多元個體，萊氏叫它做單子。單子是非延長的，不能分割的；但單子又是獨立的活動力，絲毫不受外面的影響，自發地把自己的狀態展開。照這樣看來，萊氏的單子一方面雖然是本來具足而不受外界影響的最高原因，然而一方面開展也是單子的本來具足的性能之一，所以萊氏的單子不是一種先成不變的理念，而是一種具有開展性的活動。萊氏這樣把活動和開展兩個觀念，引入到實體的性質裏去，確是近代思想的先河。萊氏的單子論和十九世紀末年科學界共信的物質原子論可以比附，所不同者，祇在萊氏的單子是一種不能延長的非物質性的單位而已。萊氏又把單子歸元到一種活動的力，這和二十世紀初電子論發現以後的科學理論更相接近了。英國的經驗派哲學家拋棄超經驗以外的世界實體的研究，而專致力於人類自身認識能力的分析，最極端的分析學說，如休謨簡直不承認除了片段的感覺以外還有他物，這樣的思想就是後來馬赫的感覺一元論的先導。這種對於心理過程的機械的分析是反發展觀念的。但經他們的努力把本體論建設到心理的基礎上，而心理現象實是生物現象亦即有機現象之一種，因此他們反面的功績是摧殘了浮乎經驗以外的超絕的實體的觀念，而引入到經驗之流的心理領域裏

去，結果比理性派更能助長對於有機觀念的接受。嚴格地說來，在上述的四個概念中，只有生長的概念才有生物的意型，其他三個是非生物的。演繹如同幾何的證題，只是最高原理的複寫，並無變動，更無創新，所以是幾何型的。開展如同一副捲畫的展放，是從固有的形式展開，有了變動，而無創新，是機械型的。發展如同河流的泛濫，有了變動，也有創新，而非主動，我們可以叫它做無機型。生長如同動植物的長成，只有這種看法才是有機型。前面三種概念雖非有機型，而可認為是人類進到有機概念以前的一種預備階段。從笛卡爾到謝林，至多不過了解到開展的概念，尚不能稱為發展，到黑格爾才有了半發展的概念，至於生長的概念祇是最近代思想的產物。

▲中國古代學術思想中影響民族精神最大，可以稱為民族哲學者，約有兩派：一派是八卦說，出於周易；一派是五行說，出於尚書洪範。五行之說，盛於漢代，但漢以後影響漸微，且其起源亦似較晚。洪範的著作時代頗為可疑，有人認為係戰國中年陰陽家出現以後的作品，大約不出西元三、四世紀之間，較之周易為晚近。易經的十翼，雖出現也似較晚，但經文至少當係西周初年的作品，而卦象之圖形出現當更早於此。且自漢以後，二千年來，直至今日，研易者代不乏人，影響遠及東西洋，即漢代雖以五行說為主，而於五行之上必冠以「陰陽」，仍不脫易的影響。故論其源遠流長，實不愧為民族

哲學之代表。且其思想與現代哲學有機論之思想暗合者甚多，可以證明我先民的思想之銳敏而正確。（易爲古代卜筮之書，古代卜筮方法或不止一種，故有「三易」之說，但連山歸藏二易，其書久佚，今所傳者爲偽書。且三易說乃用以配合天地人三統之說，其必係漢代天人相感說盛行以後之偽託無疑，故連山歸藏均無研究之價值。）

▲當一個人的生活常態發生了變動之際，就是他開始感覺到考慮問題的必要的時候。譬如我們每天照例睡在自己家屋的牀上，並不感覺到睡覺的問題，一旦出外旅行，生活有了變動，便發生了睡覺的問題。所以變動便可以促成哲學的覺醒。生活本來時時刻刻在變動中的，所以你的哲學本能也一定時時在覺醒之中，這就是古人所謂的「常惺惺」。不過變動小的，覺醒也小，自己並不完全意識到自己的覺醒；必須是有了大的變動，發生了大的問題，才有了重新考慮哲學態度的深刻的覺悟。所謂生活變動並不限於你自己一身，人並不是孤獨地站立在荒島之中，從橫的方面說，人是連繫於他的家庭，他的親族，他的鄉土，他的民族，他的國家，他的世界，以及整個的人類，整個的生物界，整個的物質宇宙和精神宇宙，亦即是整個的空間；從縱的方面說，人是連繫於過去，現在，未來整個的時間。任何人不能孤立，任何人不能從一切複雜的關係中單獨地抽出一個孤立的他自己來。像萊布尼茲所想像的那種孤立自足不能分割的「單元」，實

實際上是不能存在且無法想像其存在的。因此世界上任何變動都能影響到你自己，而離你越近的變動，影響你也越大；由集合而生的變動比一個個零碎的變動影響你也越大。

▲歷史哲學是一個比較陳舊的名詞，十九世紀前半期，德國的浪漫主義哲學家爲欲反抗自然科學的唯物潮流起見，乃大張歷史哲學之軍。自孔德創立社會學以後，百年來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長足的進步，使用社會科學的結論以解釋歷史者漸多，因之有社會學的歷史學派之名。關於此點，有三種不同的意見：傳統的史家，仍抱定歷史的任務祇在蒐亡補佚，記錄事實，根本反對任何理論的解釋，無論是哲學的或社會學的。德國派的玄學家，輕視社會科學研究的成績，一味閉門造車，想把歷史哲學中社會科學的影響屏除淨盡。一般社會學家，則以爲歷史學與社會學研究的目的既然相同，則有了社會學即不必再有歷史學或歷史哲學，甚或以爲哲學不過是不進化的科學，理應加以排斥。此三種觀念都未免錯誤。其實歷史哲學不能輕視理解，尤不能輕視社會科學所研究得的成績。不過歷史哲學的領域似乎也應該有和社會學及其他社會科學不同之處；譬如關於歷史的認識論問題，就非社會科學所能討論，因爲一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所討論的都不過是本科研究的對象的本身諸種現象，而對於吾人如何認識此種自然的或社會的現象之較根本的問題，則存而不論。單就這一點說，歷史哲學也有獨立成學的價值。

▲認識論是研究知識的發生及其可靠性的一種學問，在哲學的各部門裏，認識論比較後起，但是地位卻最重要。過去的哲學家一味向外面去研究知識的對象，研來研去，議論越弄越分歧，到康德出來，才根據英國經驗派哲學開創的路子，把問題的中心轉移，到知識工具的本身去。從此以後，哲學的中心問題，不是宇宙究竟是怎樣？而是我們怎樣去知道它？我們的知識工具是靠得住嗎？

每一派哲學都有他們對於認識問題的見解，我在過去一篇文章裏曾提到有機主義哲學對於認識問題所持的觀點是「主客雙融」，什麼叫做「主客雙融」呢？

一般哲學上常把世界分作兩種，一種是經驗的世界，一種是超經驗的世界，前者是我們認識能力以內的世界，後者是超出我們的認識能力以外的，但由邏輯上推定其可能存在。這種態度，不僅唯心論和唯理論爲然，即唯物論和唯實論也同樣有此等看法，因爲唯物論和唯實論雖不承認有超經驗的理念世界的存在，但是他們所認爲真實存在的原子、電子、量子之類，也不是人類的感覺器官所能直接經驗到的，也祇能靠邏輯的推理證明其爲存在而已。

但是邏輯的推論無論結果是心是物，總不能說是超經驗的，因爲經驗的意義不是單指我們的感覺，知覺和理性也同樣是屬於經驗的範圍。我們通常對於事物的認識靠感官

直接的經驗者很少，大部分依然是靠推理的作用。我們知道現在歐洲正在打仗，並不是我們身經目睹，乃是靠着間接的推理作用，同樣，我們相信在現相世界之外還有一個理念世界，以及我們說物質不是物質，是一大羣跳躍的電子所組成，也不過是靠着推理而已。如果推理也推不出的，那末根本我們就對它無所知，一切經驗中的用語都不能加於不可知者之身，因此說它存在和說它不可知都不對。有機論者以為我們不必假設再有這樣一個世界，我們祇能就經驗來談經驗，就現象來談現象。這個態度不但是有機論者的態度，而且是現代哲學共同的态度，即使是絕對唯理主義的黑格爾派，也已經拋棄了超越經驗去尋求本體的妄想，祇是想在經驗之中捉住一個實在，因此黑格爾派之所謂本體——理性——乃是一個辯證的發展，是一個動的過程，是與現實合一的，所以他說：「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有機論者對於認識問題的看法是這樣的：不論外部世界是否獨立存在於我們的經驗之外，但我們人類所能知道的世界，必然是經驗的，否則便不可思議。所謂經驗，包含一個複雜的過程，並不單指直接經驗而言。過去經驗派哲學家如休謨之類，科學家如馬赫之類，雖然可以把經驗分析到最後，分析成爲剎那間片段的感覺，但實際上這是犯了過分分析主義的錯誤。我們在實際的心理經驗上，並不能把剎那間的感覺和感覺以後的

種種綜合作用嚴格分開，這樣與其他心理作用嚴格分開的刹那感覺是不存在的，不過是理知上分析的結果。我們如果面對一個蘋果，我們並不是一刹那看見它的紅，又一刹那看見它的圓，而是一個整個的既圓又紅的東西。這蘋果，在呈現到我們經驗範圍以內，它必然同時佔有三個空間，一個是物理的，因為蘋果是一個物體，所以它佔有一個物理空間；同時它又是生理的，因為必須用眼和腦才能去看到它，認識它，所以它不能說是孤立存在於我們的認識作用以外，而必須佔有一個生理空間；同時它又是心理的，因為我們不是單純看到它，而是「意識地」看到它，它是一連串心理綜合作用的結果，所以它又必然佔有一個心理空間。過去哲學家最大的錯誤，是犯了分析病，要把這三個世界的分野劃得清清楚楚，以其中之一為先存的，其餘二者則是派生的，例如唯物論者以為世界上必然是先有一個物質的蘋果存在，然後才能投射到我們的感覺系統，由此構成心理上對於蘋果的知覺和印象。實際這是不對的，因為蘋果就是一個蘋果，必須是物理、生理、心理三者同時結構到一處，才會產生蘋果，三者分離，便不成其為蘋果。並且所謂物理、生理、心理三種空間的分野，不過是我們的一種便宜的講法，並非事實上真有此三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如果我們喜歡分，我們還可以說一個蘋果是同時佔有更多不同的世界；如同蘋果是一個名詞，所以它佔有一個語言文字的空間；它又是一個植物，所

以佔有生物的空間。依此類推，一個蘋果可以同時佔有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文藝的、官能的、生物的、理化的種種不同的空間，但這種種空間必須聯合在一點上才能成爲蘋果，這一點便是時間，所以必須是同時的，無所謂先在的和派生的之別，即是各種空間不同的線相切於時間的一點上，才能產生一個事物的相。但在這裏我們必須明白所謂種種的空間並非真正脫離事物而另自存在的，即並非先有空間才有事物，空間只有一個，所謂種種差別都是爲言說上的便宜而假設的。試以最簡單的心理、生理、物理三種不同的空間而論，都不是真正孤立存在的。唯物論者以爲心理作用雖然複雜，但畢竟不過是神經系統的一種作用，所以一切心理現象都可以還原到生理現象，生理現象又可還原到理化現象。照這樣似乎理化現象是一切的基本了，但是理化現象不但分析到最後不過是些不可捉摸的非物質的能力的活動，而且無論你怎樣去分析，總是用心去分析，無論我們是直接用眼去看見一個蘋果，或者用高深的數學去得一個組成蘋果的能量的波動系統的方程式，總之我們所接觸的祇是我們心理上的一些觀念和由觀念化成的語言文字符號，而並不是另外一個與身心無關的客觀實物，即使我們用牙去咀嚼它和用胃去消化它也是一樣。

▲唯心、唯物之爭，是西洋哲學的特徵，中國思想中就很少這種對立。昔者我曾有

句云：「左打唯物一拳，右踢唯心一脚，掃清理障現圓機，能立還須能破。本來活虎生龍，有甚東藏西躲，認清宇宙這些子，還個堂堂地我。」能站在高一層去看，自可綜合二者之長而提出一個新的觀點，這就是有機論的觀點。

▲從孔子以後，孔家的思想大昌，宗孔子之道者，世稱爲儒。儒家之名，似非起於孔子，而起於儒家大盛之後，且爲他派詆譏之名，並非嘉名。論語中孔子自名其學風曰「士」，或曰「士君子」，或曰「君子」，未嘗稱儒，僅有：「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二語，儒既有君子小人之分，可見並非一定是嘉名。按「儒」本與「濡」同義，從人，需聲，猶言懦弱需緩之人，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稱者也」。徐鍇釋之曰：「柔，弱也，又儒之言悞也。」荀子修身篇有云：「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鄭玄目錄云：「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云：「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可見儒本與「柔儒」、「濡緩」同義，所謂安人服人，濡先王之道，則爲鄭氏附會之義。周官大宰雖有「四曰儒，以道得民」之語，但周禮本爲僞書，不足爲據。俞樾云：「儒者其人之有伎術者也，古謂術士爲儒，凡有一術可稱，皆名之曰儒，故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別。」可見即據周禮亦不過方伎之士，侏儒之名，或由此而得。又「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二語，似與「南方之強，北方之強」相對，意即汝應爲君子之弱，

而無爲小人之弱，君子之弱，即「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之意，未必是指君子之儒者。子夏篤實有餘而開展不足，所以孔子以無爲小人之儒緩戒之。儒家之名，首見於墨子，墨家見孔家學者之寬衣博帶，空談無實，因詆之爲「儒」，即如後世譏諷「迂夫子」或「道學先生」之類。孟子去墨子未遠，儒名猶未確立，其全書稱儒者仍曰君子，僅有「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二語，以與楊墨兩派並舉，而自派無一定之名稱，故不得不沿用敵派所賦予之名。自此以後，儒家之名漸成專名，到了戰國末年，不但敵派稱之爲儒，即儒家大師如荀卿，亦自稱其本派爲儒者矣，但仍有「俗儒」、「雅儒」、「大儒」之分，亦未嘗以儒者必爲嘉稱也。

孔子初志在行道以挽回世亂，故奔走政治之時多，講學著書之日少。弟子之中亦自然分成兩派，早年的弟子如子路、子貢、冉有、宰我之流，多數熱心實際政治運動，不事學問，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言志一章，三子所言之志，皆屬於政治運動，子路說：「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可視其志之所在，故冉有子路皆爲季氏宰，子貢連駟結駟，所至與諸侯抗禮，論語稱：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可見諸子之從學者，其始志皆在從政，乃當時士之本分，當時尚無講學著書的風氣，故也沒有專門以治學爲志的人。論語之所謂學，多指學習從政，而非

指專門治學。孔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可見學以實用於政治爲貴，不徒以記誦爲功。樊遲請學稼，孔子便說：「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可見孔子之學係專爲造就治者階級而講，稼穡係平民之事，君子所羞爲。孔子早年所講之學，大抵如此。

但既欲造就一個理想的士以備擔當從政的義務，就不能不具備兩個條件：一個是有良好的品行，一個是有豐富的學識，所以孔子教學雖以從政爲目的，但對於這兩點的訓練也未嘗忽略。子張學干祿，孔子說：「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多聞、多見是博學的工夫，慎言、慎行是端品的工夫，干祿之道，就在於斯，所以說：「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可見做一個能够擔當政治責任的士，便需要一方面博學多聞，以增廣從政者的知識；一方面守身約禮，以樹立士君子的風範。孔子自身便實踐了這兩個條件，一方面「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敏以求之」，「多能鄙事」；一方面「溫良恭儉讓」，以躬行君子爲範。對於弟子也能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到了晚年，知道「道」已不能及身而行，更把全力集中到這兩點上，所以晚年的弟子，受了孔子這種感

化，對於從政的興趣已不甚熱，而把精力都用在「博文」、「約禮」這兩方面，形成了以後儒家的兩大派。

孔子所雅言的是「詩、書、執禮」，「詩不但是可以興、觀、羣、怨的文學，並且也是當時外交上必具的學識，「誦詩三百」可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書就是古代的歷史，也是政治的典範。執禮大約是指演習禮的儀節，也是當時士君子社會所必需的。孔子所以常說這些，因為這都是做一個擔當從政義務的士君子所必具的學識技能，但後來久而久之，弟子們對於這三種學科的本身起了研究的興趣，雖不必志在從政，也樂於研討了，這就是博文的一派。

孔門將這一派叫做文學。文學在漢以前是一個廣義的名詞，指一切學術而言，並非單指文藝。孔子重要弟子之中列於文學一科的，據論語說，有子游子夏二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謂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似乎都是晚一輩的弟子。論語中記子游與孔子的問答不多，其學術無從概見；禮運雖記孔子與子游問答之辭，似是後人擬作，恐不可信。陳氏謂此文「言大道爲公之世，不規規於禮，禮乃道德之衰，忠信之薄，大約出於老莊之見，非先聖格言。」石梁王氏謂：「以五帝之世爲大同，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小康，有老氏意，而註又引以實之，且謂禮爲忠信之薄，皆非儒者語，

所謂孔子曰，記者爲之辭也。」其言均不爲無見。孔子一生崇拜周公，志復周禮，豈有謂文武周公爲小康之理；且謂「大道之行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與儒家主張顯然牴牾，正孟子所詆爲「兼愛無父」者，可見此篇不但非子游所傳於孔氏之學，亦且非儒家本旨。」莊子天下篇說老子的學說「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禮運亦有一「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又有陰陽五行等語，可見其受道家及陰陽家之影響甚深，大約係漢初黃老盛行後，儒家受道家影響後援道入儒之作。太一爲齊之天神，楚辭九歌亦有東皇太一之歌，此文大約作於齊人，荀子禮論篇亦有「以歸太一」之語，故此文必作於荀子之後。近代之自命宗孔者，乃奉此文爲聖經，嚶嚶然不知其非，真溝猶瞽儒之類也。

論語載子游批評子夏的學風說：「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可見子夏既有門人小子之後，子游尙在世；又可見子游的學風不似子夏之拘謹，其所見必較大，而又不似子張之過於「堂堂」。子夏既有門人，子游與子夏年歲相當，雖會爲武城宰，從事政治，亦未必無門人小子，荀子十二子篇：「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遠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

之，世俗之溝猶齷儒嚙嚙然不知其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世，是則子思孟子之罪也。」按中庸非子思所作，子思的言論著作不見於後世，孟子七篇中並無五行之說，荀子所攻擊者似近誣。惟既謂「世俗之儒，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又云：「偷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可見當荀子之時，尙有傳子游之學者，而其學「聞見雜博」，與論語以文學稱子游者相近，「材劇志大」，又與子游批評子夏之言相近。禮記中月令等篇及周書洪範，談陰陽五行之說，似即爲戰國末年自命爲傳子游之學者所製作，子游當時並未倡五行之說，但其學風既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末流或難免有僻遠無類幽隱閉約之弊，然則漢代今文學家的荒誕不經之說，如公羊家張三世、通三統諸說，謂其出於子游一派的學風，亦不爲過當，即禮運大同小康之說，亦屬「材劇志大，僻遠無類」之類，惟此類作品，祇可以說是聞子游之風而起者，未必即經子游直接之傳授耳。

孔子弟子之中，惟子夏最老壽，史記稱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大約其暮年已及戰國初期。子夏與子游同列文學，則必留心於文獻之學，論語及史記均未載子夏曾經仕宦，或即終身以治學爲務，所造就當必較他子爲專深，大抵學術的成就與學派的光大，與年壽修短不無關係，小程子較大程子老壽，故伊川之派獨傳；朱子較張南軒、呂

東萊、陸子靜等老壽，故朱子一派獨光大；子夏享壽獨高，故其學流傳較廣。易傳於商瞿，而唐書藝文志有周易卜商傳二卷，或謂爲漢鄧子夏所作。毛詩自謂出於子夏，大傳載子夏論尚書有「七觀」之義，似伏生之學亦出於子夏。公羊穀梁二傳亦謂出於子夏之弟子，左氏傳爲三晉人作，或即出於吳起。子夏暮年居魏西河，則左傳之學亦或出於子夏。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筆削春秋，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可見孔子作春秋時，子夏或在側，雖不能贊辭，然於孔子作春秋之意義必略有所聞。禮有喪服記亦傳爲子夏之作。以上諸說，或均不免於漢儒附會。惟子夏既以文學見稱，又老壽，弟子流傳必較多，有力者當亦不少，其學風偏於章句之學亦屬當然。後漢書徐防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觀論語載子夏之語，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皆可見子夏學問宗旨，近於博文一派，惟牢守章句，過於拘謹，不如子游一派之閑肆。漢代古文家傳註之學，當出於此。

▲建國就是要建設一個民主的國家，但是怎樣才算是完成民主化的建設呢？一般人的心目中似乎多注重在上層民意機關的設立和憲法的制定問題，自戊戌政變以來，四十年中，一切民主運動也都不外爭取此項權利。事實上大家都忽略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就是下層行政機構的民主化問題。如果下層的政治社會沒有完成民主化，則縱使中央政治機構已經民主，也不過使一部分士紳有了參政的機會，而大多數民衆的苦痛仍然無法解除。

今日中國政治的最大癥結，不在上而在下，越往下層其黑暗越甚。地方政治比中央黑暗，縣政比省政黑暗，區長聯保主任等其黑暗的程度遠過一般人想像之上。如果對於這種下層民衆的苦痛無法解除，則縱使憲政完成，人民仍然得不到實惠，結果民主的基礎仍是建築在沙灘上。

這種情形如不改善，對於抗戰前途也非常不利。抗戰的主力在人民，要人民出錢出力，必須使人民激發愛國的意識，要人民愛國，必須這個國家值得人愛，即是國家的利益與個人的利益打成一片，愛國也就是愛自己。在現在的下層黑暗政治之下，人民所受的痛苦無從申訴，結果不但對於國家政府沒有好感，反有「時日曷喪，與汝偕亡」之反感。

養成這種心理的原因，既不能歸罪於老百姓的無知，也不能歸罪於中央及省地方當局的不愛國愛民，因為老百姓雖是無知，對於切身的利害還能夠認識清楚，對於善政惡政，善人惡人，也還能辨別。至於中央政府及各省地方當局也確有愛民的誠意和利民的

善政 無奈在下層官僚豪紳的勾結把持之下，一切善政到了民間就都變為惡政，一切良法到了民間就都變為惡法，上級政府的德意變成了人民的怨府。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實行無為政治，還可以稍減一下人民的苦痛，然而無奈在抗戰的嚴重關頭上，又不容許我們有實行無為政治的機會，因此下層行政機構如何民主化的問題，就不能不成為一個迫切需要的問題。

中國自秦漢以來，二千年中就是一個官僚政治的國家，這種黑暗情形，來源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每一朝的滅亡，其根本原因都由於此。明末的流寇是最顯著的例。歷朝救濟這種困苦的辦法，不外厲行清官政治，任用清廉的官吏，裁抑豪強，深察民隱，再輔以綜覈名實，信賞必罰的法治精神，粗粗可以獲得一時的小康。西漢宣帝時代，唐太宗時代，明末張居正當國時代，清世宗時代，都不過是如此。在專制政體之下，也只能做到如此。然而這種辦法並不是根本的辦法，這種辦法仍是一種人治，如果有了賢明的君主主持於上，循良的官吏奉公於下，也許可以解除人民一時的苦痛。然而一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一循吏豈能常有？上級政府的耳目又豈能盡周？一旦時勢改易，日久玩生，人民仍然重新陷入於水深火熱之中，無法獲得永久的保障。

歐洲政治，過去在封建貴族的把持之下，其黑暗的程度也不下於今日中國，路德改

教時代，日耳曼農民的暴動，就是當時黑暗情形的反映。直到十九世紀以後，民主政治成功，才把人民的苦痛漸漸減除了一些。現在西歐的人民，固然也有苦痛，即所謂無產階級的經濟壓迫，然而和從前那種封建政治下的苦痛比較，問題已經完全不同了。

過去中國有些黨派，以為這種下層人民的苦痛只有用暴烈的革命手段才能解除，因此在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初，打倒土豪劣紳的運動遍於南中國，國共分家以後，左傾各黨更集中於土地革命的問題，以為只要土地重新分配一下，貧農獲得了土地，就不至於再受官僚地主豪紳的壓制。

我們不否認土地或其他經濟獨立問題對於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性，但以為問題的重心還不在此。目前人民受苦痛的，不僅限於佃農、工人、及學徒之類，事實上小地主、自耕農、和中小商人，以及店主之類，也同樣的遭受壓迫，官僚豪紳對於這些「小資產階級」的壓迫並不減於對無產者的壓迫，因為他們尚有血可吮，因此受吸血鬼的垂青更甚，苛捐雜稅是直接壓到這些人的頭上，在公堂上或私設公案上受押受逼而傾家蕩產的人，也多是這些有產可傾的人，土地的分配並不能使一個佃農更幸福了許多。

過去某省當局會有意實行土地村有的政策，將土地重新分配給貧農，然而所得的答案是貧農並不希望分得土地，因為有了土地便有了租稅差徭的煩擾，土地對於他們是一

種負擔，並不是一種幸福的淵泉。主張土地革命的人，似乎還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至於用革命的手段剷除官僚豪紳，也未嘗不是一種辦法，然而問題是用什麼人去革命？打倒舊勢力之後那一種人代替站起來？事實上真正的農民和工商大眾，根本沒有革命的勇氣，因此革命不得不用流氓地痞，結果打倒了舊的官僚豪紳之後，而這些流氓地痞，就一變而為新官僚，新豪紳，其作惡的程度更比舊式官僚豪紳膽大十倍，真正的農工大衆仍然是被壓迫，而且受着更痛苦的壓迫。（本則摘自二十七年作「戰時下層行政機構的民主化問題」一文）